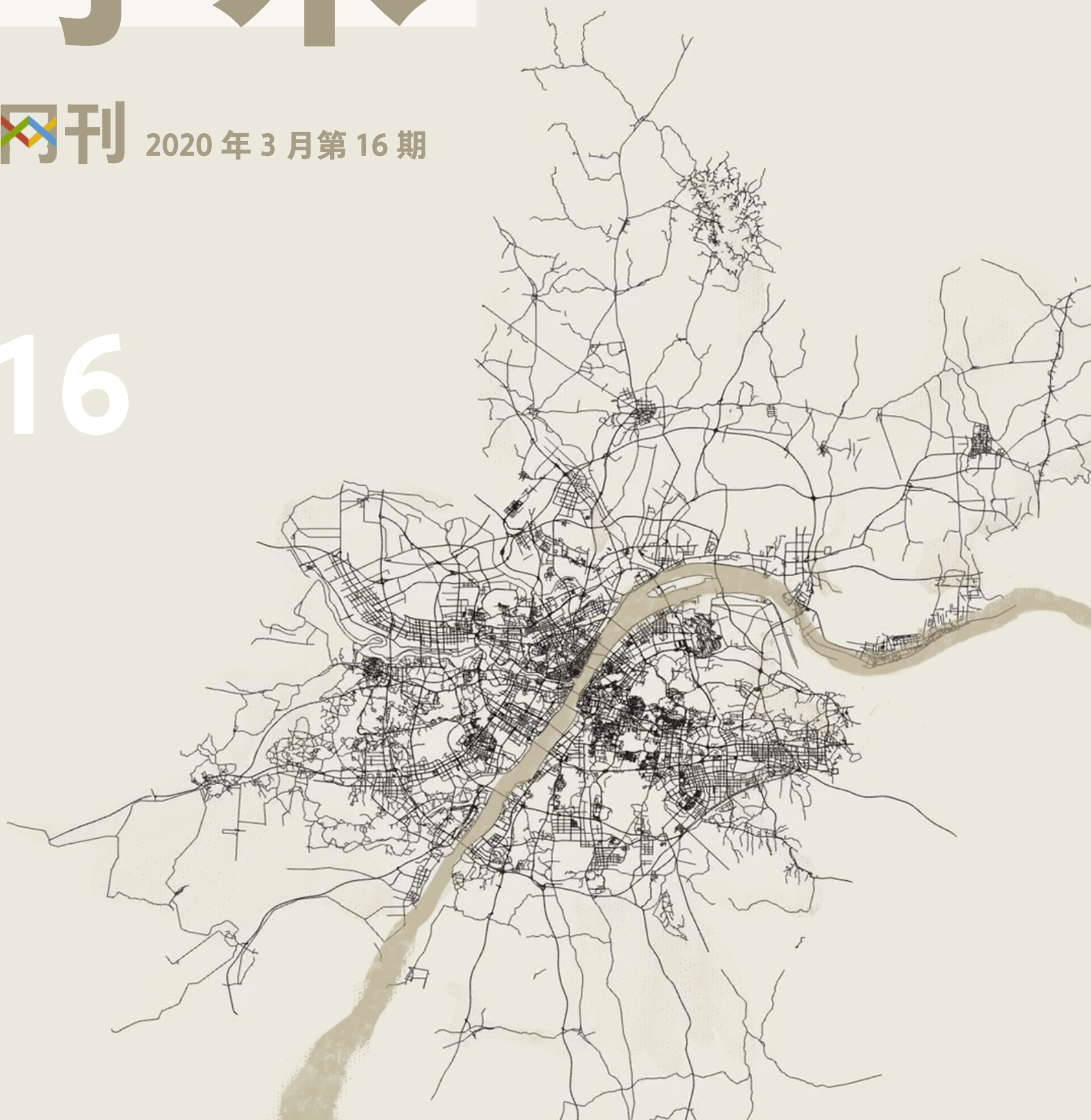


热风学术

春季刊

月刊 2020年3月第16期

16





目录

- 5 **编辑手记**
- 8 **内容提要**
- 13 **专题 _ “我们不是来拼桌”：亚际二代的学术组织与知识生产**
- 14 **编者按**
- 16 **“人文学科危机” 中的文化研究：一个亚际语境下的教学挑战**
滨野健
梁成林 译 | 许诺 校
- 34 **做土的问题：文化研究“建制” 在上海**
罗小茗
- 50 **文化研究怎么办？—— 一个高等教育体制边上的兼职者笔记**
郑亘良
- 66 **文化研究之“余” 的联想**
张馨文
- 特稿 _**
- 74 **广场上的他者性时刻：韩国烛光革命之后的绝望与希望**
白池云
张淳 译
- 殊音 _**
- 100 **危难见人心**
王晓明

现场 _ 疫情中的中国

- 106 编者按
- 109 炖锅日记
- 125 疫时记：“非人”租户的“口罩权”
明乐
- 129 疫时记：小区进出的简单与复杂
明乐
- 133 我们之间的种族主义——武汉人与新型冠状病毒
周銳滢
陈品存 译
- 137 疫时求医记
朱天成
- 143 灾难中的艺术与人
朱天成
- 148 “真实本身比真实的作用更重要”
非白
- 150 他们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
岚山蓝
- 153 我歌且谣：小议人人诛之的“谣言”和言论自由
Sid
- 160 新冠病毒隔离期：10 个家庭教育和环境革命时机（节选）
周雷
- 169 “科学”的中国（一）从懒政到勤政的一步之遥
燕赤霞
- 172 “科学”的中国（二）停课不停学：到底要学啥？
燕赤霞
- 176 线上吐槽会 | 特殊时期的“忙”与“关怀”
Null 小组
- 181 疫情中的不完全阅读史
许诺 刘珊杉

书讯书评 _

189 《重塑民族主义：特贾斯维莉 · 尼南贾纳读本》书讯及目录



196 《热风学术（网刊）》稿约

198 封面故事 & 网刊信息、下载方式

编辑 手记

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再也不会出现的春天。

对更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过于漫长，失去太多而来不及悲鸣，却又强迫你低头承认活着就好的春天。

然而，活着真的就好吗？倘若不得不因封城隔离以来的人间悲剧流泪，被匪夷所思的谎言、尺度各异的甩锅和404刷屏，为以两座神山为代表的伟大祖国送上赞歌，又最终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去上一堂看不清彼此嘴脸的网课？

这样的活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早已悄然成型。可对于愚蠢迟钝的人类来说，特别是对于自认为经历了改革开放大好时光的中国人来说，却必须从一只蝙蝠那里听闻和见证，方才醒悟：堆在屏幕里大街上的文明和繁荣，不过是那架露骨且寄生的权力机器华丽而无用的包装。倘若蝙蝠也有心肠，它不过是想提醒人类，你们正在这样的活着，还自以为是什么？

当然，蝙蝠不会有什么心肠。很多人都已经没有的东西，怎能指望濒临绝种的动物有如此的进化？关于人与动物的进化/退化，一百多年前的章太炎说得十分清楚（《俱分进化论》）：人希望享受比动物更多也更持久的欢愉，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同时承受与此相当的同样浓烈的痛苦与艰辛，是为进化。就此而言，人的退化，不过是在舍弃追求尊严和文明的艰辛的同时，一并放弃对持久的欢乐和意义的追讨权，安心于朝生暮死、朝三暮四，不必记忆更无需历史的动物世界。

而这便是这个漫长的春天要人类接受的事。

于是，这一期的《热风学术》，虽然在组稿时未曾预料到会遭遇如此险恶的春天，如今读来，大家不约而同思考的竟是一个人类何以退化，以及退化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其中，“特稿”刊登韩国学者白池云的《广场上的他者性时刻：韩国烛光革命之后的绝望与希望》。文章试图回答，为何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后的韩国社会，当代韩国青年变得日益保守？糟糕的生存境遇，不仅没有促其认同革命的目标，接过民主运动的接力棒，反而将他们迅速推向对父权/威权的高度认同？由此展开的分析，一方面让人意识到，在世界各地，青年不再是社会革命的排头兵，反而成为保守势力的生力军，这一状况正日趋普遍；即便是素有民主运动传统的韩国社会，亦未能幸免。另一方面，即便是在亚洲之内，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也差异极大。面对这一趋势，仅笼统地讨论青年人的右转、保守或“被洗脑”，将其归咎于新自由主义的侵蚀，恐怕是无效的。由此反观中国国内青年群体的政治意识和社会心态的变化，如何展开对这一社会趋势和文化心理的有力分析，恐怕比仅仅指出一代不如一代的“退化”更为要紧。

本期“殊音”，发表王晓明老师的短文《危难见人心》。此文符合晓明老师一贯的作风——“在小道理的时代讲大道理”；并且，这里的大道理，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玄乎的东西，而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要素。经过这个春天，在这一轮“退化”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少人是平时就只关心小道理的，根本不知道还有大道理在；不少人明明知道，却保持沉默或选择性地发言，专挑小道理迁就人心；不少人则对于这个世界进化到了今天，竟还需要重复如此基本的道理，目瞪口呆，彼此拉黑！更有不少人，将这个时候还愿意讲大道理的人视为

异端，灭之而后快。大道理并不深刻，然而在这个春天里坚持鼓噪着“大道理”的人们，却极为宝贵。在此，也一并向在此期间，海峡对岸、亚洲各地乃至寰宇之内，以各种方式鼓噪着“大道理”而决不妥协的人们表达敬意！这样的鼓噪，也许并不能扑灭退化，却是让再一次的进化变得可能的人类的基因。

专题“我们不是来拼桌：亚际二代的学术组织与知识生产”，由四篇从不同角度和身份出发讨论亚际文化研究后续发展的文章组成。它们试图思考，在这个持续退化的社会环境中，文化研究应该怎么办？这个“怎么办”，既包括个人的选择和取舍，也包括建制与组织制度的新构想，更包括文化研究者需要练就何种心情和心态，去沉着应对不复景气也不再友好的外部环境。如果说，文化研究势必同样也深陷这一轮退化中的话，那么，它究竟如何展开自救，进而救人？

最后，本期“现场”收录了自2月以来“当代文化研究网”公众号发布的所有与疫情相关的讨论文章。鉴于这是一个消失过快的世界，我们把这一部分属于文化研究的网络现实整理收集起来，立此存照。

也由此期待，以截图，文字、照片、歌曲、书法、影像以及一切人类尚能想到的颠来倒去的形式，被保存下来的这个春天，在不远的将来，将被重新发现、整理、理解和评价，乃至被最终刻录进人类文明的基因之中。

《热风学术（网刊）》

2020年3月14日





专题

这种所谓的“即插即用”（plug-and-play）的高等教育方式不仅影响了机构与大学课程的改革，还改变了学生（也许还有他们父母）对于大学教育的期望。考虑到先进技术（以及它们的相互融合）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一些特定的专业，如互联网技术、工程学、法学、经济学或金融学，以及学习语言对学生更具吸引力，当今的大学必须应对正在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这个问题在亚洲更为紧迫，这里的人们正经历着最快的、最具动态的社会转型与革新，其中也包含了自我认知上的剧烈转变。然而，如果全球化已经将我们带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最深刻也最复杂的世界结构当中，且不论技术正如何简化我们所生活的当前社会的属性，我们要怎样才能面对它，并与之对话呢？

8

——滨野健《“人文学科危机”中的文化研究：一个亚际语境下的教学挑战》

就在体制内展开的文化研究的学术工作来说，其步骤势必包括：首先是捕捉、辨别和整理一部分的社会现实，将其整理归纳为“文化事实”，其次是从良性的社会文化生产的角度，就这一部分事实展开分析和判断，最后才是据此做出相应的诊断、建议和进一步的理论概括。然而，就目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而言，这三个步骤之中，最为薄弱、令人犯难，也最不被重视、缺乏讨论和思考的是第一步。

——罗小茗《做土的问题：文化研究“建制”在上海》

图片来源：新国际 New Internationalism (<https://www.newinternationalism.net>)



我认为迫切的议题在于，当新自由主义不断地攻城掠地，一面扩大自己的集结并吸纳所谓的批判力量，同时又矛盾重重时，“文化研究”如何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个人化的知识思想批判工作之外，发展组织以维持其批判思想工作的物质基础。这也就不只是如何“卡位”的个人问题，而是组织集体如何介入文化研究寄生的高等教育体制的问题。

……或许需要一个相对持续而稳定的平台，重新思考与检视文化研究作为知识思想集体的组织实践。可以怎么发起与维持这样的平台，而当中已有的学会与相关学院系所（或已经占有有一些位置的老师们）又是什么样的角色或还能担负什么角色，这是第一个关于思考集体组织要做的工作与面对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如何形成一个盘点的组织，可以讨论文化研究的组织，包括过去文化研究的聚合因缘、现阶段是什么、对未来的想象又是什么？

——郑亘良《文化研究怎么办？——一个高等教育体制边上的兼职者笔记》

9

于是，我想到了“余力”。行有余力。“新”世代面对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有别于过往的，特别擅长将人的余心余力榨干的系统。与过去单调重复的劳动环境不同，劳动弹性化使人看似在工作上享受更多的自由，实际上是使每一份工作更像是一份兼职，一份额外，一份需要用尽余力的工作。……换言之，无论身在何方，无论从事哪一行，每一个文化研究人，都是必须要动用“余力”来从事文化研究的“业余”的文化研究人。或许，我们得承认，我们即将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商品化使得真正的求知学习与知识创造，都得在工作之余来进行的年代。在这样的世界里，大家都是知识的新贫阶级，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在文化研究的运动里，人人皆平等。

——张馨文《文化研究之“余”的联想》

特稿



今天，386 世代不再代表一种反抗力量，他们代表了主流。在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强有力的权势集团，一方面掌握着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掌握着话语权力。

那么，或许当前韩国青年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困境是，他们遇上了韩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权势集团，并在它的阴影下长大。他们要拒绝被“漫长的 386 体制（崔成龙 2019，101）”召唤为主体，但同时又无法创造出令人信服的话语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这方面，批评青年们缺乏政治参与和抵抗热情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要抗议的恰恰针对 80 年代所召唤的集体主体。

10

1960 和 1987 革命告诉我们，革命注定会反复，并受到由此带来的打击。不可思议的仇恨和厌女症现象的出现只能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革命创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空间，这其中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然而，一旦革命以胜利告终，相互竞争的声音融合成一种新的常识，残余势力的不速之客就会以反动的形式卷土重来。如果革命想要防止被它自己的退步所吞噬，它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滚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永远不停止思考，不停止说话，不停止努力与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沟通。一旦我们停止思考，失去与他者沟通的能力，我们最终会陷入平庸的深渊。

——白池云《广场上的他者性时刻：韩国烛光革命之后的绝望与希望》

殊音



殊音

11

这正是“危难见人心”这句老话的本义所在。满桌子肉菜，你舀几勺给乞讨者，这不算什么。手中只有一个红薯，肚子饿得咕咕叫，却能掰一块给旁人，这才是为人之心。

——王晓明《危难见人心》

现场



12

进入 2020，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名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疾病。当它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时，随之出现的瞒报风波、封锁政策等一系列争议事件，也牵连出了我们社会的久病陈疴。人们不禁质问，疫情的状况是否应当及早公开？行政手段的强制是否存在隐患？而在“封城”之后，医疗物资的调配、普通市民的生活保障要如何处理？一时间，以疫情为触机，中国网络上爆发出了少见的，对于公共事件的热切讨论。大家或记录、或追问、或提议、或批评，试图搞清楚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该往何方驶去。

一个多月来，当代文化研究网的公众号以“疫情中的中国”为题参与在这一记录、追问和讨论的社会进程之中。考虑到公众号的文章不宜保存，容易流散，本次“现场”专栏特将在此期间刊发的公众号文章整理归档，留此存照。

——“现场”编者按



“我们不是来拼桌”

亚际二代的学术组织与知识生产



编者按

罗小茗*

“我们不是来拼桌：亚际二代的学术组织与知识生产”是2019年3月参加台湾文化研究年会时参与的一个小组的讨论主题。不难发现，参加这组讨论以及之后答应为这一主题撰稿的人们，同属一个世代；虽分布亚洲的不同国家或地区，却面临一个彼此类似的焦虑。那就是，如何在接下来的生命道路中坚持那曾感动我们的文化研究？更进一步说，倘若希望今后的年轻人可以和曾经年少的我们一样，分享文化研究的魅力，感受进步的力量，不仅不与这个糟糕的世界一同下坠，反而能为一个美好的未来储备能量的话，受惠于文化研究的滋养的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或许便是经由大学课堂接触到文化研究，经由“亚际”思考亚洲和世界的关系，由是近亲之、追随之，也终于需要坚守之、开拓之的整整一代人的焦虑。

就此而言，张馨文的文章把这一焦虑（《文化研究之“余”的联想》）说得颇为生动：“我们这批受文化研究启蒙的‘新世代’，本以为是跟上了世界的‘新’，……没料到，几年内，文化研究又似乎从新路变成了一条遭废弃的路，宛若是学术市场上并不受欢迎的过期商品。‘文化研究’不再因为批判颠覆的态度而受到推崇。‘跨领域’越来越像是学术上的不学无术，而‘批判颠覆’则仿佛只是不切实际的幼稚病。”而对于在当前社会语境中坚持文化研究的难度，无论是其被学术体制接纳的方式、被评价体系所折磨的强度，还是被新自由主义下的劳动模式所规训的力度，以及文化研究对于研究者需具备的综合能力的高标准严要求，郑旦良在《文化研究怎么办？》中则有非常精准的刻画。

* 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

围绕这一焦虑，本专题提供了四个可能的视角：其一，作为一名致力于文化研究的教育者，如何思考和应对当前全球化进程中大学改革在课程上对文化研究的强有力的挑战(滨野健《“人文学科危机”中的文化研究》)?其二，作为一个已在体制内占得一席之地、获得宝贵空间和资源的系所，文化研究后续的制度化建设可能如何展开(罗小茗《做土的问题》)?其三，在业已新自由主义化了的教育产业/学术市场中，同时驻扎于体制内外的文化研究的兼职者，如何展开观察、调整与呼吁(郑亘良《文化研究怎么办?》)?其四，倘若坚持业余者的身份，如何可能以“余力”思考文化研究，畅谈 Plus One 的重要性(张馨文《文化研究之“余”的联想》)?

对于文化研究而言，这四种视角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正是它们的彼此呼应，才构成了文化研究的魅力所在。故此，邀请各位读者暂时放弃僵化的线性目录，将这一专题视为一个由教育者、建制者、兼职者和业余者彼此牵手，相互对话，努力形成新一代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解的一场圆圈舞。而这一场舞蹈，也正期待更多不同身份者的加入，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成为我们彼此的 Plus One，为这个越来越划一单调的世界，增加异议。



“人文学科危机”中的文化研究： 一个亚际语境下的教学挑战

滨野健 *

梁成林 ** 译 许诺 *** 校

1. 介绍

1-a. 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学科危机

2019 年 4 月，BBC 的记者阿曼达·鲁杰里 (Amanda Ruggeri) 发表了一篇关于全球高等教育趋势的文章。¹ 文章表明，直到不久之前，机会相对开放并且不计出身的高等教育仍被普遍视为一块上佳工作的敲门砖。在高等教育当中，通识教育占据着重要地位，它旨在让人文社科的知识担任重要角色来打开社会的上升通道，从而拓宽个人的生命历程。但在今天，情况已经有了明显变化。“流动的现代性”² 下就业市场的灵活性与不可预测性，令大学生们对自己的人生道路感到焦虑，逼迫他们寻求更多“实用的”和“有用的”高等教育课程。飞涨的大学学费对许多国家的学生而言都是普遍的负担，这也使他们力求避免在高等教育中承担“风险”，转而致力于拿到文凭，以保证能找到工作。正如鲁杰里所说，这种所谓的“即插即用” (plug-and-play)³ 的高等教育方式不仅影响了机构与大学课程的改革，

* 滨野健 (Takeshi Hamano)，北九州市立大学文学部博士，现任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副教授。研究兴趣主要包括亚洲全球化下的日本家庭观念变迁，以及离异家庭的子女抚养问题，邮箱hamano@kitakyu-u.ac.jp。

** 梁成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 许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1 Ruggeri, Amanda, (2019). “Why ‘worthless’ humanities degrees may set you up for life”, Retrieved November 27, 2019 from <https://www.bbc.com/worklife/article/20190401-why-worthless-humanities-degrees-may-set-you-up-for-life>.

2 Bauman, Z. (2000).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3 Ruggeri, (2019).

还改变了学生（也许还有他们父母）对于大学教育的期望。考虑到先进技术（以及它们的相互融合）所带来的社会变化，一些特定的专业，如互联网技术、工程学、法学、经济学或金融学，以及学习语言对学生更具吸引力，当今的大学必须应对正在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这个问题在亚洲更为紧迫，这里的人们正经历着最快的、最具动态的社会转型与革新，其中也包含了自我认知上的剧烈转变。⁴ 然而，如果全球化已经将我们带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最深刻也最复杂的世界结构当中，且不论技术正如何简化我们所生活的当前社会的属性，我们要怎样才能面对它，并与之对话呢？

诚然，我们大可举出一些论据，说明通识教育对学生了解公民社会、民主，以及掌握其他一些应对当今社会多样性、灵活性和流动性的“实用技能”有所裨益。⁵ 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在我们这个全球化世界的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或通识教育）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样的知识和方法能够以批判性的方式结合起来，进而理解这个复杂的扩展后的社会环境；或者，我们能怎样通过人文教育来回应学生并为学生做出解释。

怀揣这个疑问，我需要谈谈大学里的文化研究教学问题。过去几十年中，文化研究及其有关研究议程、理论预设和教学探索的详细描述，已经被广泛地认为是人文学科中最具批判性的进路。正如斯图尔特·霍尔所言，我们应当了解，文化研究是在英国高等教育的人文学科危机当中，被当做一种替代方案而被系统地探索和阐释出来的。⁶ 今天，就像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所指出的，文化研究因其包容性的研究议程和理论预设

4 Palmer, J. D. (2011).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East Asian higher education: globalization's impac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Gordon, P. (2012). "The changing face of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November 30, 2019 from <https://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1064138/changing-face-higher-education>

5 Gordon, H., Feisal, G. M., Roger, L. G., & Sheldon, R. (2015). *A new deal for the humaniti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Qiao, 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humanities and liberal arts in higher education. *European Review*, 26(2), 299-310.

6 Stuart, H. The emergence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risis of the humanities. *October*, 53, 11-23.

而被视为是“跨学科的通用语”（interdisciplinary lingua franca）。⁷在众多从事文化研究的社团和学会当中，有一些跨区域的组织，如亚际文化研究学会（2004年以来）在促进和开拓超越不同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批判性对话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研究，不论是在院系层面展开建制，还是由学者个人倾力打理，现已成为了人文学科甚至其他学科中批判性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⁸

吉尔伯特·B·罗德曼（Gilbert B. Rodman）对文化研究作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定义：1）侧重于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文化与社会复杂性的理论，2）以多角度的研究方法生产新的知识系统，追踪上述的复杂性，3）教学上的挑战，公开阐明既已积累的知识，教育和影响更广泛的社会群体，4）改变公共政策和社会舆论，试提出可供选择的生活，以促进公平和社会正义。⁹在这四项议程中，我想在此强调的是文化研究（以及学生们随后采取的行动）中的教学上的挑战。虽然传统的文化研究讨论往往强调其理论阐释和社会参与的态度，但这种跨学科研究的教学向度不应被忽视。实际上，文化研究的教学方面能够在—项研究的理论/方法与实践/行动之间发挥关键性作用。¹⁰然而，罗德曼认为，文化研究的教学参与时常被忽略。他对这种趋势提出了批评：

“例如，书写文化研究历史的人常常忽略了文化研究始于英国工人教育，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理查德·霍加特和雷蒙·威廉斯的早期著作之上，将它们视为文化研究得以建立的基础。（…）这使得在文化研究从业者们展开的公开对话中，教学始终处于边缘而非中心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教学这一领域中，非学术性的文化研究从业者通

7 Turner, G. (2012). *What's become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p. 168-171.

8 Ryan M. (2010). *Cultural studies: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Wiley-Blackwell.

9 Rodman, G. B. (2015). *Why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Wiley-Blackwell. pp. 75-76.

10 例如，亚际文化研究学会尤其会为教授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组织两年一次的教学营。而除了定期召开两年一度的学术交流会议外，它还还为研究生们举办夏令营。

常要比职业学者更起作用——仅仅因为他们的文化研究工作倾向于针对范围更广的非专业受众。”¹¹

我认为，教与学的文化研究，无论是在课堂之内还是在校园以外，都应该是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当涉及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话题，文化研究的教学参与能够在参与者之间生产出包容性的对话和批判性的见解。此外，对于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更是文化研究最标志性的特点之一。我们的日常生活是由全球社会的经济、政治、历史和空间衍生物所构成的不可通约的一系列网络，从身边司空见惯的物品或习俗的故事出发，有利于引导学生发挥其想象力来理解全球化世界的历史、空间、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复杂融合。以这种方式鼓励学生们发挥想象力，可能有助于将文化研究的教学挑战引入课堂内外。

1-b. 本文的目的

文本旨在探讨在全球化时代的教育改革的动荡当中，人文学科的文化学习怎样在高等教育中发挥关键作用，以回应近来有关人文学科危机的普遍论调。聚焦于近来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与相关讨论，本研究力图分析当代的社会变迁怎样影响了高等教育。虽然这篇论文主要关注日本情况，但作为全球化的结果，这一问题也牵涉着其他亚洲国家的高等教育。作为对高等教育中的人文学科危机的回应，本文坚持认为，文化研究所详述的批判性思维的理念与方法，仍然能够与预言高等教育危机的声音相抗衡。更具体地说，通过回顾我与本科生所展开的文化研究试验性工作坊，我试图探究一些方法，使学生们能够协作地生产和发展他们自身对全球化世界的日常文化与消费的另类观点，我期望这能够提高他们对日常生活及其环

11 Rodman, 2015, pp.82-83.

境的批判性见解。最后，本文提出了一种可能的发现，学生们从他们的人文教育的成果中获得了另一种“实用”技能，而它可以积极地影响社会。

2. 日本社会与高等教育：一组简况

2-a. 变化的社会，变化的大学

随着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变迁，高等教育改革成为了当今最为热门的公共话题之一。在历史上，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被视为 19 世纪以来现代国家建成过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参照当时的西方大学，建立了早期的高等教育组织结构。特别是，以全国为范围建立起的帝国大学，在精英阶层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随后其他私立机构也纷纷建立。战前的高等教育旨在为国家培养精英阶层，战后的教育改革着眼于让大学在公共教育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其中的前沿研究机构则承担了战后日本复兴的重要任务。直到 70 年代中期，凭借发达的国家福利制度，日本享有最高的预期寿命，人口的减少也早有预测。然而，大学的数量直到最近仍然在稳步增长。1950 年，全日本共 201 所大学，这个数字在 1994 年已经达到了 552 所。¹² 由于战后的民主教育改革，日本高等教育的普及促进了战后社会的发展。根据文部科学省的全国调查，本科入学率多年来稳步上升：1954 年仅有 7.9%，2018 年则飙升到 52%。¹³ 今天，每两个日本高中毕业生中就有一位进入大学。从普及高等教育的方面来讲，战后的大学改革是成功的。

21 世纪前十年里，日本大学面临着新的社会变化，急需根本性的教育

12 吉本圭一 (2010)，「戦後高等教育の大衆過程 (The process of popularization of post-war higher education)」村澤昌崇編『大学と国家：制度と政策 (The university and stat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東京：玉川大学出版部，pp. 22。

13 文部科学省 (2017)，「学校基本調査 年次統計 (Annual statistics on basic school survey)」<https://www.e-stat.go.jp/dbview?sid=0003147040> (2019 年 11 月 20 日閲覧)。

和组织改革。在过去二十年中，日本社会见证了两大变化。首先，当战后日本大学数量迅速增长时，日本人口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达到了顶峰；随后，老龄化和低生育率导致了迅速的人口缩减。多年以后，当下的日本大学因为国内的低出生率，面临着预期学生数量减少的问题。¹⁴

鉴于本国人口数量的急速缩减，不论大学的情况如何，教育改革都处在危机之中。这一危机还影响了地区的人口分布。例如，日本一半以上的人口如今集中在三个主要城市（东京、大阪和名古屋）。据估计，到 2050 年，大约有 20% 的现存居住区，主要是一些地区小城镇或城市，都将无人居住。¹⁵ 此外，过去 20 年的长期经济衰退激发了年轻一代对于大学提供实用技能和认证资格的期望，这有利于他们在本国就业市场中生存下来。¹⁶ 因此，各所大学都在频繁地调整已有部门，并且设立新的院系。为了应对青年人口急速减少的困境，一些位于地区城镇的小型私立大学已经不顾一切地进行招生政策改革，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以满足学生数量上的指标。随着本国学生数量的下降，一些大学开始大量招收来自亚洲邻国的意向留学生，这些学生希望通过高等教育在日本获得预期的发展。尽管如此，根据日本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在 2019 年进行的一项全国性调查，33% 的私立大学（587 所中的 194 所）的回复是，由于缺少申请人，他们无法完成学生招收指标。¹⁷

14 与国立和公立大学不同，小型私立大学与学院的建立是为了应对战后日本青年数量的增加。尽管日本的私立大学受到文部科学省的资金协助，它们仍然因为近来人口的减少而容易走下坡路。很多地方政府建立数量庞大的私立大学，并寻求增加学生人数，依靠年轻人来发展本地经济，然而，许多机构面对着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与成立之初的信念相悖。2019 年 5 月，一家当地报纸报道称，2010 年至 2016 年期间，至少 21 所高校被文部科学省正式批准关闭。

西日本新聞 (2019)，「地方私大、淘汰の時代に 進む少子化 学生確保難しく (Local private universities to be selected: facing a difficulty in meeting the student quota due to depopulation)」<https://www.nishinippon.co.jp/item/n/510181/> (2019 年閲覧日 11 月 20 日)。

15 详见日本总务部的这份报告，総務省 (2012)，「平成 24 年版情報通信白書 (The 2012 White Pape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Japan)」東京：総務省。

16 由于近年来战后婴儿潮一代的大量退休，日本本国的就业市场已经复苏。2018 年的就业选择率为 1.63，而受到当时美国国内经济衰退与雷曼兄弟 (Lehman Brothers) 破产的影响，2009 年的选择率仅为 0.43。

厚生労働省 (2019)，「一般職業紹介状況 (平成 30 年 12 月分及び平成 30 年分) について (About the status of general job placements (December 2019 and a whole year of 2019))」https://www.mhlw.go.jp/stf/houdou/0000192005_00001.html (2019 年閲覧日 11 月 20 日)。

17 据报道，由于近来文部科学省强制要求私立大学限制超出学生配额的额外录取人数，这一数字略有回升。

2-b. 全球化与教育改革

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类似情况并不只发生在日本。无论在哪个地区或国家，当下高等教育的教学和科研，都面临着参与国际竞争的压力。特别是在日本这样的非英语国家里，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不仅要寻求组织或制度的改革，还要进行学生的国际化。考虑到这一点，日本文部科学省在2014年3月出台了一项名为“招收30万留学生”的全国政策。该政策鼓励日本学生与留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为国内就业市场开拓人力资源。这一国家战略的重要目的之一，便是使日本高校在课程设置和招生方面都适应于全球化的情况。¹⁸ 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日本高等教育方面实行这一政策的关键原因之一，乃是国内社会的人口减少以及对未来社会衰退的担忧。实际上，文部科学省这样谈道：

接受留学生不仅有助于培养一国的人力资源，也促进了日本学生对于外国文化的了解，以及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不仅如此，这还能丰富日本学生的学习环境，并为日本大学的国际化提供巨大助力。当然，这也能促进外界对日本文化的了解并改善国际关系，使其最终助力于日本的可持续发展。总而言之，这与不同层面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承诺。

随着日本出生率的持续走低，除了号召年轻人和妇女们积极参与社会来维持日本未来的发展之外，日本招徕高水平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也日益增长。（……）因此，国家需要积极发展政策接收留学生，

文部科学省担心，申请者会集中在数量有限的著名私立大学中。

日本经济新闻(2019)，「今春の私大定員割れ 33% 3ポイント減、改善傾向続く (33% of private universities failed to meet the student quota: a sustainable improvement of 3 point since last year)」 <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MZO48425750Z00C19A8CR8000/> (2019年11月20日閲覧)。

18 从另一角度来看，这样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教育政策，可以被视为国家“软实力”外交的一个例子。详见 Lowe, D. (2015). Australia's Colombo Plans, old and new: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s foreign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1(4), 448-462; 以及 Klein, N. (2008). *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New York: Picador.

以实现“30 万留学生计划”。¹⁹

这种关于国内教育全球化的论调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的老生常谈，这在全世界的高等教育中都大同小异。²⁰ 对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来说，通过增加留学生数量并发展可用的英语课程，来进行高等教育全球化，是高等教育领域的共同趋势。²¹ 除了研究领域的大量全球性成就，当下高校还被要求提供基础性的全球教育，来生产全球性的知识生产者。在这方面，高校学生的国际化被寄予了为国家提供全球性人力资源的厚望。当然，高等教育的全球化相当重要，它能够为学生提供实用的知识和技能，使他们在全球化的社会取得尽可能多的成就。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们进行日常交流和讨论，并与他们交流想法，对于增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提升他们作为全球公民的包容度是相当重要的。然而，五十岚泰正和明石纯一等人却批评“全球化人力资源”的日本话语在适应当代日本高等教育的全球化之时，常常忽略了全球化存在内在矛盾的事实。²² 这在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有关当今世界全球城市的等级结构的研究中已有所体现。²³ 在这种情况下，人文学科的高等教育从业者应该如何回应学生？他们又要如何通过阐释另类的“景观”（scapes）²⁴，来理解全球化世界的深度与广度？除了深思熟虑地选择主题与话题，鼓励学生掌握关键技能之外，我们还能设置什么样的项目与课程，超越那种让个人适应社会现状的“即插即用”的知识，从而渐进地帮助学生、社群以及社会追求美好未来？

19 文部科学省 (2014), Working group report on advanc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sufficient housing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Japan towards realizing the “300,0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Plan” <http://www.mext.go.jp/en/news/topics/detail/sdetail/1372647.htm> (閱覽日 2019 年 11 月 25 日)。

20 Shields, R. (2013).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 mobility: a network analysi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57(4), 609-636.

21 See, Gordon, P. (2012).

22 五十岚泰正，明石純一（編）(2015)，「「グローバル人材」をめぐる政策と現実 (The policy and reality of “global human resource”)」東京：明石書店。

23 Sassen S. (2001).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4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c. 重建高校组织的相关争论

毋庸置疑，社会的变化导致了高等教育重建。这一重建的前提预设是，高等教育的作用主要在于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专业的技能与技术。这种语境下的教育改革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在日本，这样的高等教育政策改革会对人口减少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鉴于日本的国立和公立大学仍然受到政府的强力干预，它们将如何回应最近高等教育政策的修订？

最近的政策变化似乎在加速高等教育中“即插即用”的实施。继2013年日本国立大学改革计划发布之后，2015年6月8日，文部科学省以当时的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的名义，发布了一份有关国立大学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组织与运作的报告。报告提出了若干议题，以便国立大学适应在变化的社会和全球化世界中高等教育所要担任的角色。除了重组大学组织（包括结构的集中化）外，报告还认为当今高校必须考虑到教育中的主动学习、改革考试以选拔多元化人才、为地方社区多做贡献，以及推进大学的全球化。²⁵ 当计划指出全球化时代日本高校的改革需求时，改造高校组织的这一提议引起了公众的关注。由于提议似乎暗示国立大学的人文社科部门将被裁撤，更大范围的公共辩论最终出现了。关于组织的整改，报告指出：

在考虑国立大学所承担的作用时，需注意如下两点：面对18岁以下人口的减少，需要缩小学校的规模；为保证社会中具备充足的有技能的人力资源和有质量的教育，尤其鼓励裁撤那些师范学校及其研究生院、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本科生院和研究生院，对它们实施整改，来满足正在增长的社会需求。²⁶

一些媒体批评了政府提出的裁撤国立大学人文社科部门的计划。考虑到人文学科在日本高等教育中缺失的风险，许多知识分子甚至公众都发表了文

25 文部科学省(2015),「国立大学法人等の組織及び業務全般の見直しについて(通知)(About the restructuring of organizations and general institutions of national university corporations (notice))」東京：文部科学省。

26 Ibid. p.3.

章和评论，表达了他们对于改革政策的反对。²⁷

为了澄清这一方案，文部科学省强调，他们的提议揭示了现实情况。人文社科部门必须考虑组织改革，来提供必要的技能以满足已经改变了性质的工作需要，而今日高校需要教育或训练年轻人来适应本地经济与产业的需求。一些商业团体对此提出了质疑。例如，日本最大的经济组织与政治游说团体“经团联”（Keidanren，全称为“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发布了一条消息，坚称只有那些通过通识教育才能获得的技能，如语言能力、沟通与合作能力以及逻辑思维，才是对员工最为重要的。即使是当今的日本公司，也必须考虑招纳具有不同背景和技能的人，以在这个复杂而灵活的全球世界中组织业务。²⁸ 然而，在对反对该报告的媒体运动展开文本分析时，吉见俊哉 (Shunya Yoshimi) 指出，媒体的误导导致了对于文部科学省和政府的批评。²⁹ 据他所说，文部科学省并没有在国立大学中裁撤人文和社科院系的打算，实际上，下村大臣为这则报告辩护，说它既不是轻视人文学科，也并非是要在高等教育中优先其他实用学科。然而，他质疑现有的人文学科院系组织架构，是否有能力支持跨学科项目的实现。他解释道，这一公告旨在鼓励国立大学考虑根本性的组织和体制改革来回应社会需求。³⁰ 几年之后，相当数量的国立大学最终对人文社科院系进行了组织改革，而许多大学也计划在未来几年内进行院系改革。

27 本田由紀 (編) (2018), 「文系大学教育は仕事の役に立つのか (*Is university education useful for job?*)」京都：ナカニシヤ (Nakanishiya) 出版。

山口裕之 (2017), 「人文系学部は廃止？：日本の大学改革の現状と課題 (*Abolition of humanities faculties? Current status and issues*)」『人間社会文化研究』(25), 148-158。

室井尚 (2015), 「文系学部解体」東京：角川書店。

28 日本経済団体連合会 (2018), 「今後の採用と大学教育に関する提案 (*Proposal for the future recruitment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https://www.keidanren.or.jp/policy/2018/113_honbun.html#p2 (閲覧日 2019 年 11 月 25 日)。

29 吉見俊哉 (2016), 「『文系学部廃止』の衝撃 (*The impact of “the abolition of humanities faculties”*)」東京：集英社。

30 文部科学省 (2015), 「下村博文文部科学大臣記者会見録 (平成 27 年 7 月 24 日)」http://www.mext.go.jp/b_menu/daijin/detail/1360172.htm (閲覧日 2019 年 11 月 28 日)。

3. 在全球化世界中重审日常文化

3-a. 学生们的焦虑：来自日本大学的一则轶事

作为人文学科院系的教师（比如我，在日本一个地方城市的大学中教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常常会遇到一些本科生在学习人文学科之后颇为实诚地表达自己的矛盾心情。³¹ 那些在毕业后总是勤恳上进并且严肃地思考他们职业生涯的人，也时常遭遇这样的矛盾。在一次随意的谈话中，他们谈起自己在每次课堂或辅导课中都感到十分兴奋和颇受启发。然而，一旦谈起未来的职业，分享找工作的经历，他们便会因难以把在智识上受到的启发与自己的践行能力关联起来而感到尴尬。对于来自不同院系，并且正在学习其他学科的朋友们来说，他们感到很难解释自己在四年大学生涯中的实际所学。在求职面试当中，面试官常常会问面试者（也就是学生）他们从人文学科中学到了什么，并且为什么学习这些。当然，有些学生很擅长回答他们在学业中的所得和成就，在他们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后更是如此。³² 那些学生遣词造句来解释他们是如何对人文学科感兴趣，又是如何运用它的。有些人可能会说，从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中可习得的能力能够被再现为一种社会化、沟通和包容的技能，这对未来的职业生涯颇有益处。³³ 另一些人则会谈到，人文学科赋予学生批判性思考以及归纳和抽象事件的能力。然而，在面对高等教育中被推崇的“即插即用”的方式，或者说许多大学在实施组织和制度改革过程中始终对抗着的所谓的“全球功利主义”时，这寥寥几个支持人文学科的术语对学生而言，并不那么具有说服力。

为了回应这些学生的期望，教育领域的新近趋势经常提到要“主动学

31 在日本高校中，双专业和双学位课程并不常见，在我所在的大学也是如此。

32 提交毕业论文在大多数日本高校的人文学科中仍然是必须的。

33 Ruggeri. (2019).

习”，以集体协作的方式发展学生的知识创造力。在文献中，这种教育方式可被归纳为以下几点：

- 学生参与课堂，而不仅仅是听课就行
- 少强调信息的传达，多强调学生技能的培养
- 学生要进行复杂的思考（分析、综合和评价）
- 学生要积极参与活动（如阅读、讨论和写作）
- 尤其强调学生对自身态度和价值观的探寻³⁴

主动学习实际上是一种鼓励学生参与学习过程的，方法与教学途径上的汇总。学生在主持人（或协调人）的支持和鼓励下，积极主动地参与课程，而不是在教室里伏案苦读。尽管这一概念过于宽泛，难以从中确定一些具体的教学策略，但无需置疑，它仍然被视为全球教育，乃至人文学科教育领域里最适宜的方法（正如社交与沟通技能被认为是学习人文学科时最丰厚的收获）。³⁵ 举办小组工作坊是最能体现主动学习的主要方式之一，在教师或主持人的指引下，参与者被鼓励通过多种方式来积极参与知识创造的过程。比如说，为某个想法进行头脑风暴，辨认出与话题相关的问题，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或者建构一个理论或概念。这种方法不仅在不同程度的教育中很受欢迎，而且也被企业广泛用于优化团队合作和开发新产品的营销。不过，这种积极的学习型工作坊并不是教学之中知识生产的万灵药，考察和评估这一方法在应用中的限制也是很有必要的。³⁶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一种风险，教师或主持人会不易察觉地将参与者引向某个理想的方向，且仍鼓励参与者积极参与，就好像这是经由他们自己努力所

34 Bonwell C. C., & Eison J. A. (1991). Active learning: creating excitement in the classroom. *ASHE-ERIC higher education reports*. pp. 19.

35 在这一争论中，也有人提出了数字人文进入课堂的需求，但我并未在论文中展开这一不同的话题。详见 Battershill C., & R. Shawna. (2017). *Using digital humanities in the classroom: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for teachers, lecturers, and students*. London: Broomsbury Academic.

36 小針誠 (2018), 「アクティブラーニング：学教教育の理想と現実 (Active learning: the dream and reality in school education)」東京：講談社現代新書。

做出的决定一样。³⁷ 考虑到这些因素，思考文化研究该如何与教学方法进行批判性的接合是很有意思的。果真如此的话，我们要如何在人文学科中做到这一点呢？

3-b. 既不全球也非本地：一次文化研究工作坊

沿着上述问题来考察教授文化研究时的教学探索，我先要回顾一场在本科生通识教育中的工作坊，它是一次文化研究的实验性教学实践。2019年11月，我有幸到香港的一所高校做讲座，这个讲座的目的是为了让选修英文系核心课程的学生们有机会思考学习文化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拘泥于语言与沟通技能的实际训练。我为那次工作坊定了一个目标：

在全球化世界中放空（unlearning）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次跨国的人文学科工作坊

这个跨国工作坊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一次机会，通过积累人文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技能，从别样的角度放空 / 进入他们的日常经验。参照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进路，学生将意识到，日常文化中的日常交流，实际上和范围更大的再生产系统以及社会环境的重建息息相关。（…）这一工作坊将是一个承认我们社会环境的偶然性（但非脆弱性的）特质的场所。比起让人僵硬地适应现状，这可能是我们向更好的未来转变的机遇。最为重要的是，通过提升批判性的技能，把当今世界中日常生活的物质领域，以及跨越国界的非物质生活领域相互（重新）联结起来，学生们将了解如何放空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一技艺。

37 長谷川 一 (2014), 「デイズニーランド化する社会で希望はいかに語りうるか：テクノロジーと身体の遊戯 (How can we talk about hopes in the Disneyfication of society? The attraction between the technology and body)」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

正如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在引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著名文章《文化即日常》（*Culture is ordinary*）时所说，文化研究的亮点之一便是发现和检验“平凡中的非凡”。³⁸正是认识到了威利斯对日常文化实践中符号作用的强调，许多文化研究学者力图分析个体或集体形式的人，以阐释或再生产文化内在的价值与理念的方式参与到意义生产实践中。这其中也同样蕴含着一种机会，即通过挑战或争夺传统的意义与价值来创造另类符号。³⁹考虑到这种日常生活中的身份政治，我在工作坊中的方法旨在重新思考那些商品与事件最终抵达我们眼前的方式，它是经济与政治状况复杂混合的结果，延伸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使其进入了更广泛的（社会语境中的）外部环境、隐藏网络与关系。通过观察一个熟悉可感的素材，我描述了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放空的方式。“放空”这个词通常指向质疑我们的特权、规范性假设或者“对霸权话语的掌控者进行去霸权化”⁴⁰的批判态度。我期望学生们能由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平凡中发现我们全球化世界的非凡之处。

这个实验性工作坊用英语进行了 90 分钟，大约 16 名学生参加了这次活动，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不同专业的（从英语专业到商科）二年级本科生，还包括一些东亚背景的留学生，以及一名英语教育专业的本科交换生。这个特殊讲座的本地协调员在实际工作坊中担任合作教师，但工作坊是由我自己进行策划和指导。一开始，学生们得到了一些背景资料，以便从中获得一些想法来把握工作坊的目的。对于目前正在这所文科大学学习若干课程的学生们来说，教师通过讲述上面那些我已描述过的事件，展示了包括日本在内的诸多全球高校的通识教育中的“人文学科危机”。学生们被鼓

38 Willis, P. (1990). *Common culture: symbolic work at play in the everyday cultures of the young*. Milton Keynes: Open University Press. p.2.

39 例如，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Certeau, M. d. (1988).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ark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0 Spivak, G. C., F. Bartkowski and T. Threadgold. (1988). *The intervention interview*, *Southern humanities review* Vol. 22(4). p323-343.



图 1 便利贴上的话题样例

黄色便利贴内容：“3. 用粤语创造你自己的 hip-hop 音乐并上传到 Youtube”；

蓝色便利贴内容：“4. 去东南亚度假，并在海滨过上一周”。

励去了解，高等教育人文学科的全球化趋势正是全球化的结果。然而，正如上文提及的那样，他们也被告知学习人文学科确有优势，尤其是能够帮助掌握批判性技能以及其它一些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的能力。教师分享了一些概念与想法，其中就包括“放空”。这是从文化研究中衍生出来的，用于之后工作坊的分析工具。教师最后提及了工作坊的三个目标：

- 分享本地与全球语境下，对于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的未来共同关注
- 重新审视学习蕴于日常生活中的日常文化的意义
- 发现人文学科中，文化的研究之中的“放空”的技艺

工作坊的资讯部分进行了大约半个小时，以便学生们熟悉文化研究中主动学习的意向。

在资讯部分结束之后，学生们被要求组成四到五人的固定的小团体。指导人随后介绍了工作坊的题目，“为人文学科中的日常文化撰写一份教学大纲”。教师采用流行的“翻转课堂”（flip teaching）方式，告诉各组，让他们把自己当做文化研究本科生课程的教师，鼓励他们制定一个为期十五周的课程计划，来检验日常文化（及其日常用途）能够如何吸引学生，并让他们在教室里学习文化研究。学生们有一部分时间用来为日常文化的课程列出一个更为适合的主题清单，每个主题都被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在此过程中，根据自己的日常经验与实践，学生们不断在便利贴上列出主题（参考图 1）。这个过程让学生有机会从不同角度来反思他们平日里的种种消费和娱乐，认识到学习文化与社会的目标。在教室里，我看到本地学生与留学生之间有了可交流的话题。一位学生还描述了他/她在桌子上吃到的零食。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从自己的日常经验与消费中列出了一些独特的话题。

接下来,教师要求学生们画出一个2x2的坐标轴,根据计划课程的目标,将每周可能的主题分类为几个关键论点。在这里,2x2轴是一个图形工具,用于设置参与者和问题域的想法与讨论。通过在问题或任务的综合推导过程中使用这一方法,参与者得以思考事物与理念之间的关系。⁴¹2x2轴也是一种有效的方式,能够直观地表达参与者们在工作坊中需要传达的关系。制定两个变量范畴(每条轴线上一个),在一张大大的白纸上画一个2x2轴,并把便利贴标在轴上。在这次工作坊中,根据工作坊的目的,我们建立了两个变量范畴:1)纵轴上的全球-本地范畴;2)横轴上的批判性知识与实践技能范畴(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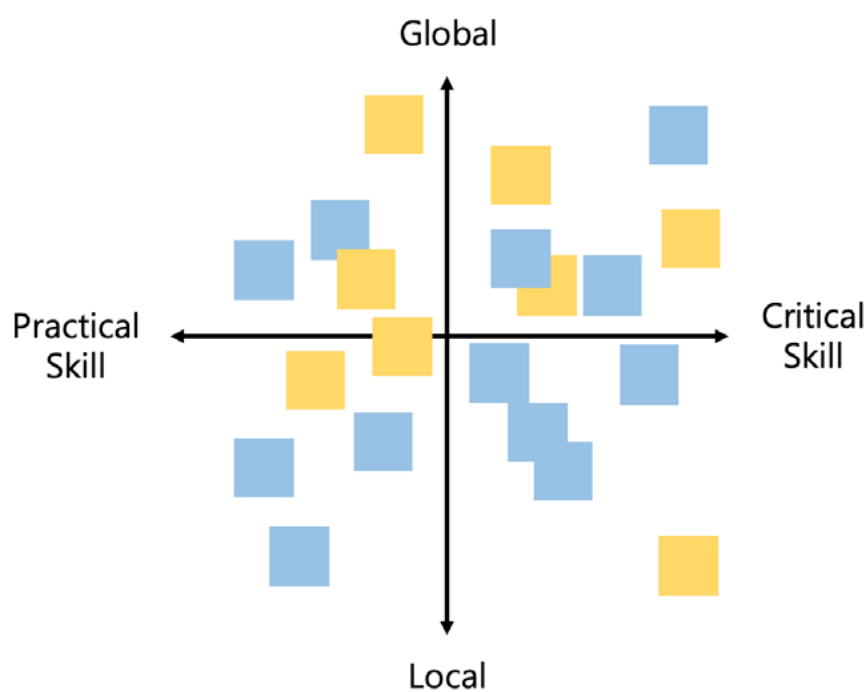


图2 2x2轴和标出来的便利贴

学生们随后被要求观察哪些象限是空的,哪些是满的,借此思考课程计划中的相关性在哪里受阻。为了做到这一点,教师建议撰写课程计划的学生们必须注意平衡所选的主题,以达成他们的课程目的。最终,为了达成由两条轴线所传达的课程目标,学生必须与其他小组成员合作,在讨论中移除每个话题或形成新的话题。通过这样做,我们希望学生能意识到,学习

41 The d.school, Stanford University. (2013). *The d.school bootcamp bootleg*. p.22

文化研究这样的人文学科不仅能通过横轴上的内容，发展他们的实践技能与批判性知识；也能通过纵轴上的内容，考量他们的日常文化和文化实践如何兼具全球与本地特点。在此过程中，学生们表示要在 2x2 轴上贴上某些便利贴（主题）有难度。在这一情况下，教师指出，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熟悉或流行的文化及其实践，存在着复杂的特征与社会关系，这种感觉可能会引导我们，通过质疑日常文化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牵连，来重审日常文化的某些部分。这个 2x2 轴工作坊是将这种经验可视化的一次感知实践。

最后，在最终课堂演示的小组评估中，通过对两轴之间的便利贴的分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所有学生都能形成一些看法，将文化研究与他们的日常经验相互接合，描绘出技能、知识及其全球－本地特性之间的关联（或不相关）。而在最后的报告当中，学生们负责解释坐标轴上便利贴的分布，这也加强了他们在工作坊中的智识参与。在回应学生时，教师整理出各组 2x2 轴之间的差异，并就他们能怎样“放空”自己的日常经验进行了回答，这也是学生理论应用上的成果。最终，工作坊以教师的评语作结，结语陈述了对文化研究中日常文化的思考如何给予我们其他的“实践技能”，以另类角度来探索我们的世界。这可能引导我们想象不同的东西或是为它而行动。教师可由此评估这个工作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视为文化研究的教学挑战。

4. 结论

结合当今全球化世界中高等教育所处的社会背景，本文探讨了文化研究作为人文学科中的重要一支的跨学科特质。此外，本文还结合了最近的主动学习的模式，从我的亚际教学经验出发，探索了文化研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作为教学方案出现在课堂上。受到国内外社会转型的影响，高等教育过于强调“即插即用”的方法，而非提供更为广泛的理念和思想，在与

他者的耐心对话中，为维持和发展市民社会作出长远贡献。为了更深入地探讨这种社会环境，本文聚焦于日本高等教育的现状，而在其他一些受全球化影响更甚的亚洲国家，类似情况会更多。在香港，我举办了一个文化研究的实验性工作坊，将其作为发展学生批判性技能的教学尝试，以观察我们社会关系的内在复杂性，并且培养学生面对难以预测的、多变的世界时的适应能力。从一开始就至关重要，让学生们意识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是如何与全球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环境相联系的；也认识到它与其他社会的日常性之间的关联。通过将流行的主动学习的方法作为工作坊的工作风格加以利用，我试图说明教授文化研究如何能够在适用当代教学工具与方法的情况下普及全球化教育，尽管这存在着局限性。我们不该忽视，大学课程与学生处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因此组织跨文化或跨国的合作来分享和交换想法，会使得在亚际范围内教授文化研究更有成效。当然，如前所述，在教室中进行的文化研究实践应当与社会介入的技艺相接合，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我的通过主动学习模式进行的文化研究教学的实验方法，应当从这一角度进行审视。这种文化研究的课堂进路将引导学生经由日常狂热与日常消费来重新思考社会，并提供给他们一个机会来培养放空日常生活的技艺。

致谢

本文作者对罗小茗副教授（上海大学）在论文的选题、编辑和翻译工作上的帮助深表感谢；也感谢郑亘良博士（Ted）的邀请使本文得以面世。



做土的问题：文化研究“建制”在上海¹

罗小茗*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

——鲁迅《未有天才之前》

差不多十年前，王晓明老师在《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中，将如何在现有体制内开辟空间、保持活力，向其借力而不被其收编，列为在中国大陆开展文化研究的第一道难题。这是因为，虽“反体制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立场之一”，但集权统治之下体制对于资源的高度垄断、大学在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中的核心位置等现实条件，构成了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在学院内建制的必要性。²

在“硬着头皮挤入现行大学体制”十多年后，再来思考这道难题，便会发现，社会整体状况的急遽转变、大学体制的变革和文化研究开展的实际状况，已经为这道难题增加了新的条件、限定和补充说明，难题的重心

* 罗小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热风学术（网刊）》主编，著有：《形式的独奏：以上海“二期课改”为个案的课程改革研究》（2013）、《末日船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分析》（2015）；编有《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2019）等。近期发表《“业余”的位置：当“彩虹”开始歌唱》（2018）、《被切割的城市：当代中国科幻的城市想象》（2019）等。

1 本文首发于《文化研究》（台湾）第29期（2019秋）。感谢王智明老师的邀稿，让我有机会记录这一部分的观察和思考。期刊匿名评审对于此文的认真点评和详细意见，对于修改本文有非常大的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2 王晓明：《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罗小茗编：《反戈一击：亚际文化研究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文章列出的后两道难题是文化研究如何展开对社会良性变革的动力分析和文化研究的中土特质如何创建。对后两道难题，本文也有相应的思考，但限于篇幅，不做具体的论述。

也有所转移。至此，考察体制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准确位置 and 实际状态，捕捉反其道而行之的可能与策略，进一步思考文化研究与大学体制之间的关系，促其更深入地在地化，在吸纳欧美理论之外形成新的动力装置，也就变得格外重要。

一、变化后的现实条件

粗略说来，围绕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建制问题，现实条件的变化在于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是大学体制的日趋固化和善变。表面看来，固化和善变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但就大学体制十多年来的转变而言，却形成了一体两面、齐头并进的态势。

2003年，北京大学率先以数量化和核心期刊（SSCI、CSSCI）为导向的学术评鉴和聘任制度改革大学。尽管这样的方式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³，但整个大学体制——无论是教学改革还是科研管理，围绕这两个标准日益固化的趋势，并未改变。此后，中央、地方乃至大学自身，不断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处理由改革带来的新问题⁴。但总体而言，单一的评价标准不改变⁵，这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措施，让大学在固化的方向上越陷越深。

3 部分讨论文章收入了甘阳、李猛编的《中国大学改革之道》（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事后看来，围绕北大教改展开的这场大辩论，也是最后一次中国大陆学界不同思想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就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集体发言，形成争议，并引发社会关注。遗憾的是，这些言论对大学改革本身形成并没有太大影响。

4 这些问题包括：重视科研而忽视教学，强调数量而忽略质量，教育资源过于集中于部分大学等等。2012年，上海市教委下达《关于开展本市本科高校骨干教师激励计划试点工作的通知》，增设针对本科的教师坐班答疑和晚自习辅导制度；2016年6月，教育部官网宣布，对新时期高等教育做出新部署，“985”、“211”工程以及重点、优势学科建设等相关文件失效，统一纳入“双一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2019年2月，“翟天临事件”后，教育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26/201904/t20190412_377698.html）。2019年6月11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旨在整顿学界不正之风、强调科研诚信，http://kjj.jyg.gov.cn/kjgl/kjjh/201906/t20190612_466918.html。从这些意见的频频出台和事无巨细中，可以一窥当前学界风气之恶劣和问题之严重。

5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雷丁斯便指出了其中的关键所在：即一旦使用量化考核的标准，就意味着评价学术的权力势必为行政部门所掌握。【加】比尔·雷丁斯：《废墟上的大学》，郭军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31页。

同时，这一唯数量和核心期刊马首是瞻的制度改革，进一步弱化和掏空了本来就不怎么强健的学术共同体，导致大学体制不得不越来越善变。当大学忙于应付各类偏于形式的检查，行政部门以连坐/扣钱/解聘之法惩治教师，以放弃大学的独立品格、无视教师的个人尊严为代价，换取各类好看数据⁶的时候，也就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阻止大学的各个层级，将自身利益——首先是政绩好坏、仕途升迁，其次是“免责”与“懒政”——摆在教书育人和生产新知的公共职能之前。朝令夕改之事，变得稀松平常。于是，在量化指标的强光之下，大学体制一方面正变得越发固化僵硬，另一方面，却也因放弃了教育的基本原则而不断改弦更张。⁷

其次，当大学体制发生上述变化之时，体制中的学科和研究者的状况也在变化。在《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中，项飏通过勾勒知青一代学者的学术践行，提出了对学术规范化之后学界中人的担忧：

虽然公务员和体制内学者在2014年以后都反对1990年代末以来的“维稳”政策，但是他们归根到底是要维稳的。维稳是其最大利益所在。在课题选题、工作方法上“唯上”，心中的目的是要“维稳”。⁸

这一学术生产的实际状况——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日益“和谐”与“共情”，带来了文化研究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挑战。

它具体表现为，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大陆二十年来，其挑战既有学科边界的难度，远没有在西方学界那么大。这是因为，将欧美理论及时吸收

6 在这里，数据的好看不光是指科研发表和项目经费的数量多少，更重要的是毕业率、就业率、考研率、国际生比例、获奖和保研比率等一系列大学考核指标的高低。

7 长期以来，在乡村社会的研究中，人们特别关注中国社会中官僚体制自身的变化。比如，欧博文、李连江在《中国乡村中的选择性政策执行》便讨论了这一变化，指出“一种选择性的政策执行的模式已经在中国的乡村中形成。许多干部尽职尽责地执行着不受村民欢迎的政策，但是却拒绝执行其他那些受村民欢迎的政策。”（<http://www.aisixiang.com/data/39088.html>。）遗憾的是，当相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城市社会或相关机构中时，却少有人关注和研究。一方面，人们意识到“懒政”和“免责”普遍存在，但另一方面，这些究竟会给城市社会，比如像大学这样的机构，带来什么变化，却显得比乡村治理问题更像是一个禁区。

8 其后，项飏准确地指出法兰克福学派——这一重要的文化研究源头——的独立性：“独立性确实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20世纪初能够形成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它的独立，不是独立于政治和社会，而是独立于已经独立了的学术界。”项飏：《中国社会科学“知青时代”的终结》，《文化纵横》2015年12月刊。

进社会人文学科，是中国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传统。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也隶属于这一传统。同时，自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社会人文学科的历史积淀本就不足，新的学科系所在社会需求之下不断涌现；在大学拥抱市场的过程中，基础学科又往往被边缘化。所有这些都使得既有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内在理念和价值，远不是那么明晰有力。至此，将一个学科有力统合起来的，与其说是值得捍卫的学科理念与价值，不如说是由教育部的学科目录、学术规范、课程考试、学位制度、期刊会议所构成的一整套学科制度。在此过程中，学界中人往往高度依赖于这一系列规范化的制度章程来锚定自身的位置。这使得人们对于体制和规范的敏感性和警惕心，持续减弱。⁹ 特别是，在任何情况下，中国学界都有一个无从反抗的对象——政治审查制度。这一下线的存在，使得其他制度的“不当”色彩，大大减弱。最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社会人文学科内部相对独立的自我推进的逻辑，尚未牢固确立便被打翻在地。这些身形不定的学科，很难成为持续对话的对手。以挑战既有学科的“顽固不化”，获得自身合法性和进步性的文化研究，据此展开演进的动力，也就格外不足。而体制外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稀缺，又使得文化研究找不到更好的结盟与对话的对象。¹⁰ 至此，这一前进动力的双重匮乏，构成了文化研究在中国大陆持续推进时的特殊困境。

最后，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现实条件——受教育者，也在发生急速的转变。尽管事后的追溯往往将一个学科或流派的确立壮大，功劳归于少数著书立作之人，但实际上，那些对未来有着好奇、对现实有着不满的年轻学

9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于体制的感受力和辨别力的下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状况。究其原因，大概是这样几类。其一，自89之后，去历史化的学校教育和社会氛围，使得“政治冷感”成为青年一代的普遍状态。而现在，这些青年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其二，中国共产党将自己的定位解释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其实质是将权力层层包裹在一整套制度程序和治理术之中，显得不那么刺眼。其三，自“中国崛起”以来，党国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视为政权的合法性依据，这造成了全社会，特别是思想界知识界，对于“国家”、“政权”等问题在全球语境下的进一步分歧。这些因素彼此叠加，相互影响，形成了人们对于“体制”，或熟视无睹，或为之辩护的局面。

10 因为生存环境恶劣，体制内外的机构或团体，实际形成的是一种抱团取暖、交换资源而非诤友的关系。

生，他们的生活直感和热情呼应，对于新的问题领域的形成和学科更新有着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表面上看，是老师在开辟新的局面，领着学生往前走。若定睛细看，又何尝不是学生更本能地呼应着时代的冲击，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方式，催促着老师们前行。

然而，对文化研究来说，这样的“前浪”和“后浪”之间的推动关系有所改变。作为另类的研究计划，文化研究从不指望“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却也期待偌大的中国社会，总有那么几条漏网之鱼。可惜的是，在一个乍看起来多姿多彩，实质上生活的丰富性和可能性急速缩减的社会里，这样的期待越来越落空。¹¹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不设本科。¹²最初的目的，是希望学生经过四年本科的学习，积累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之后，再来接受以问题为导向的文化研究的训练。但是，在前两种变化的作用之下，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严重下降。四年的大学教育，既无力为广大学生提供相对稳定的专业知识，也不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这意味着，一旦进入研究生阶段，传统学科的学生还有可能通过加强专业训练，依照学术规范，依样画葫芦地撰写论文、换取学位的话，考入文化研究的学生则发现，自己所须面对的挑战，远不止于此。这不仅是因为，对文化研究来说，依样画葫芦的“好事”根本不存在，也是因为，就连阅读和思考都无法按部就班、照本宣科，而不得不在随时随地的反思中进行。而这恰恰是一路接受着应试教

11 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养成了将社会希望寄托于青年之上的新习惯。虽“一代不如一代”是每一代人都会有的感慨，但社会在青年身上看不到希望和热情这件事情，既是百多年来头一遭，也是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逐渐富裕之后的一个新现象。这并非文化研究独有的困扰，而是整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12 2004年，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成立，当时的设想便是不组建文化研究的学士学位课程，只提供本科选课。发展到今天，文化研究系提供给学校和学院的本科选修课程有5-6门。2012年，经教育部审核批准，文化研究成为由上海大学自主增设的二级学科，获得硕士和博士的招生资格，并于当年正式招生。迄今为止，共招收博士生17人（其中外籍3人），硕士生29人（其中外籍1人，非中国大陆籍1人）。其中，已毕业博士生4人，硕士生16人；博士毕业生多进入大学或研究机构，硕士毕业生除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5人外，多为公务员、媒体工作者和自主创业者。近十年来文化研究系所展开的制度建设和教学实验的状况，可以参考罗小茗在《作为空间的中国大学：来自文化研究的“课堂”观察》中的记录和分析，许宝强编著：《批判式教学碰上新世代青年：中港台教育研究》，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育的标准答案、习惯了与权威相安无事、事不关己地成长起来的青年，最感不适之处。面对这样的挑战，知识储备、心理能量和思考能力的不足，势必让他们在前行时产生更多的畏难情绪，更不容易确立起对自己的信心，更遑论以“后浪”的姿态面对时代了。

至此，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和体制发生关联的现实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如果说，文化研究一路走来，其在英美诸国获取进步力量的路径，在最初的十多年中尚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和实施效果的话，那么现在，这一路径已基本失效。站在反体制立场上的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建制问题”，已经由“是否/如何进入体制”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即如何在上述现实条件中，重新确认立场，锁定对手，装配起文化研究往前发展的新一轮动力装置。

二、“文化事实”的累积

不难发现，在这一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不管是围绕大学体制展开的现实，还是更为广泛的中国社会状况，文化研究对于“文化”的强调，不仅依旧有效，而且越发关键。这是因为，这一对“文化”的强调，直接针对和持续挑战当前社会体制的运行后果——随着集权体制-量化经济-网络技术的套装的深入，中国社会失去了整体性地理解、把握和克服危机的能力。就此而言，深深的无力感越是包围着人们，将人撕裂为不可对话、缺乏共识、也无从合作的散兵游勇，将“文化”视为一整套将他们囊括其中，由生产组织、家庭结构、制度结构乃至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形式等所构成的特殊的生活方式，并对此展开分析，也就越发成为一个社会展开自我理解，而非将其拱手让人时不可退让的据点。对于当下这一种生活方式，观察得越仔细，记录得越清晰，分析得越深入，它在历史长河中的特殊和短暂，也就越发显豁，被其全然控制的无知和恐惧，也就不那么容易霸占人心。

问题在于，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化研究应该展开什么样的立足于“文化”的记录和分析，方能真正占据要津、牵制全局？在这里，文化研究的方法需要被重新讨论。

一直以来，文化研究主张，根据对现实的判断和对问题的理解来选择方法。此处的现实，既非泛泛言之，也不是一般的社会论断或主流媒体的话语呈现，而是明确指向以完成漫长的“文化革命”为目标¹³而被持续捕捉，以便展开分析、批判、改进和累积的“文化事实”。¹⁴这意味着，当文化研究跟随雷蒙·威廉斯脚步，将展开文化分析的目的确认为促成良性文化的完成之时，如何以文化之名，将那些隶属于文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或传播学等等的现实材料，经由整理、分类和解析，使之成为“文化事实”，由此纳入文化革命的视野？如何确认在这一过程中，被如此分析的“文化事实”，其所具有的客观属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延续/断裂和累积？如何对这一收集、分析、研究的过程展开检验和反思？这些都构成了需要仔细讨论的方法上的问题。因此，就在体制内展开的文化研究的学术工作来说，其步骤势必包括：首先是捕捉、辨别和整理一部分的社会现实，将其整理归纳为“文化事实”，其次是从良性的社会文化生产的角度，就这一部分事实展开分析和判断，最后才是据此做出相

13 雷蒙·威廉斯以“漫长的革命”命名这一文化上的巨变，指出：“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理论上的危机，理解我们的真实历史或是我们目前的现实状况以及转变的条件，那么就必须始终努力把这个过程当作一个整体来把握，以新的方式视其为一场漫长的革命。”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14 在这里，“文化事实”的命名来自于对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的改造，以区别于未经整理的散落于社会之中的各类现实。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二版序言中，再次解释了在当时引发极大争议，此后成为社会科学基础的“社会事实”这一概念。他强调：“凡是智力不能自然理解的一切认识对象；凡是我们不能以简单的精神分析方法形成一个确切概念的东西；凡是精神只有在摆脱自我，通过观察和实验，逐渐由最表面的、最容易看到的标志转向不易感知的、最深层的标志的条件下才能最终理解的东西，都是物”，而将社会事实视为“物”来展开研究，承认社会事实的客观实在性，是其确立自身方法、建立社会学科时最基本的规则。（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页。）对文化研究来说，迪尔凯姆面对争议时特别强调的“社会事实”的整体性和公共性，是文化研究在确认“文化事实”时无需过多讨论的共识。反倒是将文化的改造过程视为一种需要被物化的对象，重视它的客观属性和由此而来的延续性这一点，需要更多的讨论来澄清。然而，自文化转向以来，建构主义的思路已经深入人文学科的骨髓。对于“文化事实”的建构过程所具有的客观性、物质性和可供检验的可能，又往往因为文化研究总拒绝成为一个学科，因此也不介意其研究对象是否区别于其他学科而具有独特性，而被大大忽视了。

应的诊断、建议和进一步的理论概括。然而，就目前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而言，这三个步骤之中，最为薄弱、令人犯难，也最不被重视、缺乏讨论和思考的是第一步。¹⁵

仔细分析的话，文化研究的第一步之所以迈得如此艰难，源于这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在“中国速度”的指引下，社会空间迅速变迁，网络技术日新月异，审查制度更是日益苛严。所有这些都使得，无论是在实体还是虚拟空间中，散落各处看似经济技术实则发挥着重塑心智的文化作用的现实，其效用越来越强，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而留存的时间越来越短。未经整理的文化现实的随时消失，已经成为一种常态。¹⁶ 人们还未来得及从文化的角度展开甄别和评价，形成“文化事实”，并由此生成“选择性传统”，它们便已经过时和隐形了。¹⁷ 比如，就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进行的“都市青年居家生活调查”来说，十多年前在城市中心还随处可见、到处耸立的巨幅楼盘广告，已经销声匿迹。日后，人们虽可以从报纸和影视剧里，找到“居家生活”的兴起和成为强势文化的只言片语，但这一曾大规模覆盖城市的文化事实，却已经被后续的城市空间充分内化和迅速抹除了。¹⁸ 再比如，1998年被认定为中国大陆网络文学的起点。仅仅20年之后，人们再来回顾这一历史时，最大的感叹便是网络文学作为研究对象，其灭失的速度何其惊人。¹⁹

15 粗看之下，这和文化研究最初是以一种西方先进理论的面目进入中国大陆学界有关，实则不然。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始终盘旋于最初的阶段，而无法进入下一个阶段。大学体制固然是其成因之一，但对于方法讨论的匮乏和笼统，却是文化研究的自我认识的问题。特别是，当这一步——“文化事实”而非别种类型的现实的捕捉、辨别与整理，实际上是很难通过笼统地向别的学科——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政治经济学——学习具体的方法的，自动完成时，更是如此。

16 在这里，还不止是指以“404”的方式大声宣告的即刻消失，更多的是在人们毫无意识的情况下的悄然不见，以至于看起来从未存在过。

17 一个现成的例子是微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查看它历年来的版本更新记录。其中，引发争议的更新和它的更新频次比较起来，数量是极少的。比如，2018年对于朋友圈“三天可见”的议论。

18 2019年5月31日，文化研究系“数码文化与社会”硕士课程的总结讨论。

19 何平：《行将隐失的证词》，《热风学术（网刊）》2018年冬季刊。显然，这一出现和消失，不光是狭义的作品内容，也包括它是以何种技术手段呈现、经过审核的过程、被浏览的数量和分布时间以及在何种网络分

显然，政府部门、资本和媒体对积累和保存曾经发挥过作用的文化事实，兴趣不大。甚至于，他们努力的方向恰好相反，那就是不断重组现实，以便让某一种片刻的文化看起来“永恒”与“唯一”。这种操纵现实的做法，使得人们活在越来越短促的当下。社会记忆被不断破坏、拼贴和重组，只能以一种悠远的文化怀旧的面目、作为此刻的装饰品出现，而不具备与当下这一种现实展开辩驳的能力。²⁰

其次，对中国大陆文化研究而言，这个文化事实未经整理便过快消失的问题，一直以下面这样的面目出现。那就是，对于那些新的社会文化现象，特别是其中的一大部分都是由主流媒体推到人们眼前的社会热点，文化研究是否需要和如何及时关注？予以关注、展开研究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对文化研究的学徒们来说，这一困扰是非常直接的。一方面，他们的日常生活浸润在媒体世界之中，社会热点往往牵动着他们的兴趣。及时思考这些文化现象，对此发言，是文化研究特别鼓励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发现，实际做的似乎不过是用“文化工业”、“消费社会”、“新自由主义”或其他刚学会的理论名词，批评一通，好似一场换汤不换药的练习。²¹ 更经常发生的事情是，等他们好不容易做了一番研究，觉得可以发声的时候，社会热点早就移到了别处。这样的经验，难免让人感到疑惑和寂寥。

在过去，对于这样的困扰，通常的回答是，这些五花八门、时时翻新的文化现象背后，是一整套上世纪9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通过对它们的调查和研究，来勾勒这一背后的机制是有意义的。这样的回答虽正确，却回避了文化研究在捕捉和整理文化事实时因速度和标准

类法中被放置和引发讨论等等。

20 熟悉网络技术的人也许会说，只要在网络上存在过，那么就一定可以找到。的确如此。但问题在于，人们必须先知道自己要找的是什么，才能在网络信息的海洋上较有信心地出发，展开“IT 考古”。而这种寻找和重组“文化事实”的能力，恐怕又是技术无法代替人来完成的。

21 《视界》是90年代末21世纪初在中国大陆推动文化研究的重要刊物。在第7辑，在发布一组本科生的文化研究论文的同时，《视界》刊出旷新年对文化研究的批评文章《文化研究这件吊带衫》，批评文化研究的套路化严重。可见，这个问题从一开始便存在。

而遭遇的挑战。前者表现为，与文化相关的现实总是消失得过快而文化研究的反应总是“显得”过慢，而后者则是，捕捉和记录的判断标准，到底由什么来决定。

实际上，上述困扰蕴含的是在捕捉此起彼伏的文化现实、将其确认为“文化事实”时的第二重难度，即文化研究是否有自觉和有可能从“理想的文化”的角度，建立起记录和判断现实的相对独立的节奏和标准？特别是，当今天的经济活动大规模以文化之名展开，文化往往被高度挤压进经济和政治的维度之中，难以自成一体的时候，更是如此。而在一个整体把握能力严重受损的社会中，这一难度，无疑是大大增加了。就此而言，一味向社会学、传播学或政治经济学要求方法上的输入，不仅无助于文化视角的形成，反而会模糊这一问题，让其被海量的数据、信息和概念淹没。

第三重的难度，来自于研究者个人近乎无意识的情绪和态度：对于当下此刻的现实的不耐烦、轻蔑和逃避。这样的情绪和态度，恰恰是在第一部分所讨论的现实中逐渐养成的。认为现实糟糕，并有更好的社会状态可以追求，是文化研究的起点。但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和大学体制显然以此为起点，规划了多条逃逸路线，使得人们从批判现实出发，或通过高深的理论或通过半古的史料绕道而行，离现实越来越远。这其中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逃逸路线的映衬之下，认为对于当下的认真刻写和努力争夺，是无意义和不值得做的，“不是学问”。一种是充分认识到当下很重要，但因整个教育和学术的训练都是教人对当下袖手旁观的，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如何着手才好。第三种则介于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如果上面的分析大体不错的话，那么，这些困难实际上也为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些有待确认的共识：

首先，对于文化现实的争夺、命名和保存，是“文化事实”得以形成和持续积累的前提，也是文化研究想要在中国现实中确立自身时不可避免

的基本任务之一。这是因为，在当前的社会状况之下，对于文化事实的整理、保存和累积的工作，既是文化研究对现实摆开自己的态度，形成言之有物的批评的基础，也是其拉开与权力/体制/资本的距离，通过保存不同的社会记忆和现实类型，形成自己的问题领域和思考节奏的依凭。

其次，进一步的文化研究“建制”工作——从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到评价方式，也应该围绕加强文化研究争夺和积累文化事实的能力、建设相配套的学术平台而展开。这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将文化研究反体制的立场，更具体地落实在体制之内需要思考和推进的议题。

最后，对于运用当前的学术体制培养什么人的设想，也由此进一步明确。那就是通过聚焦于上面这一基本任务，吸引不知道怎么办和仍在犹豫的后两种人，更踊跃地加入到对文化事实的刻写和保存之中。而这一对人的培养，显然不限于为大学体制输送教师，也包括在各类文化事业之中、同时参与此项任务的毕业生。

可以说，越是意识到在当代中国最终腾挪定义“文化”的权力之手，越是充分理解到左右着上述难度的决定性力量，就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真正需要严肃思考、认真筹措的，是正视上面这些困难，为文化研究开足马力捕捉、定义和整理“文化事实”，制定更加实际的战法。

三、“考现”的共识与方法

以上述任务来打量既有的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特别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的工作，便会发现这样两个不足。

首先，全系上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其展开学术研究、理解资料的方式，仍是颇为个人的和“学术”的，或者说是遵从既有的学术规范的。尽管文化研究从不看重数量，也不对核心期刊另眼相待，但这两点

“否认”，只是对既有的糟糕制度做减法²²，而非“别立新宗”。虽然我们有当代文化研究网和《热风学术（网刊）》，来发布和保存所有无法被“知网”化的论文与文章，但其取舍的标准，仍不脱学术观点或批评意见的范围，而不涉及对于文化事实的记录、保存和积累。对于已经展开了研究的文化事实的保存、公开和共享，更是阙如。

仍以之前的“都市青年居家生活调查”为例。此项研究的最终结果，是发布论文和出版一份10万字左右的研究报告，供相关的研究者和有兴趣的人阅读。虽然研究是在拍摄大量的实地照片、大规模收集住房广告和相关政策、整理近1000人的问卷数据和20多组访谈的基础上，得出上述报告和结论，却从未想过应该将这部分的文化事实的资料，充分档案化、数据化，从而保存、分享，供后来这一问题领域的研究者使用。²³而这项研究所针对的文化事实的不保存/不公开，将导致两个后果。一是，研究观点，特别是对于现实的归类 and 看法，变得难以检验和接续。二是，这样一来，由这项研究努力开辟出来的新的问题领域，也就很难有真正的积累和认真的推进。

实际上，对于这一点更有直觉的，反而是学生们。回想起来，在硕士学位论文中，各类现场照片、网络截图、数据地图，作为可视化的证据，越来越多地出现。但作为证据进入论文，最终进入“中国知网”的毕竟是少数。如何让大量的在调查和研究过程中被辨别出来的“文化事实”——它们显然经过了从文化的角度展开的初步分类、整理和加工，得到更加系统的保存和分享，成为一种有意义的累积和贡献，如何呈现使之得供后来者检验、思考和接续，则是文化研究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22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又何尝不是对于此刻当下的不耐烦、轻蔑与逃避的一种表现。这种态度常常表现为对于制度的单纯的否定或“回避”，而非更积极地反其道而行之的建设。这也许是因为，在这个体制内浸泡得越久，人们就越容易把单纯的否定想象成一种建设。

23 这当然可以说是从中国现当代文学转移到文化研究之中时，研究方法的惯性所致——现当代文学虽有版本学，但没有如此迫切地保留“文化事实”的问题。但如果仔细推究的话，又何尝不是对于当下的傲慢和对于“观点”的过于看重所导致的文化研究方法上的盲点。

其次，文化研究在学术评价方式上，过于看重对现实的看法或创见，却对分类保存和积累文化事实这一部分的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就对于创新的偏爱而言，文化研究和当代学术体制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基本同构。在这样一种评价方式之下，文化研究的学术工作，变得神秘起来，而非与现实展开短兵相接的非常实际的劳动过程。但实际上，离开了第一步的文化研究，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创造。唯有真切地认识到什么是“旧”，方有可能准确地把握到与之相对的“新”。在教学和指导论文写作的过程中，这种评价方式上的厚此薄彼，则更直接地表现为，学生们宁愿躲在图书馆里读理论，也不愿意展开实际的调查研究；又或者，明明做了很多实际的调查研究，却因感觉不到它有价值而更加焦虑。这当然是因为整个学术体制都在暗示他们，前者才是更重要的。但同样也是因为，明知如此，文化研究却没有更明确地修正这一评价方式，也没有给出更切实的行动方向。

好在只要意识上这两点不足，对文化研究有利的现实条件和相应的改进措施，也就随之涌现。

最基本的一点便是，今天的年轻人对于网络技术的亲近感、接受和学习能力，远远高于非网络原住民的前辈。无论是利用网络上大量的免费软件和小程序，分析网络直播和弹幕评论，还是将其运用到实体空间之中，对于文化事实做数据记录、分类和保存，都是他们擅长的部分。如果能够在文化研究的课程设置和讲授上，打破“文科生可以不懂技术也不需要掌握新的网络技能”这一类的惰性观点，鼓励他们这一方面才能的学习和发挥，那么，他们对新事物和新现象的热情，不仅有了用武之地，由此而来的独特能量也将被大大激发出来。

第二，充分利用既有的学科制度，改变文化研究对于学位论文的指导 and 评价方式。也就是说，不仅要在课程设置中加入对于如何收集、保存“文化事实”的技术、方法的学习和讨论，教学相长，更要在学术论文的

写作中予以明确的要求，确保它的完成和呈现。这意味着，文化研究的学术论文将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研究对象的相关资料的数据化和档案化，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对于其所研究的“文化事实”的分类整理和理解思路，另一部分才是基于这些资料的后续分析和深入思考。

第三，对于后一部分的论文，“中国知网”会予以保存²⁴，教育部会加强抽检。而对于前一部分的论文，文化研究则鼓励在当代文化研究网上以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予以保存和分享，以留待后来的研究者们的使用、检验、比较和更新。

如果上面这些有利条件可以被充分运用，相关措施可以真正落实的话，那么，将可能进一步改善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的现实处境。

这首先是因为，随着文化研究内部评价方式的改变，将文化事实充分数据化和档案化的能力，实际上构成了青年一代独特的“后浪”优势。就各色文化现实展开的将其更好地分类、保存和分析的学习过程，使得他们可以和老师之间形成真正的对话关系，而非一边倒的“受训”。以档案化、数据化的最新技术为媒介，以文化事实的保存为目标，代际之间、同侪之间相对良性的彼此对话和挑战的模式，有可能逐渐形成。

其次，当这一文化事实的保存和积累得以展开的时候，文化研究也就获得了新的动力装置。在这一动力装置中，它的对手是任意展布着现实的权力，它的研究对象，是在这一任意展布的过程中，不断变化和形塑人们的心智结构的文化事实与权力逻辑。它得以前进的方式，是对于这一持续变化的对象孜孜不倦的保存、分析、分享、检验和更新，从而为获取整体性的把握和理解能力做积极和沉着的准备。通过这一装置，文化研究者们

24 因写作本文的需要，我在知网上查询了本系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收录状况，我意外地发现，知网对此的收录似乎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各中原因不得而知，但并非文化研究系所有的研究生论文都可以在知网上搜索和下载到，却是可以肯定的。而从研究生教务部门得到的回答，则是他们也没有文化研究系所有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名单可供查询。至此，虽然本系的历史并不长，但这一部分的信息，却已经开始消失了。

的努力，在被“中国知网”和大学评鉴体制分解成一篇又一篇仅以引用率串联起来的学术论文的同时，也将高度聚焦于对于文化事实的集体保存、积累、思考和建设之中。

最后，当这样一个文化事实的保存、积累和分享平台开始出现的时候，围绕这一目标和理念的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也将变得更有可能。这是因为，这样的保存、累积和分享，既无法靠个人，也无法仅靠一个系所单枪匹马地完成，而是需要说服、吸引、带动有着相当共识，愿意以相类似的方法展开学术操作和知识共享的人们，协力完成。这一共同体的初步目标，便是分辨和积累当代中国的文化事实，使它以相对完整的面目得以保存，作为此后人们对这一时期的文化类型和功过是非，展开比较、评价、反思和批判的档案依据。而一旦如此，那么这部分工作的是非曲直、功过好坏，也就摆脱了当代大学限时限刻的评鉴标准，拥有了自己的历史坐标。相信这一点，对于很多学术中人，会有不小的吸引力。

也许有人会说，这不就是把研究资料以数字化的方式公开出来，根本不是什么新玩意。的确如此。早就有人将自己的研究和所有的资料搬上网站，实现共享。不过，这些做法往往被视为研究者的个人兴趣和方法，而非文化研究发展的整体方向。而这也是把这样的步骤，作为文化研究“建制”来谈论和推动的意义所在。也许有人会说，把文化研究定位于对“文化事实”的搜集、整理和积累的工作，这样的定位和期待太过悲观，竟好像是在做最坏的打算。的确如此。好在这个时代，最不缺的就是悲观。我们却也希望，上述思考可以让今天的悲观适得其所，实现它们的价值。

还记得，初入文化研究的天地，我曾把它想象成一场整装待发的华山论剑。后来才慢慢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华山。于是，便常常想起文章开头所引的鲁迅的这段话，觉得文化研究需要的，不是不断立志发愿，

出发去不存在的华山，而是大家一起，就地来做土的沉着和耐心。在那段文字的后面，鲁迅接着写道：

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2019年6月23日初稿
2019年6月28日修改
2019年9月11日修改



文化研究怎么办？

——一个高等教育体制边上的兼职者笔记¹

郑亘良*

一、文化研究的实践与高等教育体制

文化研究学会于 1998 年 11 月在台湾成立，文化研究在台湾的体制化至今已超过二十年。文化研究作为一种批判性的知识，受到后马克思主义、欧陆哲学与批判理论等知识影响，其在台湾发展的一个重要脉络是文化批判，可追溯到自 1980 年代以来，因应台湾政治与社会转变而兴起的文化批判或文化评论。透过报纸副刊与评论，文化评论尝试批判新自由主义政治，以及台湾的政治发展与各种兴起的文化与社会议题。文化研究走进学院体制，除了多位参与者在学院外，主要系因应副刊空间紧缩与反对能量的体制化，因此文化研究的实践选择转进学院，是期待学院可以成为批判知识与实践的连结界面（陈光兴 2000：14-15，18-21）。

“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也于 1990 年代末成形。如王智明（2017）描述，台湾处在全球地缘政治边缘与暧昧的位置，一方面台湾的思想与理论资源深受到中国、亚洲、西方（主要是英美）的影响，

* 郑亘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博士、成功大学台湾文学系钟秀梅副教授研究室兼任研究员、《新国际》编辑。

1 对于文化研究在台湾的体会与想法成形，特别感谢王智明老师与孟哲推动了 2018 年文化研究年会的“文化研究二十年：新世代的展望”场次，该场次最后的修订文章《文化研究在台湾体制化的 20 周年：再思文化研究教育的政治空间》将于《文化研究 Router》的文化研究 20 周年相关专题发表。延续了那场的讨论议题与状态，刘雅芳与罗小茗两位老师于今年（2019 年）的文化研究年会上，特别找了一些朋友再组了“‘我们不是来拼桌’：亚际文化研究二代的学术组织与知识生产”场次，这篇讨论是依据该场次的发言修改而成。这篇文章特别感谢两场论坛前前后后的与谈与讨论，尤其是小茗老师与智明老师、雅芳、亚筑、馨文、Eno、Kris、阿焦、孟哲、宗坤、宋、颖欣、郭佳、芳慈、Bonnie、哲玄等朋友。

另一方面又面对着殖民主义、全球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的趋力，所以“亚际文化研究：运动”计划（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 Project）试图以知识运动，连结在地与国际，希望以国际主义、第三世界的视野打破台湾的知识与历史视野，尤其是1990年代出现的狭隘的本土化政治。

“文化研究”与“亚际文化研究”在台湾有介入社会、发展左翼第三世界知识思想的色彩，其透过高等教育体制进行介入的方式，包括大学的教育、组织学会、形成被教育研究单位认可的学门、刊物的出版、会议与交流论坛的举办、研究经费、办公空间、行政人员等，都与学院体制的资源支持与分配利用息息相关。因此，谈文化研究的意义与未来，难以略过学院体制所提供的物质基础与面对的问题。

二、无论如何先卡个位吧？！

“无论如何先卡个位吧！”如果还想要利用学院的空间做点事，这是不少前人的忠告。在高教体制中“卡位”意味什么呢？台湾的高等教育面对了三个环环相扣的问题：第一个是从冷战到后冷战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台湾遵循并深受美国知识生产的规则影响，国际化与专业化的要求是以高度工具主义与服务产官学为目标（陈光兴、钱永祥2004：183-187）。第二个是为了因应专业化要求，高等教育体制以商业市场主导的KPI主义与量化评量指标作为评估的标准，研究看重国际引用指数、行政看重招生量，学术志业变成商业利益。第三个是特别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资本主义矛盾加剧后，整体高等教育面对财政经费的紧缩、人口成长萎缩（少子化）、以及工作贫穷化带来恶化的劳动状态（更多的弹性约聘），专业化与市场化的要求变本加厉。

在这样的处境下，实践文化研究通常面对的问题是：当文化研究强调透过跨领域的知识及方法，以解释并介入社会与文化议题时，如何在既有

的学科分类与专业化要求下，定位、进行文化研究？尤其，对于有志于在高等教育体制“卡到位”的青年文化研究者，这个问题具体为何？

一般而言，毕业后的新科博士会回归自己相关的系所，例如传播、社会、文学，或者通识教育。但也有几种状况，例如，曾听闻一位朋友的学历被归类在传统工科，但是其系所的研究方向也涵盖了社会、历史、文学等相关议题，其向人文社会学科等相关系所求职时，就面对了工科学历如何能受到人文社会学科的体制认可的问题。又或者，像是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是以文化研究命名，因为目前鲜少有直接相应的学科，通常博士毕业后的年轻文化研究者，便回到硕士时期的学科专业，或回到与目前研究较为相关的科系，例如我的同学中，以青年教育培训为主题的同学最后回归社工，艺术设计背景的同学则回到设计，关注非洲议题的同学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于非洲研究相关中心任教。而我本科与硕士毕业于英文系，但是我的研究关注已经偏向社会学，这使得我的“卡位”需要找类近研究方向的系所，或者通识、社会学等科系，反而难回到一般以语文训练或文学研究为主的外文系栖身。这些状况说明了科系的专业化分类训练与文化研究跨领域的方法介入之间，存在着学科边界的张力。当然，这个边界同样地也随着个别系所的取向或偏重的方向而有所不同。

当顺利卡到位时，以研究来说，当研究的方向不只是既有学科所关注的议题时，研究者又面对了如何让自己的研究被既有的科系接受，以及研究者如何从中找到关连？特别是，在专业化与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发表被视为是重要的评量指标，而且是以国际期刊或CI (citation index) 的发表数为标准。在传统科系中，如果文章发表在文化研究的期刊上，可能会被质疑研究不够专业，所以发表就需要兼顾发表在相关的学科期刊中。同时，如果文章是发表在CI的国际期刊，研究的问题意识往往是以现今国际或西方流行的理论问题为先，这也容易抹除了“文化研究”批判介入在地议题的特性，或者沦为西方普世理论下的特殊案例。同样地，教学上，

特别像是私立学校或者通识课的新进教师或兼任教师，仍是以被期待教授基本应用能力或知识为主，因此如何开授或在既有课程中置入“文化研究”，也是一个常常需要面对的问题。简言之，文化研究的取向与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化、乃至商业化的要求存在着张力，但是同时文化研究也依附在这些体制的资源之下，所以如何定位、与体制的游戏规则找到平衡，是“卡位”面对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在经济紧缩与可分配的资源更为减少的条件下，高等教育体制为了因应市场化，更要求系所办学绩效与透过弹性化劳动来减少人事行政支出，研究者与教师的劳动条件因而随之下降。通常，刚毕业的博士能找到的位置，除了博士后研究，就是兼任教师与项目教师。依据 2017 年的统计中，台湾的大学兼任师资人数已达 24,889 人（其中 8,118 人为“纯”兼任老师），粗略概算有近三分之一的学分数为兼任老师所承担，但却与专任教师同工不同酬，并面临制度性的压制，而且缺乏基本的工作保障与规范（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2017 年 6 月 12 日）。同时，为了赚得至少基本的生活费用，兼任教师其实能做研究的空间与时间也相对不足，所谓批判介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过度劳动问题。如果能够顺利应聘上项目教师，在一年一聘之下，如果后续没有经费，或系所已经无意聘任，学期还没结束就要开始担心下一份工作。兼任教师与项目教师变相成为高等教育体制中的廉价劳动力，更有一些案例是系所不愿将资源投入专任教师聘用，而是以兼任老师与项目老师来补充师资的不足。至于相对有保障的专任教师职位，通常轮不到新科博士。就算顺利取得专任教师的位置，除了升等与教学的工作以外，新进老师常常需要负担各种评鉴、招生、实习等行政工作，过劳的状况也是非常普遍。

许多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们，对这两个问题一定有许多具体与迫切的感受，以及有着个人各种应对的策略。但是，在高度专业化、高度个人化的要求、以及普遍过劳的状态下，如何整体性地检视与分析高等教育体制的

问题，又或者是如何进行集体组织的实践方式？目前似乎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分析与组织的速度似乎还难以跟上高等教育紧缩（或崩坏）的速度。

三、高等教育体制边缘上再思文化研究

如果高等教育体制的问题是一个更为普遍的资本主义矛盾的一环，而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的运动，除了进入体制“卡位”之外，在高等体制边缘或外进行文化研究，可能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是一个四岁女娃儿的爸爸，另一半为了能争取到一个更稳定、收入更有保障的位置，每天工作十几个钟，与女儿的相处就短短的一两个钟不到，捱到休假总是在补眠与撑起精神的状态，被精力旺盛的女儿拖着。照顾女儿的责任通常落到家中两老与我身上。晚期现代的育儿变得更为精致，网络上满满各式各样育儿的家长分享与专家建议，育儿者除了要吸收这么大的信息量（尤其这些建议有着相当注重个人情绪教养的趋势，因此也相当要求育儿者的时间与情绪），同时因为生孩子的人少，小孩很难找到同个社区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一起玩，大人还成了大玩偶。有时，因为家人能一起分摊家务与照顾，我能有几个短暂的空档做我的兼差工作，好一点时可以做点研究；有时，我必须趁那个电池始终满电的小孩能自己玩时，赶快回复信件；有时几个早上，我正以为我可以有一个完整的时间段做事时，孩子提早醒了，我必须暂停；当这孩子突然没电睡着的时刻，通常我的电力也快耗尽了。“文化研究的意义？”“高等教育商业化的逐利”“青年研究者的困境”“厌世”“体制的边缘”“业余的研究者与编辑”，……，半夜12点钟，我草草地列下几个关键字，很想说些什么，但脑子已经在放空待眠的状态。

这是个晚期现代的个人处境片段，时间零碎、工作过劳或不稳定，而

各种所谓专业的信息过度爆炸，非常强调个人自我管理的能力。而知识生产需要相当专注的时间消化资料与书写，如何在碎片与不稳定的时间中找到片刻，的确需要所谓的“管理”。而管理，尤其是钱的管理与时间管理，往往是有余力才能思考的事，更多时候是每天被各种时间（截止日、时效、效率）、各种账单追着。所谓管理好的背后，虽然意味能对既有的资源与时间进行有纪律的协调与安排，有时候就是花钱外包，或者有时依赖着其他人（特别是家人）来分摊或分工（好的状况），或补网（累死彼此的状况）。一方面，我作文化研究受到既有的位置限制，例如家务劳动与兼差下，我没有一个固定的体制与时间支援研究，时间有限、图书资料特别仰赖公共图书馆、没有学校补助开会经费、研究与调查的时间短，研究与劳动之间某个程度不是直接相关、可以互相互补。然而另一方面，我的研究方向与议题，也比较不立即需要面对学院体制的评鉴与规范（虽然，如果我想卡位的话，仍要考量）。

也就是说，在一个多工、过劳更为普遍的状态下，如何作文化研究，一样要面对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矛盾在日常面向的限制与问题。这不只是文化研究该怎么办，也是现代劳动者该“怎么办”的问题。

除了研究以外，博士毕业后我也身兼三种相关的工作。在这几个工作面向中，由于我并非主事者而更像是个协同的参与者或工作者，所以我仅能以一个厕身于此工作的人提供一下粗浅的观察。

我的第一个工作是翻译，而知识性的翻译虽然重要，但通常不太被重视，而相对应的翻译词汇转换与使用，更牵涉了语言的社会文化政治。尤其在作口译与随行翻译时，例如我曾协助左翼环境学者、北非促进和平对话的参与者等与台湾在地民间团体交流，除了要能精准传达双方文句的意思以外，有时候能否适时说明、理解讲者论点或提问者提问所论及的脉络，也成为语言转换之外附带的思想知识工作，才能促进双方的理解与交流。文化研究在台湾的发展，无论是思想的引介，或者于亚际文化研究的场合

进行多语言（日韩中粤）的翻译，翻译皆不只是语言的翻译，也不是刚好某位语言好的老师所担负工作，更多时候为了精准翻译，更像是知识思想讨论的协力者。那么文化研究如何定位翻译的角色、意义、以及翻译的劳动呢？

第二类工作是举办与左翼、社会主义讨论相关的论坛，主题包括现下的社会文化议题，例如集体经济与农业、环境空气污染、慰安妇、同志婚姻、当前政治与工会运动、青年贫穷与情感、金砖五国会议、英国脱欧与柯宾²、香港回归问题、法国黄背心、以巴冲突、艺术与政治、或者像是中国社会于革命与后革命的精神状态、马克思百年等偏向思想史的讨论。论坛的缘起与这些主题的设定，主要是有感于台湾主流社会的时事讨论缺乏左翼的视野，同时也认为台湾社会关注的议题往往局限在台湾内部或西方主流媒体所呈现的国际新闻，缺乏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的视角，也包括缺乏对于中国大陆复杂问题的认识。

论坛的举办有时与栖身在学院的学会或系所合作，但主要仍是仰赖民间朋友有限的资助，而场地则尽量使用像是地区的活动中心、学校教室或会议室、或者朋友的场地空间。这样的模式，一来议题设定与规划不需要特别考量学校的规范（或最低规范），二来有时候与学会或系所合作时，论坛也可以满足学会或系所有举办活动的需求，例如学会的经费有举行论坛的需求、系所邀请的特聘学者需要出席演讲的需求等。当然，论坛也同样要面对，议题设定如何可以回应资助者的期待？讨论的话题重要，但是如果与一般社会大众的知识与认知距离有些远的时候，该怎么拿捏尺度？论坛的作用除了作为左翼声音的纪录以外，也希望面对公众，那怎么突破观众有时只限于立场类近的朋友参与？

文化研究在台湾建制化的初期，其实议题论坛的讨论是相当活跃的，

2 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现任英国工党领袖——编者注。

当时也是台湾论坛讲座特别兴盛的时候，包括像是电影节的影展与讲座、新书座谈、诚品书店会定期举办课程与讨论等。这几年，其实讲座论坛已经更为平常，而且举办地点不再局限于台北市。然而，像是文化研究学会相关发起的论坛，是否因为论坛的普及，所以鲜少担起这样协调、促进讨论的角色，而更多是已经由民间的知识群体发起？还是因为高等教育专业化的评鉴要求增加，使得栖身在学院的文化研究需要花更多的心力在学术的讨论、论文研讨会、期刊刊物呢？如果文化研究的介入特色之一是面向公众与成人教育，那么对于文化研究以及依附在学院体制下的文化研究而言，特别是当高等教育体制空间紧缩时，类似从左翼与批判视角出发的议题讨论或知识思想性的论坛是什么意思呢？这些问题也是关于文化研究实践如何拿捏既有学院体制提供的空间与学院之外已有的资源，让教育与讨论回归、回应普罗大众的问题。

我的第三个工作是文字编辑工作。其中一类是协助一个网络评论平台的管理与评论文章刊登或转发。这个网络平台的前身原本是小型另类纸本报纸媒体的评论版面，然而原先主要支持报纸发行的经营者易人后，新的经营者因商业市场与政治考量而终止该报，而后续该评论版面的主编便将评论移至网络平台运作，这也是考虑到网络与社群媒体的高速发展。该评论网站的初衷，大抵也与前述论坛相近，希望能在台湾社会留下立场靠左、相对具有更多国际主义与第三世界视角的评论文字。除此之外，这样的网络评论空间也是基于现实操作层面的考量，犹如微信的公众号，台湾一些网络平台，像是“巷子口社会学”等等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报纸评论空间有限，难以容纳长篇、偏向知识性的评论文章，而且现代多数人也越来越习惯阅读网络文章，另一方面学术刊物在既有的学术规范下而难以包含这些具有评论性、思想性、希望面对公众的文章。所以，网络评论平台的编辑运作，大抵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

当然，从评论的议题、深度、长度、阅读点阅量也可以看出，比较偏

向冷门议题、相对深而长的讨论，同样地鲜少人阅读，而热门议题，尤其是由相对知名人物或知识分子撰写、约莫两千到三千字左右、有观点但没有深入发展的评论，往往得到更多人的点阅。与前述论坛主题与讲者设定一样，网络评论平台选择要刊登哪些文章，除了希望刊登台湾媒体少见的评论，同样也要考量读者与文章深度角度的差异，以及如何突破同温层（立场相近）以外的读者。

如前述，文化研究在台湾的浮现与文化评论、文化批评有关，之后又以学院为根据地，利用学院可能的空间来进行评论与批判的工作，而随着学院的紧缩与网络社群媒体的发展，网络平台进行评论也成为一种方式。目前，台湾也尚未见到比较软性的、非研究发表为导向、以文化研究为主要命名的网络评论平台，而目前社群媒体与像是博客的普遍，是不是有需要另以文化研究为名的平台，也是需要考量的。同样地，这些问题在于如何评估既有学院体制提供的空间与学院之外已有的资源，思考让文化研究的批判介入能够以什么形式解释、回归或回应普罗大众的问题。

第二类的编辑工作是带有学术性的期刊。带有学术性的意思是，这份刊物获得 TSSCI³ 的期刊认可，所以必须维持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但其性质也不全然为学术期刊，其立意是跨领域性质、强调对台湾社会问题的知识性批判介入，所以除了学术论文版面，也保有一些评论的空间。TSSCI 的认可，一方面像是一个保护，让相对跨领域、社会批判性较强的研究论文有个空间可以发表并满足研究评鉴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一些来稿文章作者，或许因为高等教育体制评鉴对于 CI 期刊发表的需求，纯粹只是因为刊物是 CI 期刊，且广义上与台湾问题相关的研究有关，所以有点乱枪打鸟式地投稿，并不是清楚这份期刊的基本取向。同时，因为期刊发表的绩效要求，可以看到作者常会来信询问发表时间的计算压力，意思是如

3 Taiwan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台湾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编者注。

何自我管理，能在有限时间内发出符合评鉴要求的学术文章。

同时，对于期刊编辑来说，为了符合 CI 的期刊评鉴要求，每期有一定的发表规范，例如一期需要三篇经过双盲外审的研究论文，这就会面对一个两难问题，一是论文的讨论质量，因为每期需要三篇的数量才会符合规范，所以有些论文的规范与论证虽然符合学术的要求而可以刊登，但是其问题讨论与分析的深度就没有时间再作进一步调整或提升，促进更深刻的讨论效应，无论是对于作者还是读者来说，这是有点可惜的事。另一个更常见的状况是，因为文章的质量不符合基本的水平，所以为了满足三篇的要求，每一期都有延迟出刊的状况。甚至，有些期刊刊物更面对了稿量不足的问题。这两个状态所突出的一个问题不只牵涉质量，还牵涉稿量，而稿量问题的关键在于高等教育对于专业化与国际化的要求，一来专业化的讨论相当局限在特定的书写与阅读群，二来国际化意味着是以英文发表在英文世界受到认可的期刊为优先，所以这种专业化与国际化的整体要求，对于志在讨论在地问题、以中文书写的期刊来说，文章的质量、方向、来稿量便是个具体而迫切的问题，接着就会影响刊物能持续下去。专业质量要求或绩效评量方式看似立意良好，但实际存在着悖论。那么，可不可以不玩这个绩效评鉴游戏呢？除了研究者于体制内生存，多少需要透过此方式来平衡体制的要求，另外期刊的运作同样需要经费与人事支援，尤其是这类期刊多半不受到商业市场青睐，那么政府教育经费的某种程度认可与支持，就是现实层面上要考虑的面向。

三个工作所提到的问题已是老生常谈，特别在经济紧缩与财富集中在特定人的时代，多工、不稳定的劳动与生存状态、资源有限等问题，都是发生在很细微的具体问题上。在前述的经验中，其实也看到所谓某种批判性的社会介入，即便是不在体制的核心位置，也并非自外于体制（或高等教育体制），很多时候是尝试平衡体制内与外的资源与需求。Ted Striphas 曾批评，文化研究往往过于强调“应如何”的大论述（meta-discourse），

反而忽略了文化研究于体制内实践所面对的具体限制与可能性是什么（2010: 453）。那么，怎么评估过去文化研究在高等体制内的实践所面对的限制与取得的变革可能？以什么作为衡量与评估的基础？卡到一个体制的位置，与在边缘或高等教育体制之外作文化研究，有什么差异与连结呢？这些问题都需要经过具体的评估与检视。如果，要谈文化研究与亚际文化研究的问题与可能，或许是要从具体细微的这些位置上来思考。

四、暂时的小结：重思文化研究作为知识思想的“集体”

面对学院作为提供研究与思考的物质条件空间的紧缩，以及更为强调绩效的专业化要求，柏林一群学者曾发表了《慢科学宣言》（“The Slow Science Manifesto”，2010）的声明，认为科学需要时间思考、阅读与犯错；而一群加拿大与美国的女性主义地理学者（The Great Lakes Feminist Geography collective）也提出：“致慢学术：在新自由主义大学里进行集体抵抗的女性主义政治”，希望在新自由主义的教育市场环境中，促进学术界彼此关爱、鼓励知性成长、面对表现指标造成的孤立效应的方式（Chambon 2019; Mountz et al. 2015）。这两个例子都直指了知识思想工作的基础与集体抵抗的需要。

因此，“文化研究”与“亚际文化研究”作为第三世界的知识思想集体，除了知识思想上需要面对冷战与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与知识生产的问题，当高教体制如许多行业一样深受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所困，“文化研究”如何思考根本性的体制问题呢？尤其“文化研究”的运作，仍相当使用期刊、学会、研讨会、讨论会等既有依附或寄生在高等教育体制下的方式，进行另类、依据第三世界历史与经验的批判性知识生产，那么“文化研究”与“亚际文化研究”，又如何可以以这样集体性的组织关系，面对体制的限制与压制，特别是各种规范知识生产的机制与生存条件，例如如何应付

学术绩效评鉴与延伸的问题意识设定，如何在开放下载下维持期刊的生存、如何面对掠夺性期刊性的存在，以及特别是如何解决组织与劳动者不稳定、过劳、个人化的劳动问题呢？

我认为迫切的议题在于，当新自由主义不断地攻城掠地，一面扩大自己的集结并吸纳所谓的批判力量，同时又矛盾重重时，“文化研究”如何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个人化的知识思想批判工作之外，发展组织以维持其批判思想工作的物质基础。这也就不只是如何“卡位”的个人问题，而是组织集体如何介入文化研究寄生的高等教育体制的问题。

关于如何思考文化研究作为知识思想集体的组织与介入，首先应该要承认文化研究就是一种集体组织，而非只是志趣相投的知识研究讨论会。这个转换在于承认集体性的重要与必要。台湾的文化研究年会作为学术性研讨会，几乎侧重在研究议题与理论，对于文化研究作为知识集体的想象与组织关系，相对缺乏一个比较系统性、持续性的讨论，过去与去年（2018年）、今年（2019年）虽有关于文化研究在台湾体制化二十年的讨论，但是还是比较是局部的、片段的，而非成为核心的问题。这可能也因为文化研究的集体关系本来就是相对松散的，同时也牵涉到各自的学术位置，所以好像难以进行比较全面整体的检视。学会的理监事运作，似乎主要是针对学会运作本身，不太能触及整体的问题。但是，思考文化研究的未来，如果这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只依赖个别一小群群体的学术位置透过研讨会来操作似乎已经不太足够，或许需要一个相对持续而稳定的平台，重新思考与检视文化研究作为知识思想集体的组织实践。可以怎么发起与维持这样的平台，而当中已有的学会与相关学院系所（或已经占有一些位置的老师们）又是什么样的角色或还能担负什么角色，这是第一个关于思考集体组织要做的工作与面对的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如何形成一个盘点的组织，可以讨论文化研究的组织，包括过去文化研究的聚合因缘、现阶段是什么、对未来的想象又是什么？

“亚际文化研究”其实是一个相对活跃的知识集体，曾操作青年教师与研究者的教学营、研究生的夏令营队与工作坊，这些活动皆有助于讨论上述问题。印象最深刻的是，2007年因着上海大学举办的“亚际文化研究”研讨会及“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2008年在这些人际基础上，由研究生操刀在台北外双溪办了一个文化研究的营队。这样的模式也可在后续“亚际文化研究”举办的活动上看见，例如青年研究生的论坛、工作坊与夏令营队、教学营等。这样的操作也联系了一群于知识上、情感上某个程度共享的青年研究社群。这个社群的关系虽然不是很紧密，通常是透过特定大会上互通消息，研究与关注相近者有时相互组队，知识与情感上却是相对亲密的，而且是开枝散叶式的在各地有着一小群、一小群的关系。这样的亲密感，更多时候是来自于知识（研究问题）、生存（青年教师问题）等等各方面的相互通气。这也是大部分学术体制运作少有的，因为通气关系通常在私人台面下，缺乏一个集体的组织来面对。

然而，这样的联系关系同样有面对几个问题。因为这样的联系关系相对比较松散，能连结的参与者，大概还是待在文化研究或学术体制的人，而通常联系的机会就是透过既有几个例行运作的大会。一些朋友因为后续工作选择而难以持续，一些年轻研究者可能是工作或收入的限制而无法固定参会。同时，这种联系关系又有年代上的不连续，例如2008年参加亚际文化研究夏令营队的人，似乎与后续的人（例如2014或2016年）除个别的接触外，因为没有透过共同参与的体验而缺少了联系。另外一种状况是，这样的联系一旦脱离了建立那样人际交往的场合界面（例如夏令营或教学营），后续碰面的场合几乎就是研讨会，如果彼此缺乏共通的研究或关注议题，这样通气的组织关系也就停在私人交往的层次，往往很难像有个类似的界面来进一步推进。

这所反应的状态是，一来这样的联系关系仰赖学术体制的空间（研讨会与参与研讨会的时间经费）进行，似乎如果少了这样的界面，这样的关

系就难再推进；二来是基于“亚际文化研究”的知识性集体组织关系是松散的，所以相对地其联系往往就只能透过会议的空间，并回归到研究议题上。其实，这些状态也是所有组织的常态，是否有共同的议题与方向、该怎么进行推进等，都决定了组织的状态，尤其当这些关系相对松散时，组织关系自然也就不会紧密。然而，如果思考文化研究的运作，以及思考支撑起这样关系连结的界面的意义时，所谓的连带似乎不能被动地只停留在研究议题或松的“亚际文化研究”关系，也需要主动思考现行这样自然松散的组织关系是什么意思，包括这样的关系维持只能是被动地透过例行大会或学术空间来运作吗？还是持续下去是为了什么目标？需要以其他非学术研究的方式搭配进行吗？主动的意思，同样也牵涉了能以什么平台与资源来运作，这也与前面两个问题——既有学术体制的检视与如何建立与运作整体检视平台——有关。

除了重新重视、思考文化研究本身作为一种组织集体的实践之外，还有怎么思考组织连结的问题。如果新自由主义的运作是于方方面面，在特定的态势下混杂了不同的形式操作，并且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带有不一致的矛盾，例如因为市场化与经济的问题，高等教育相当鼓励学科与产业结合，提供产业人力的后备军，也解决毕业即失业的问题。那么，面对主流的产官学结合，“亚际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可以如何进行拉帮结派的工作，以抵抗这样的结合与介入当中的矛盾呢？

目前，亚际文化研究与文化研究是透过学会、研讨会、刊物等形成某种松的知识集体来应付高等教育体制的专业化要求，但是如上一节提到的，文化研究其实也存在于其他民间非学院体制团体、体制边缘的运作方式，那么学院体制的知识集体与体制外或边上的思想活动之间，能够思考彼此的关系是什么，以及构筑什么样的防线与方式吗？或者，更广义的层面来看，这样的知识集体工作，如何与各种抵抗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行动形成更为有机的联系呢？

最为切身的两个例子是，近年台湾的人文社会学科出现了“大学社会责任实践”的作法：学校鼓励学生多关心社会而要求系所办理大学社会实践的项目。虽然立意良好并看似是对市场化的回应，但是关键的问题仍在于，社会实践往往并非立基于社会改造与对象的需求上，更多是一种在政治正确风潮下的多元妆点，以及作为办学绩效的评鉴标准之一（可参见邓湘漪（2019）的批评）。那么，“文化研究”如何利用社会实践的空间进行另类的组织串连，又如何能跳脱绩效评鉴的限制呢？

第二个例子是，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是目前台湾高等教育劳动者进行集体组织的重要、也最直接相关的组织，那么文化研究的批判介入工作，特别是其欲追索的第三世界与国际主义思想资源，如何与这样的社会行动组织进行有机的结合呢？尤其是，当文化研究者思索自身的劳动与高教体制问题时，如何与工会工作以面对自身体制的过劳与限制呢？所谓与工会工作，可能不只是加入工会、个别的支持，或个别个案式的争取权利，而是如何有个更为集体性的图像呢？亦即形成更有策略、在情感上更能互相支持通气的人际关系呢？

如果“文化研究”与“亚际文化研究”的立意在于从知识层面进行介入改变及社会行动，或许如 Ted Striphas 提醒，讨论的重点可能不只是研讨会的主题或现下流行的理论风向与议题，而是首先回归“文化研究”作为集体的组织实践，而我们将怎么检讨与展开组织的问题。尤其，当文化研究的运作相当依赖高等教育体制的资源时，那么文化研究与高等教育体制是什么样的关系、要采取什么策略与行动、又在高等教育体制之外形成了哪些组织与连结关系等具体的问题，皆是思考文化研究的资源、问题，以及未来必须面对、介入的课题。

参考书目

- 陈光兴、钱永祥。2004。〈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的学术生产〉，《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五十六期，页 179-206。
- 陈光兴。2000。〈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收录于《文化研究在台湾》，陈光兴主编，页 7-25。台北市：巨流。
- 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2017/06/12。〈兼任教师〉，「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
<https://www.theunion.org.tw/2017/06/兼任教师/>（2018/03/21 浏览）。
- 邓湘漪。2019。〈社会实践的企图和困境〉。《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13（8 月号）。即将刊登。
- Chambon, A. 2019。〈新自由主义的巨视世界与微观世界：我们可以做什么？〉。王增勇译。《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13（8 月号）。即将刊登。
- Mountz, A. et al. 2015. For slow scholarship: Feminist politics of resistance through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neoliberal university. *@ACME: An international e-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14(4), 1235-1259.
- Wang, Chih-ming. 2017. “Affective Rearticulations: Cultural Studies in and from Taiwan,” in *Cultural Studies* 31(6), 740-763. doi: 10.1080/09502386.2017.1375539.
- Striphas, T. 2010. “Introduction the Long March: 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Institutionalization,” in *Cultural Studies* 12(4), 453-475. doi: DOI: 10.1080/09502386.1998.10383115.



文化研究之“余”的联想

张馨文*

文化研究学会成立于 1998 年，去年，2018，恰好二十年，我受邀参加王智明老师主持的“文化研究二十年：新世代的展望”圆桌讨论。人在印度，无法亲临现场，听着录音，真是百感交集。所谓“新世代”，大半指的是在世纪之交进入大学与研究所，深受刚起步的文化研究“冲击”的一代。那冲击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撼动生命的，也影响往后的人生抉择。而我们这批受文化研究启蒙的“新世代”，本以为是跟上了世界的“新”，不多久后发现，自己赶上的，却是文化研究在台湾的迅速“过时”。世上本来没有“文化研究”，“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只是，我们也没料到，几年内，文化研究又似乎从新路变成了一条遭废弃的路，宛若是学术市场上并不受欢迎的过期商品。“文化研究”不再因为批判颠覆的态度而受到推崇。“跨领域”越来越像是学术上的不学无术，而“批判颠覆”则仿佛只是不切实际的幼稚病。

说到“展望”，大家说起话来竟像是老人，谈的大多是“回顾”，世代的“新”倒是表现在前途茫茫的困顿感里。关于“文化研究与我”与“现实与出路”的话匣子开了，意犹未尽，今年三月的文化研究年会上，出现了两场以新世代为主角的圆桌：“‘我们不是来拼桌’：亚际文化研究二代的学术组织与知识生产”与“文化研究与我”。我再度在另一个时空透过录音隔空参与。去年是个二十年，文化研究学会成立二十年，而今年，也是个二十，“文化研究第二十届年会暨国际研讨会”。年会主题订为“其

* 张馨文，印度安贝德卡大学（Ambedkar University, Delhi）博士生。

余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Rest）。研讨会以刘晓原老师“近代中国‘崛起’的四个向度”开幕，“闭幕”则是由新、旧两代学者组成的“文化研究二十周年论坛”。二十年由“新世代”聚个小圈子自己谈，是相互支持疗愈，而在闭幕这样的大场合，两代人齐聚一堂，谈“二十年”，台上、台下、场内、场外，心情皆复杂，偶有火药味。说起来，研讨会的头与尾也呼应着大会主题“其余的兴起”：如果“兴起”在中国，那“其余”的话题，就在这里了。

张小虹老师在闭幕讨论会发言时质问：“二十年”是怎么算的？谁说作为一场学术运动的文化研究，是从学会正式成立才开始的？确实，去年“二十年”了一次，今年又是个“二十年”，每个二十年都标注着不同的起点。这问题也是关于“人”：谁算数，谁说了算？另一面则是较伤感情的，谁说了不算？其实，本来没有“路”的文化研究，是怎么算都算不准的，都不免使一些人觉得自己掉了出去，仿佛自己做的是“多余”的事情。若把那些多余的事通通算进去，今年铁定是文化研究二十“余”年。加了“余”字，使我想在“文化研究与我”与“文化研究的展望”之外，进行一个文化研究的“余”的联想。

从研讨会的主题“其余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rest）联想起。The rest 相对于 the west，是西方世界的眼中的“余”，也是我们的文化研究进行批判地知识生产的自我想象的参考点。我们的现代性及其批判的轨迹，可说是一条从自我认同为“西方”，转变为自我认同为“东方”，并在与西方相对相抗中兴起的二十世纪的文化国族主义，而文化研究是对国族主义的批判，或可说，自我认同为“余”，the rest。这“余”，指的不是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被“现代”贬抑、边缘化与排除的所有人、事、物，乃至思想、记忆与感情。或许，“其余”不是 the rest 最好的翻译，“the rest” of the world，指的其实是“多余”，那些不合格的、不算数的人，以及他们所属与属于他们的种种不为帝国主义所用就等于浪费的劳动力、

土地、具象或抽象的资源。文化研究是场“多余”的运动：认同多余、为多余发声、说多余的话、做多余的事。

这使我回想起，2006年陈水扁贪腐弊案曝光，民愤难抑，施明德发起百万人倒扁红衫军运动，期间，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的老师们在报章杂志上撰文，在现场搭帐篷发送“自主公民”册子，企图引导反对陈水扁的群众，从愤怒转向理性，从蓝绿对立转进“自主”，一片红海中的，离总统府广场主席台好几百公尺远的中正纪念堂大广场里的小帐篷，看起来真的尴尬又多余。这顶小帐篷与那本小册子一直是我文化研究的多余的形象，与太阳花运动期间，由一小群人组成的“贱民解放区”遥相呼应着。2014年，执政的国民党欲在国会强行通过增强两岸经济交流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引发3月18日至4月10日国会占领行动，后来被称之为“太阳花运动”，在立法院外有运动者与学者共同成立“贱民解放区”，象征着大运动里头的不同意见，聚集着运动中被排除的少数，不被听见的声音。然而，与那顶帐篷相似，解放区没有带来太多解放，行动倒是自我“贱民”化了，在大台之外批判大台的小台，获得的关注不多。今日回想这些具有文化研究批判气味的社会行动，免不了都有一点所做多余的荒谬感。仿佛，最终，自己竟也成了多余的人。

“多余的人”使人联想起在台港两地提倡文化研究的丘延亮，阿肥老师。走过白色恐怖、入过牢，在八零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参与见证了第三世界新左翼思想的滋长，阿肥老师让自我与时代的历史以“文化研究”这个名字在思想与运动实践中滋长。他时常提到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罗亭是旧俄小说有名的“多余人”，这角色呼应了阿肥这世代“文化研究人”知识与实践的另一面，也就是三零年代旧俄文学中知识分子那摆不平的多层次的矛盾：眼高手低的贵族气、对美丽与理想的赞颂与内心怀疑主义的冷热失调、行动上不是太多就是太少、不是太快就是太慢的失速失准、以及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变“多余”的暴躁。罗亭又使人想起瞿秋白，他在狱

中死前写的那篇《多余的话》，“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政治生涯如同一场滑稽剧，读了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我常惦记着《多余的话》“最后……”之后那两句结尾：“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半辈子干革命，死前列着书单、念着豆腐，恐怕真是多余的愿望了。这种不知是自己创造了世界还是由世界所操弄，究竟是主人还是戏子的阴郁荒谬的“多余感”，不也内在于我们的文化研究的运动之中？

余，还使我联想到了“业余”。文化研究的“跨”领域，时常是“业余”的一跨？在被跨入的领域的人的眼中，我们永远是不伦不类的阿嘛吐（amateur）。“业余”是研究者的梦魇，也驱动着迈向专业的上进心，学术圈里，任谁都不想被当作是业余的人。但当“专业”落入一尘不变、僵化与制式化，或与资本或霸权相互勾结，在领域之间来回的穿梭的跨领域活动，时常为本科带来自我批判的角度、不落窠臼的观点与刺激活化的效果。然而，“跨”领域指的是立足一领域，将外界的知识向内输入，当“文化研究”自成一领域，究竟是从哪里引进什么到何方，刺激哪里，活化什么，就成了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说到“业余”，我心中惦记着的，更是那些毕业后离开学术界另谋生路，心中却对文化研究有所依恋的人。事实上，学术圈就那几个位置，多数人是掉在圈子外的。今年研讨会两场圆桌讨论，多位进入其他行业的文化研究人也参与发表，发表中难免自问“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里发表吗？”。其实这些“多余”的发表者，是属于“业余”的文化研究者。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课题并不是要申请计划、发表论文、冲点数、升等，而是工作之余，究竟是否还有余力继续“文化研究”下去，而究竟继续文化研究，是什么意思？

于是，我想到了“余力”。行有余力。“新”世代面对的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有别于过往的，特别擅长将人的余心余力榨干的系统。与过去单调重复的劳动环境不同，劳动弹性化使人看似在工作上享受更多的自由，实际上是使每一份工作更像是一份兼职，一份额外，一份需要用尽余力的工作。而机构管理化又使得学术工作不再是份使人有余力进行思考与创新的工作。大学也并不置外于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转轮，新进学者在拼升等、做行政之外，也时常觉得自己已没有好好做研究的“余力”，更遑论做“文化研究”。因此，新世代的现实是，并不是只有在学术圈外讨生活的人需要余力来维系自己和文化研究的连系，在学术圈内的人，也同样觉得自己需要“余力”来做跟文化研究有关的事情。换言之，无论身在何方，无论从事哪一行，每一个文化研究人，都是必须要动用“余力”来从事文化研究的“业余”的文化研究人。或许，我们得承认，我们即将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商品化使得真正的求知学习与知识创造，都得在工作之余来进行的年代。在这样的世界里，大家都是知识的新贫阶级，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在文化研究的运动里，人人皆平等。

平等与余力，使我想到了法国精神分析师雅各布·拉冈¹（Jacques Lacan）所独创的学习小组“卡特尔学习工作小组”（cartel）。

出生于1901年的雅各布·拉冈，原是位精神科医师，研读博士学位时受精神分析理论启发，在研究偏执狂女性的论文中提出严重精神病（psychosis）的心因机制，受法国左翼与前卫派关注而逐渐闻名。从1950年到1970年代，长达二十余年的拉冈“跨领域”的精神分析讲座，涵盖范围从哲学、生物学、语言学到逻辑学、数学，深受法国知识分子喜爱与欢迎，也影响法国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发展。他在临床上大胆的作风使他于1963年被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除名，自创学派，成立“巴黎佛洛伊

1 即雅克·拉康——编者注。

德学会”（École Freudienne de Paris），在他 1964 年所草拟的组织章程中，拉冈将“卡特尔学习工作小组”（cartel）列为学会的三大基石之一。受到英国分析师比昂（W.R. Bion, 1897-1979）集体治疗法的“无领导的组织”（group without the leader）概念所启发，拉冈思索着，什么样的学会可以让人们在平等的关系中学习，什么样的组织可以没有大师、没有阶级？于是，他发明了“卡特尔学习工作小组”。

任何一位对精神分析的知识感兴趣的人，无论从事哪一行，都可以组成卡特尔工作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加入学会。小组规模有限，至少三人至多五人，每个成员都得有自己的兴趣主题。为避免工作小组变质为组织内封闭的小团体，卡特尔小组限期最多两年，两年期满即解散。最特别的是，小组成员必得挑选到一位通常是（但不一定要是）学会里通过训练的精神分析师担任 plus one，有了 plus one，卡特尔小组才告成立。plus one 翻成中文即“多余的一人”。Plus one 既不是小组成员，也不是小组领导，而是又内又外的多余。“多余的一人”的出现代表小组已有了边界。若没有边界，怎么会有人多余出来？而边界一旦确定下来，则不能更改，如有人中途退出，小组即等同解散。Plus one 不是导师、也不是小组的精神分析师，他的角色是关于欲望的，负责挑衅，挑动组员提出看法，发现自己真正在意的主题，并继续阅读与思考。而小组结束时，每一个人都将自己的知识产出，形式不拘、篇幅不限。

“多余的一人”既多余又关键。因为此人的存在，团体的“边界”成立，又因“多余”的挑衅，扰乱了既定的想法与秩序。时常，被迫多说的那一句是更为真切的一句，多余的一人就是挑衅到大家说出那多余的一句。当人人都可组成卡特尔小组，人人都是“业余”的精神分析研究者。事实上，包括从业的临床精神分析师在内，都是只能用临床工作以外零碎的时间读书思考的“业余”学习研究者。“多余的一人”只是一个角色功能，他们知道的并没有比较多。

去年底，学会里卡特尔小组负责人 Frank Rollier 医师造访印度，在加尔各答介绍卡特尔的组织概念，印度也开始有了卡特尔学习小组。今年初，我在印度加入两个了卡特尔小组，一个在加尔各答，小组的 plus one 是 Frank Rollier，另一个则是在德里，由在伦敦职业的精神分析师 Janet Haney 担任 plus one。一起读书是一种很独特很亲密的集体劳动，每月一聚，每次一到两小时。时间有限，主要也是大家的时间心力都很有限。这么短的时间，很难真正非常深入地讨论一个问题，也无法达成什么样的集体结论。德里的小组决定读拉冈的《第五讲学》，一本五百多页的大书。记得第一次聚会的时候，我写了好几页的东西打算报告，报告了不到五分之一就被打断，直说我们会再回来，就把时间让给其他的成员，话被打断使我有些惊魂未定，这使得卡特尔小组的聚会像是蒙太奇，不只是只能听见组员片断的分享，连自己想说的都说不完。然而讲不到话反而更想讲，讨论不了而更想讨论，卡特尔确有其独特的魅力，几个月参与下来，我知道如有想说的，一定要力求精简，用最短的时间把话说出来、说清楚。也明白到求知无论是否有集体，都是一个很独自的旅程，但有个小小的集体，定时聚会督促自己在课业之余别荒废了这个“业余”的“兴趣”。一年加起来约十二小时的聚会，怎么讨论一本大书？又，究竟为什么要读这一本书？一开始大家都没有头绪。为了注册，除了决定集体要读的文本之外，每个人都得问一个问题，问题多少有些片段与天马行空。过了几个月，每次聚会都有点尴尬无头绪。有些人话多，有些人话少，plus one 必须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说话，大家被逼着等话少或反应慢的人发言，一起经历无言与尴尬，久了，倒也习惯了，而或许就是因为短暂与片段，我倒是记得每一次大家说了些什么，那些话都在心底，如在哪里看到相关的主题，也会在闲余跟彼此分享。每个人都开始用自己的非常缓慢的速度用零碎的时间爬这大书，每个月找出一个小小的东西来分享，而因为必须精简，每周的分享更像是讲一则笑话，把浓缩再浓缩的想法丢出去，测试对方接不接得住，是否感受得到里头的趣味。plus one 也必须让大家不进入竞争的关系，其

实求知的趣味是自己的，问题也是自己的，一旦进入想象的竞争，很容易就模糊了焦点。大家都学着放轻松，慢慢来。逐渐地 plus one 也开始在每个人讲的“笑话”里定锚，标定出一些关键词，鼓励大家开始动笔写写东西。加尔各答小组的运作很不同，文章很短，每次分章节由一人负责报告，plus one 会在报告过程中，打断报告人，问小组中每一个人的想法，也提出自己的看法，精神分析的知识并非天马行空，plus one 像是思考的督导，督促每个人把话说清楚，一步步来。英法双语为主的新拉冈主义学会 (New Lacanian School, NLS) 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上百个卡特尔小组登记注册，除了读书的小组之外，也有讨论临床案例的小组，另外也有因应重大社会或政治事件，如法国的恐怖攻击而成立的小组。注册单上，每个卡特尔小组列出小组的任务，而每个个人都留下姓名、单位、地点、联络方式与用一句话表达的个人想探讨的问题。在卡特尔小组的世界里，人人平等，都是“业余”的精神分析研究者，没有权威，有的只是“多余的一人”。而这多余的一人所扮演的划（跨）界与挑衅的角色，不正是我们文化研究者时常扮演的吗？而今日的新成员可以是明日的“多余的一人”。

台湾文化研究二十余年，人们讨论着困顿的当下与茫茫的未来。或许“专业化”终究是个迷思，文化研究者一直是多余的人与众多业余者所形成的集团。盼望下个十余年里，文化研究达到真正的“多余的兴起”。



广场上的他者性时刻： 韩国烛光革命之后的绝望与希望¹

白池云 *

张淳 ** 译

1. 那些没有被烛光照亮的人

在过去的十年里，韩国网络媒体上针对悲剧受害者或历史上受压迫的少数群体（包括女性、5.18 光州事件受害者以及“世越号”沉船遇难者家属）的仇恨言论日益增多，令人深感不安。而近乎奇迹的烛光革命——韩国基层民主的一个分水岭时刻——使这种趋势更加令人困惑。随着这个问题在社会底层持续升温，如今的韩国不得不面对民主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非预期的影响。

从 2016 年 10 月到 2017 年 5 月，和平烛光集会持续了 7 个月，共计有 1500 万人走上街头，最终促使最高法院通过总统朴槿惠弹劾案。韩国伟大的市民革命的系谱通过唤起历史上的重要抗议事件而开始重新建立起来：1987 年的“六月抗争”，1980 年 5·18 光州民主化运动，1960 年的“4·19 革命”，以及更早的 1919 年 3 月 1 日的独立运动。的确，所有这些事件都代表了韩国民主化历史的崇高遗产。此外，照耀 20 世纪 80 年代民主化运动的电影——如《辩护人》(Attorney)、《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1987》——所获得的广泛影响，都强化并证实了韩国民主化遗产的深远意义。

* 白池云 (Jiwoon Baik)，首尔大学统一和平研究所教授，近来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后 / 冷战时期亚洲的知识地理学跨界阅读。

** 张淳，上海大学文学院文化研究系讲师。

1 本文首发于 *Cultural Studies*, VOL. 34, NO. 2, 原文见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pdf/10.1080/09502386.2019.1709091>。感谢白池云教授授权《热风学术（网刊）》刊发此文。

然而，就在烛光革命取得惊人的胜利后不久，问题开始浮出水面。

“20-30 岁男性群体”问题是第一个信号。尽管文在寅政府在南北峰会以及美朝峰会上广受赞誉，但年轻一代对文在寅政府的支持率持续下降。在 2019 年 2 月，一份不同寻常的政策报告《20-30 岁男性群体支持率下降的分析与对策》发布。该报告将文在寅在这一群体中的低支持率归因于他们的反女权主义和社会保守主义观点。然而，支持率的下降实际上并不新鲜。20-30 岁男性群体从一开始对文在寅政府的忠诚度就很低，不仅与同龄段女性相比如此，与其他年龄段的男性相比也是如此。他们的支持率曾经在 2018 年的南北峰会和美朝峰会期间短暂上升——文在寅的支持率曾一路飙升至 81%，但不久就回落到之前的水平。

这些现象不可忽视。首先，这与被称为“386 世代”的老一辈人的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86 世代”在年轻时积极参与反对独裁政权的政治活动，并在 1987 年结束了数十年的独裁统治（Lankov, 2008）。基于这样的经验，他们很当然地认为年轻人应该是支持社会正义的排头兵。因此，对他们来说，今天年轻一代的保守倾向是难以理解的（陈 2019, 3）。

更加令人困惑的是这个群体对弱者的憎恨，这一令人不安的情绪将厌女症作为核心目标。新闻周刊《时事 IN》发现，在韩国 20-29 岁的男性当中有超过 25% 的人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反女权主义者，并将这种共同的信念作为统一原则。这种新的身份群体形成的原因是他们认为社会歧视男性。在对 1000 名成年人的调查中，《时事 IN》发现 60.8% 的 20 多岁男性认为韩国对女性的歧视不是特别严重，而 68.7% 的人认为对男性的歧视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时事 IN》，2019 年 4 月 15 日）。这种观点连与其他年龄段的男性相比也截然不同，他们全然抗拒对男权大男子主义有所削弱的进步努力（千关律 2018，288）。那么，在玻璃天花板指数（glass-ceiling index）排名最后的韩国（《经济学人》，2019 年 3 月 8 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不可思议的歧视观念呢？

很多分析人士认为，青年男性的这种厌女症可以追溯到约会受挫的经历。网上流行的“味噌女孩”、“泡菜女孩”等嘲讽用语是为了嘲笑那些想要通过钓有钱人来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年轻女性。然而，这些带有贬义的词汇也可能反映出年轻男性在约会或婚姻市场中缺乏主动性的挫败感。1997年的外汇危机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的结构调整严重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加剧了韩国社会的不平等和僵化，这使得韩国普通人通过收入实现阶层上升几乎是不可能的了（《Korea Exposé》，2019年12月29日）。加上此后不久，韩国进入低增长阶段，导致年轻人获得体面就业机会减少。因此，努力工作必然会成功的说法在现代工业化时代已经成为一个神话。韩国的年轻人被迫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放弃约会、结婚和生子——这是他们走向成年的必经之路，而在此之前，这一切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取而代之的是“三抛”²、“五抛”甚至“七抛”等自嘲表达。“三抛”代表放弃约会、婚姻、生育；“五抛”增加了房子和友谊；“七抛”在遥不可及的目标中增加了希望和梦想。这种彻底绝望的态度在韩国青年中已成为一种流行病，其中许多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一座监狱，他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那里撤离，并把自己当作难民。新的流行语如“Hell Choson”（地狱朝鲜）和“Tal Choson”³（逃离朝鲜）表明年轻人已经决然放弃了对国家的希望。可以说，正在韩国扩散的仇恨是一个社会被迫放弃希望的症状（严奇镐 2017，14-15；149）。

这样看来，“日佳【ILBE】⁴现象”就变得更加容易理解了。日佳是

2 ‘ㅅ[抛]’是韩语‘ㅅ기[抛弃]’的缩写，意思是放弃。

3 ‘Tal’等于韩语‘탈[脱]’的英文音译，在汉语中的意思是“逃离”。在此所用的“朝鲜”不代表北朝鲜而代表朝鲜王朝（1392-1897）。其原因可能是要嘲弄当今的韩国社会如同封建王朝具有强硬的身份制性质。

4 ‘일베[ILBE]’是“日刊BEST”的缩写，意思是“日间最佳论坛”。它最初是一个分享笑话的网站，后来演变成一个极右翼民族主义者的集合地。

一个极端右翼民族主义网群，它以妇女和湖南人⁵为攻击目标，对他们进行嘲弄。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日佳的心态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公平的痴迷。根据千关律的研究，日佳憎恨 5·18 和“世越号”渡轮遇难者家属的原因是认为他们利用受害者的身份获取政府福利，而不是参与公平竞争（千关律 2018，256-257）。日佳成员在光化门广场当着沉浸在哀痛中的“世越号”遇难者家属狼吞虎咽披萨的荒唐行为就是以嘲弄的方式发泄憎恨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有趣的是，“父亲－首尔”叙事轴在日佳的逻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父亲－首尔”叙事里讲述的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父亲，他来自农村省份，后来搬到首尔，通过努力工作获得了成功。从这一点来看，日佳的仇恨叙事源于一种背叛感，是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勤奋和努力获得财富这样的传统观念已不再可能实现所导致的剥夺感。这种愤怒植根于对公平和正义的强烈信念。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日佳心理上的一个悖论。在上一代人中普遍存在的对白手起家的信仰，并不是日佳现象的原因。相反，日佳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信仰不再有效的现实所造成的症状。日佳将特权阶层和贫困阶层颠倒过来的扭曲的世界观，只能被视为是从没有希望的现实中病态地衍生出来的——否则就不可理解。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威权统治后，韩国在集体民主化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功，但现在却成了滋生仇恨和反进步主义的沃土。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个悖论？此时，我们也许可以思考一下意大利哲学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民主——它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造福生命，使之免于毁灭——在看上去好像终于要战胜对手、达到最高程度的时刻，却无法拯救生命（zoē）？”（Agamben

5 湖南是包括光州、全罗南道及全罗北道的地域名称。光州是湖南的据点城市，1980 年 5/18 民主化运动就是在那里发生的。因此，湖南在韩国政治环境中代表进步。

■ 特稿

1997，10）韩国经历了几十年的民主化运动、到2016-2017年成就烛光革命作为顶峰，可是如今韩国年轻人却公开叫骂“地狱朝鲜”，变成以欺凌弱小为乐的势利主义者，⁶这一切怎么可能？

2. “地狱朝鲜”，没有之外

386世代总是对年轻一代的不抗议而感到困惑；他们作为反抗社会不公的典型，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嘲笑弱者而不是对抗国家权威的年轻人。然而，这样的批评并没有认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让年轻人感到沮丧的，既不是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军事独裁，也不是劳动剥削，而是一种由386世代献身于其中的民主所支撑的结构。20世纪80年代，政治环境恶劣，学生运动的氛围倾向于将社会正义和对组织的忠诚置于个人的欲望和情感之上，这些原则奠定了“386体制”与传统家长主义相结合的坚固堡垒的基础。因此，当2018年Me Too运动来到韩国时，来自进步阵营（而非保守派阵营）的人物多次被指控性侵，这并不令人意外。⁷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学生运动经常以服务更为伟大的事业为借口而淡化甚至牺牲性别问题。再说，尽管他们将自己的青春献给革命事业，他们现在却代表着既得利益集团。在金大中和卢武铉担任总统期间，他们抓住进入政界的机会，不仅获得了政治权力和社会影响力，而且还有幸赶上了最后一趟工业化列车。因此，386世代成为在韩国现代史上第一代同时享受民主化和工业化成果的团队。

具有道德力量的权势集团在现代韩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近些年有

6 . 韩国社会学者金弘重（音）认为，自199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危机以来，“势利主义（snobbism）”作为一种新的认同在韩国社会盛行。在他看来，势利主义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矛盾：虽然人们被鼓励去追求世俗的欲望，但他们对世俗欲望的追求是为了生存而被迫的，而不是基于他们的意愿（金弘重2018, 82）。

7 安熙正事件是其中最令人震惊的例子，因为安熙正作为当时忠清南道知事一直被视为文在寅总统的接班人。他因性侵女秘书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月。

三部描写 20 世纪 80 年代的电影——《辩护人》（2013 年）、《出租车司机》（2017 年）和《1987》（2017 年）；这些电影的成功表明，386 世代的影响力超越了政治；他们也可以控制社会话语。这些电影不仅证实了 386 世代的行为是正义的，也让他们对 20 世纪 80 年代的情感和记忆成为整个国家的情感和记忆（柳在衡 2018，275-318）。此外，这些电影对许多亚洲国家的政治抗议者的影响，再次证明了 386 世代的合法性。⁸ 今天，386 世代不再代表一种反抗力量，他们代表了主流。在大韩民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强有力的权势集团，一方面掌握着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掌握着话语权力。

那么，或许当前韩国青年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困境是，他们遇上了韩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权势集团，并在它的阴影下长大。他们要拒绝被“漫长的 386 体制（崔成龙 2019，101）”召唤为主体，但同时又无法创造出令人信服的话语去表达自己的不满。在这方面，批评青年们缺乏政治参与和抵抗热情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要抗议的恰恰是 80 年代召唤出的集体主体。如此，青年们的不满并没有凝聚为一种可行的政治语言，只是变成了诸如“386 糟老头”（“386 꼰대”）⁹、“举起竹矛”¹⁰（朴权一 2016，84）等散碎的讽刺。在很大程度上，这就是为什么烛光革命没有为年轻人提供任何土壤，使他们无法像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或香港的“占中”那样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团体的原因。文化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崔泰燮表示，年轻人在烛光革命中自发的激情最终被“漫长的 386 体制”的粗矛所吸收。¹¹

8 韩国运动歌曲《光州之歌》(님을 위한 행진곡)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示威现场流行，在韩国媒体中屡次出现。（《韩民族日报》2019 年 6 月 15 日）。

9 ‘꼰대 [Ggondae]’ 是一个俚语，用来描述傲慢自大、自以为是的人。这个词通常用来嘲笑那些认为自己比年轻一代更有阅历、喜欢以一种傲慢的态度对年轻人指手画脚的老一代人。

10 在韩国，“举竹矛”表示政治上的反抗。它可能起源于 1894 年的东哈克农民革命。然而，最近这个表达经常被用来嘲笑掠夺者阵营，尤其是 386 世代。

11 崔泰燮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即韩国强大的民主化遗产在某种意义上阻碍了年轻人培养自身的主体性（2019）。另外，这一代的许多人也注意到，韩国青年们过于拘泥于政治中立的原则，这剥夺了他们直接塑造

结果，如今的韩国青年恐怕是在现代历史上社会影响力最弱的年轻一代。¹²（李忠汉 2019，46）

2 - 1 一个世界主义孤独者的生存故事

当现实的无望过于强大时，逃避可能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张康明的小说《因为我讨厌韩国》（《한국이 싫어서》，2015 年畅销书）标题颇具煽动性，讲述了一名女性成功出走“地狱朝鲜”（Hell Choson）的悲伤故事。尽管小说的语气轻快、洋洋自得且略带讽刺，但字里行间却弥漫着一股阴郁的潜流。主人公桂娜在小说一开始就清楚地表明了她要逃离的意图。若当被人问及原因时，她的回答会非常直白：“因为我讨厌韩国。”如果人们问得更加详细时，她会更直截了当：“因为我无法再住在这里了。”任何人只要问她“你为什么不爱你的国家？”，就会被贴上“Ggondae”（糟老头）的标签。桂娜出身贫寒，无法上名牌大学，但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在一家知名的金融公司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然而，她仍然决心逃离韩国，因为她坚定地认为在自己的祖国永远不会快乐。无论是她的同事（他们都非常成功），还是她那富家子弟的善良男友智明，都无法让她相信在韩国会有什么前途。她所追求的未来并不是继承不配拥有的财富，她真正想要的是尊重和理解，让她真正觉得自己有价值。但在她看来，如此简单的梦想，在韩国永远不会实现。最后，她（千方百计地）离开了祖国，远赴澳大利亚，追求未知的未来。

不过，桂娜成功逃离的故事仍然是虚构的。正如苏荣炫所说（2016，301-308），桂娜为实现她的目标所做的努力——包括通过雅思考试

时代精神的机会（金昌仁 等，2019，170）。

12 在韩国，进入政坛的年轻人比例明显下降。2016 年国会议员选举之后，40 多岁的议员占据了国会 19% 的席位；30 多岁的人的比例不到 1%。与 2004 年的选举相比，这一比例下降显著，当时 40 多岁的占据是 35%，30 多岁的是 8%（全孝宽 2019，122）。

和获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仅仅表明了她的对新自由主义的依从默许，这种自由主义不断地通过逼迫自我提升，直到精疲力竭的程度，来考验一个人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最终改变的只是地点，从韩国转移到了澳大利亚；桂娜所做的只是改变了她的国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在绝望中选择成为难民，并选择了一个新的国家，这只是暴露了一个无法逃避的全球主义的现实，在这里，“超越国家”的想象不再可能。

这部小说更令人担忧的是它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和恐惧。桂娜的“脱朝鲜”——逃离韩国——之所以让人感觉不像是一个幸福的结局，是因为这意味着她要断绝所有的关系，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她先是和她专一的男朋友智明分手。智明后来通过了一个报业公司的考试，实现了成为一名记者的梦想，但他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只会让桂娜感到空虚。她还拒绝了父亲的小梦想，即拥有80平米的新改造的公寓，拒绝在经济上帮助他，因为无论是爱人还是家人都无法保证她的幸福。

同时，对现有关系的不信任会导致对未来新关系的恐惧。在澳大利亚定居后，桂娜遇到了美国德州人爱丽（Ally）。可能是被爱丽的自由精神吸引了，桂娜邀请爱丽到她的顶层公寓，而爱丽（一个极限运动爱好者）突然从阳台上跳伞，让桂娜大吃一惊。由于澳大利亚法律禁止定点跳伞，身为屋主的桂娜被警方起诉，在经过漫长的诉讼后，她支付了一大笔罚款。可以说，这一可怕的经历强化了桂娜的信念，即她应该避免向他人传递善意或热情。这件事情还影响到她和载仁的关系，载仁也是逃离韩国的侨民，喜欢上了桂娜。表面上，桂娜似乎完全没有察觉他的好感，但在内心里，她的忽视完全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形式。当载仁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她自己的感受时，喝醉的智明打电话给桂娜，破坏了这个美好的气氛，推迟了桂娜开展一段新关系的可能性。

《因为我讨厌韩国》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孤独者的生存手册，敦促他们不仅要结束现有的关系，还要阻止未来可能的关系，从而保护自己。苏荣炫（307）批评桂娜没有兴趣改变“此时此地”，将之转变成一个新的共同体，但这种批评似乎缺乏切中要点，因为对共同体根源性的拒绝才是这部小说的核心。实际上，当桂娜坚定地表现出对社会和共同体的放弃时，表面上是坚强而冷静，但实际上她是一个受伤的灵魂（Epstein 2018, 4）。可以说，她是一个失去了社会保护的韩国青年的写照。这样看来，说桂娜——一个看上去很得意的世界主义者——唤起了那些选择远离社会，隐居在自己孤独的房间里的蛰居族，似乎并不牵强。¹³从“世越号”事件中得到的惨痛教训是，国家无视那些处于危险中的人，那么我们凭什么能够说服年轻人重新加入社会，再三寻求社会的解决方案呢？

2 - 2 普通人对“非武装地带的彼方”的想象

尹高恩的短篇小说《如果蓝色大理石里有平壤》（“부루마블에 평양이 있다면”，以下简称《蓝色大理石》）与文在寅总统最近向《法兰克福汇报》提交的一篇题为《普通人的伟大》的文章惊人地重合。

我一直很遗憾，我的韩国同胞们不再关心停火线的彼方。如

13 2019年5月28日，一名50多岁的日本隐居男子持刀袭击了一群等待校车的学生。随后，在6月1日，一位前农业部副部长杀死了他44岁的儿子（他已经在家里隐居很多年），说他认为他的儿子也会伤害人们。日本政府对这两起在接连几天中发生的犯罪事件感到震惊，于是对这个与世隔绝的群体进行了一项名为“蛰居族”（hikikomori）的调查。调查显示，大约有61.3万名年龄在40岁到60岁之间的人是社交隐士。由于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这些中老年遁世者在20多岁时一直处于长期失业状态，最终选择了退出社会。令人震惊的是，这是日本政府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调查。与此同时，在韩国，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危机影响而隐居的人正步入中年。然而，我们还没有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一问题而进行适当的调查，更不用说制订对付这一问题的对策。参见KBS NEWS (2019年6月5日); 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hikikomori/articles/crisis_09.html。

果朝韩双方能够和解，铺设铁路将两国连接起来，允许货物运输和人员往来，那么韩国将不再是一个岛国。相反，半岛将成为连接亚洲大陆和海洋的桥头堡和门户。扩大民众的想象力也意味着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那么，人们的想象力、生活领域和思维的范围也将大大扩展，治愈我们长期忍受的因分裂而带来的痛苦和创伤。（*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May 7, 2019）。

《蓝色大理石》在 2016 年首次发表，因此它并不是对文在寅的文章的直接回应，然而它却给我们这种感觉。尹的故事中所描绘的普通人对“停火线的彼方”的想象，显示出当关于朝韩分断与统一的主流话语渗透到年轻人无望的生活里时，可能造成的潜在隔阂。仿佛是在驳斥引文中提到的“我一直很遗憾”，《蓝色大理石》展开的前提是普通人对“停火线的彼方”其实一直有所想象。故事开始于主人公郭度溢赢得一张去夏威夷的免费旅行券。度溢住在一家爱彼迎（Air B&B）民宿，这家民宿的主人对朝鲜的房地产市场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从未有过将朝鲜与房地产所有权联系起来的想法，度溢开始在谷歌上搜索，并了解到几十年来全球一直有大量房地产投资资金流向朝鲜。

像我这样对这些事情漠不关心的人总是把非武装地带看作是我们领土的边缘。事实上，它不是边缘，而是中心。虽然停火线像一条腰带一样束缚着韩半岛，但一旦放松腰带，这里将成为最热的房地产市场。”（《蓝色大理石》56，以下相关引文只表示页码）

这部小说的叙事带有科幻元素，将跨越 70 年历史的分界线描述为“就像玩女子橡皮筋游戏一样容易”（57）。与文在寅引文中所表达的忧虑相反，普通人的想象力却已经实现了“从意识形态中获得解放”，他们的“生活领域和思考范围”已经“大大扩展”。对他们来说，非

武装地带不再代表韩国“岛屿”的北部边缘；如今，它已成为与亚洲大陆相连的韩半岛的中心，也是“最热门的房地产市场”。仔细看来，这一观点可能会令人们感到困惑，不知道哪一部分是真实的，哪一部分是虚构的。朝鲜是一个相对没有受到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污染的清静地区，实际上，它正在与美国就用核武器换取发展机会进行谈判。有鉴于此，资本涌入朝鲜的前景已经在当前得到了证明。

度溢怎么会不知道这一点呢？他声称自己的无知源于对房地产完全缺乏兴趣。然而，我们可以考虑另一种解释。度溢和女朋友已经交往了9年而一直没有关注房地产市场，这恐怕是因为对像度溢一样被迫放弃婚姻、生孩子甚至希望的“N抛一代”来说，购买房子与科幻小说同样不具现实可能。¹⁴当度溢和他的女朋友善英正处于分手的边缘时，有关平壤地区的新城的新闻奇迹般地重新点燃了他们的关系；在一个空间十足的公寓楼里拥有一套80平米的公寓房的愿望是足够强大的，足以解除危机。然而，在这个有点不切实际的结局当中仍然存在一个黑暗的逆流，在那里，他们在样板房(model home)里享受着(假的)首尔塔窗景，幻想着从汉江吹来的微风拂过脸庞。这一场景的设计似乎只是证实了一个残酷的现实：他们无法在韩国拥有一个真正的未来。

当代韩国青年作家超然的笔调似乎是一个共同的特征，这反映了他们对周围沉闷现实的脱离。《因为我讨厌韩国》和《蓝色大理石》的冷漠态度似乎表明它们都拒绝分析或深入探究其各种五花八门的荒谬之处，是对社会的坚定拒绝。他们不再想深究韩国的绝望，而是放眼外部世界。然而，外面的世界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它真的比我们身后的世界更好吗？桂娜隐藏着自己国家留下的伤口，进入一个陌

14 参见韩永仁对《蓝色大理石》的解说(尹高恩, 202)。

生的世界，很可能在她的新家遇到一个更为残酷的竞争环境。她能否找到幸福是值得怀疑的。同样，朝鲜——一旦打开大门，最终难免也会屈从于投机的浪潮——似乎也不是“地狱朝鲜”之外的一个可行选择。在这方面，《因为我讨厌韩国》和《蓝色大理石》所凝视的“地狱朝鲜”之外的世界是非常矛盾的。

《蓝色大理石》可能比《因为我讨厌韩国》更为挑衅。鉴于冷战时期爆发的内战仍在继续，结束战争和统一国家一直被视为韩国的历史使命。“和平统一”对进步阵营和保守阵营来说都是一个强硬的口号，使之成为一种政治陈词滥调。实际上，不管进步阵营还是保守阵营，所有为统一寻找具体方法和设想的努力都未能提供一个合理的蓝图。由朴槿惠政府设计并实施的“统一财运”（Unification Bonanza）甚至还因为直白地显露了开发朝鲜资源的赤裸裸的欲望，更为加剧了南北关系的紧张。

另一方面，现任政府的口号“新韩半岛体制”主张韩朝两国共同繁荣，看上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源自“韩半岛新经济地图”的“新韩半岛体制”的主要关注点依然是经济发展，其对“和平驱动型经济”的“良性循环”的强调（*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019）也表明了它的信念：韩半岛的和平将通过朝鲜的市场化进程来实现，这不仅有利于朝鲜人民，由于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有利于韩国人民。（2017 Sejong Policy Forum Special IV, 2017）。在这方面，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新韩半岛体制”完全有可能与“统一财运”相差无几。

此外，这一新举措的美好前景实际上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因为国家无力应对由长期的社会不公正造成的成堆的国内问题，从而把目光投向北边寻找光明的未来。让我们想象，当在南边严重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依然没得到解决的时候，一条连接南北的铁路运送货物和人

员越过边境。这会让“这里”和“那里”的生活变得更好吗？在台湾，反华情绪在两岸经贸往来蓬勃的时候达到顶峰，这类似于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后的情况。看一下港台的情况就可以知道，认为非武装地带的有力互动将治愈国家分裂所造成的创伤，这种想法似乎只是迫切想要解决眼前的现实问题而一时兴起的天真的尝试。

令人震惊的是，在尹的故事中，年轻人对“非武装地带的彼方”的想象甚至不包括朝鲜人。在《蓝色大理石》中，无论是平壤和开城，都没有对这两座城市的居民进行任何描述——而这两座城市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公寓开发项目。朝鲜人似乎完全被排除在外，只是短暂地露面，把自己的名字借给外国投资者。最后，作者将“统一”这一高度政治化的主题带入了赤裸生命（bare life）的领域，而将生活完全排除在外，而这是极具讽刺意味的。

先生，这只是公寓售房，不是统一。……你需要把它看作一个独立的概念。……假设公寓在2021年完工，我们可以保证届时会有两所幼儿园开放，单轨会在2025年之前建成。然而，我们不能说什么时候统一。我们所能说的是，无论是否统一，公寓的价格都将在近期上涨。（54-55）

《蓝色大理石》里的房地产经纪似乎很擅长和度溢这样对公寓开发和统一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的人打交道。她似乎在告诉他，要把统一看作是基本生活中又一个平凡的元素，而不要把它与政治联系起来。这回应了阿甘本（9）所描述的过程：“最初处于政治秩序边缘的赤裸生命的领域逐渐开始与政治领域相一致。”经纪人将统一从政治中分离开的说法，将几十年来一直局限于政治领域的统一问题转移到庸俗的生活领域，因而将生命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分界模糊了起来。事实上，《蓝色大理石》促使我们思考，一旦涉及统一议程的政治领域

■ 特稿

进入日常生活，会发生什么。

其中的一个答案就是，无论是朝鲜还是朝鲜人民，都不会被度溢和善英视为真正的他者；平壤只是韩国这座地狱所延伸的一部分。再说，他们获得的公寓所有权并不意味着惊奇的未来，因为在此过程中他者渗透自我而让自我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惊异时刻不可能发生（韩炳哲 2015, 46）；它只是对在南边得不到的“现在”的替代或补充。在故事的结尾，度溢和善英在样板房里自我安慰，这里有着假的首尔塔和汉江窗景，这一切似乎都给不确定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N抛一代”完全无法、不愿意也没有准备接受的不确定的未来。普通人对“非武装地带的彼方”的想象一点也不乐观。

3. 反对平庸的革命

3 - 1 向内逃

“逃离朝鲜”的“逃跑”概念与20世纪90年代的学术流行语“逃逸路线”（line of flight，德勒兹和瓜塔里）有所不同。后者的意思是通过脱离构成主体性的路径来削弱压制性的社会结构，而前者则缺乏对社会结构的积极介入，将目光转向外部。然而，正如我们在《因为我讨厌韩国》和《蓝色大理石》中看到的那样，如果“此时此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没有出路。桂娜的“澳大利亚”和度溢的“平壤”都被证明是由标准化的欲望所驱动的同质世界。没有与他者的互动，就不可能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现在的未来世界。正如韩炳哲所指出的，这种逃避只是对现在的重复，而不是进入一个作为他者性时间的未来（韩炳哲 2015, 46）。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黄贞殷的新作《DD的雨伞》。构成《DD的雨伞》的两篇小说——《d》和《无需说话》——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这两部小说都提到了“世越号”渡轮事件和“烛光革命”，并最终在小说结尾对革命提出了质疑。乍一看，这两篇小说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有所重叠，但后面却发生了平静而惊人的逆转。死亡和幻灭是这两篇小说的主题。第一部小说《d》的主人公“d”在一场交通事故中失去了他的爱人“dd”，而第二部小说《无需说话》的主人公徐秀京和叙述者则生活在一种生与死的界限非常模糊的边缘状态。不仅仅是“dd”像是被“一把无情而精致的镊子拔掉一样”扔进死亡中（黄贞殷，《DD的雨伞》，2019，21页，以下相关引文只表示页码。），那些还没死的角色也在经历着每天的死亡，“好像一点一点地摄入毒药”（257），默默地内化着自己的流逝。

然而，《DD的雨伞》以一种不同于《因为我讨厌韩国》和《蓝色大理石》的方式描绘了幻灭。与前两部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这里的幻灭感引导人物走向内心而不是逃向外部。在小说开头，李雄平（1954-2002）战斗机逃跑的惊人画面象征性地表达了黄对死亡和幻灭的感觉（27）。李雄平是一名朝鲜军事飞行员，1983年带着他的米格-19逃往韩国。战斗机“离死亡只隔着一层薄薄的金属板”，在死寂的天空飞行的那一刻，生与死之间的脆弱边界凸显出来。这一刻强烈地铭刻在“d”的脑海里，因为这是一种逃离“我的幻灭”的经历，而他实际上从未有过这种经历（112-114）。重要的是，“幻灭”这个词在这里明显是由所有格形容词“我的”所统摄的。在《因为我讨厌韩国》中，桂娜将这种幻灭完全归咎于外部现实。与此相反，在《DD的雨伞》中，主角们意识到他们深陷于幻灭的根源之中；由于自身就是幻灭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逃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是这种自我意识最终促使人们向内心而不是外部逃离。

在这部小说中，死亡不仅局限于生物领域；它还包括各种停滞状态。李机长的逃跑之所以刻骨铭心，是因为这一刻打破了时间的静止。作

者在这里寻找的是停滞的现在开始分裂的时刻。这一刻并不是通过逃离当下来获得的。相反，这是一个他者性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通向未来的通道——一种不同于现在的时间质量——最终通过在停滞的现在的长时间飞行而被揭示出来。

那么，“停滞的现在”意味着什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黄详细阐述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在韩国学术界，“平庸之恶”这个词往往是翻译成“악의 평범성”，等同于“邪恶的司空见惯”。而黄对这种翻译持怀疑态度，将此概念联系到阿伦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1963）中描述的三种无能：不会说话，不会思考，不能真诚地与他人沟通。因此，黄得出结论：“平庸之恶”这个概念的核心与不会思考相关，后者指的是“由于她/他完全依赖于陈词滥调，导致不可能与他者进行真正的交流”的状态（219）。换句话说，“平庸之恶”指的是一个人被自己的思想所禁锢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们安于现状，对现状没有任何挑战。此外，不会思考的状态最终会屈服于一个常识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黄将韩国普遍存在的仇恨情绪归结于屈服于不会思考的过程。

至于他（我的父亲），他既讨厌年轻人，也讨厌老年人，最讨厌的是工会、曝光和卢武铉。在他看来，罢工是代表共产主义的行为，揭露三星数十亿秘密资金的金勇澈是卑鄙的叛徒，而已故总统卢武铉是个庸人，从一开始就没有资格担任总统。那些人比我这样的蓝领工人挣得多的人为什么要去搞工会、搞罢工？在他的恼怒背后，似乎是对劳动和工人的厌恶，而在这种厌恶背后，似乎是对软弱的厌恶。特别是，鉴于当他对已故总统卢武铉发泄愤怒或厌恶之时经常说道“什么权威感都没有”，那么他对工人、金勇澈和卢武铉的憎恶难道不是一回事吗？我和金素里（我的妹妹）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对权威感的缺席感到厌恶。他对权

力的缺席感到厌恶。他讨厌软弱。（221）

父亲的憎恨针对于没有权力和权威。虽然表现为对弱者的蔑视，但它源于对权威的恐惧。他对权威的恐惧如此之深，以至于摆脱这种恐惧的唯一方法就是让自己认同权威。因此，他通过谴责那些没有权威的人来给自己赋予权威，并且“尽其所能地憎恨弱者”，以行使他所得的权威（222）。这种恶性循环表明，他对弱者的憎恨与接受自己的软弱的恐惧以及向权威投降的过程是纠缠在一起的。问题是，这位父亲曾经就在1987年起义的现场。

那年六月的一个晚上，母亲不同寻常地出来接我父亲，他们回来时身上有胡椒粉的臭味。他们一进屋，身上就散发出我和金素里以前从未闻到过的臭味。弥漫在整座房子里的气味几乎让我和金素里窒息。我们看着他们的脸——眼睛里充满了泪水，鼻子里流着鼻涕，脸颊可能因为擦拭而涨得通红——我和金素里以为他们经历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而哭泣了不少。可是他们反而充斥着欢喜。他们不停地说，那些家伙，那些家伙，然后发出一阵捧腹大笑。他们大笑着看着对方，看着我们，我们都很困惑。他们笑，说是因为脸颊被催泪瓦斯刺痛了；他们笑，说是因为跑得太快，腿酸了。我和金素里既之前又之后都从未见过他们这么快乐，这么热情。（215-216）

叙述者还记得1987年6月的那个晚上，她的父母都与她现在的年龄相仿。那天晚上，她的父母回到家里，身上沾满了催泪瓦斯，他们一起洗澡，开心地大笑，但现在他们说，这个世界太平庸了。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兴奋去哪里了？他们曾经嘲笑政府的权力结构为“那些家伙”——那些放肆的颠覆去哪里了？他们“向政府权力扔石头”的记忆去哪里了？（217）为什么曾经强烈地铭刻在身体里的灿烂的火花会这么快地被常识世界吞噬掉呢？这些自由的灵魂是怎样被当局驯服而接受征服的呢？为什么他们最终选择站在他们一边？

■ 特稿

为了寻找答案，黄将 1987 年父亲的经历与 1996 年叙述者在延世大学的经历进行了对比，尽管这两件事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叙述者回忆起当她在延世大学校园时与当局的对峙，当时，“祖国统一泛民族大会”的集会正要举行。虽然这个集会自 1990 年以来一直是年度活动，但那年当局决定宣布这是非法的，并威胁要以最严厉的手段对付所有叛乱。大约 4 千名学生被 2 万名警察封锁在科学楼和主楼，两架直升飞机在两座大楼的上空盘旋，向大楼投掷液体催泪瓦斯。即便是在学生代表机构韩国大学总学生会联合（简称，韩总联）宣布打算取消所有后续活动、同意解散之后，警方的严厉措施仍在继续。历时九天的对峙终于结束，警察冲进两座大楼，逮捕了 1800 名学生（民主化实践家族运动协议会 1996）。与 1987 年 6 月——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巅峰时期——相比，1996 年延世大学事件代表了韩国学生运动的彻底覆灭，即使当时韩国的学运已经在走下坡路。人们普遍认为 1987 年是韩国民主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但很少有人记得 1996 年延世大学发生了什么。人们也不知道这些学生，包括那些有幸逃脱警察的逮捕逃出来的学生，第二年就被卷入金融危机的漩涡，被“洒扫自己的庭院”的日常生活所吞没，在一蹶不振中沉沦下去。（186-187）

在 1987 年和 1996 年这两次看似毫不相干的经历的基础上，黄试图重新思考平庸之恶的意义以及它与革命的关系。不思考是“平庸之恶”的本质，是革命的残余。如同一个波浪总是被后来的波浪吞噬，革命注定会以其残余形式卷土重来，吞噬其遗产。1960 年 4 月 19 日革命后，现代主义诗人金洙暎（1921-1968）竭尽全力作斗争的就是针对革命后所产生的各种反动。同样，黄也不断地重返 1987 年 6 月革命，与其所剩下的反动搏斗。她想知道，一个在民主进程中经历过非凡时刻的社会，怎么会突然陷入如此不思考的状态？它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让自己陷入势利主义呢？这种势利甚至比上世纪 60 年代让金洙暎极为厌恶的狭隘的小资情怀还要糟糕。我们怎样才能摆脱这种时间的停滞呢？

3 - 2. 摩擦的力量

为了摆脱这种停滞状态，黄选择回到革命最初发生的地方。她决定重访父亲的1987年和自己的1996年，以及光化门广场（烛光革命的发生地），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以及不思考的症状是如何产生的。为了不使这些革命的时刻停留在开始的地方，必须不断地提出这些问题。

当“d”和朴朝培挤过钟路、清溪川和光化门广场的人群时，他们看到了一场“让革命变得几乎不可能的革命”。在人群中穿行时，他们意识到人群沿着警用大巴路障而移动的过程，在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堡垒。这个人群堡垒沿着世宗大路十字路口形成，使得光化门广场的入口变成一个“安静、静止的真空”空间（132）。当他们面对这个空洞的实体时，死亡的深层意义突然显现出来。死亡并不止于“世越号”渡轮上的受害者，它的本质包括思考的悬置——也就是停止任何努力去“介入那些因微不足道而可以被一击致死的人们”。“d”凝视着巨大的毫无意识的人类堡垒，它是如此的巨大和密集，以至于无法听到来自另一边的人群的尖叫，“d”意识到这场革命是“由发明了堡垒的人制造的”（133）。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突破这一牢固地处于革命的中心、既不可战胜又陷于无形的堡垒呢？我们又该如何打破革命拖延了革命的进程这种悖论，而切入那堵空心墙，裂开通向未来的出口？我们首先必须考虑《DD的雨伞》两篇小说之间的裂痕。仔细阅读就会发现，《d》和《无需说话》当中有几个场景重复出现。随着“世越号”渡轮沉没一周年纪念活动的展开，每位主角都来到了光化门广场。随后，他们都遇到了由多层沿着警车路障组成的人群壁垒。然而，这两组角色的反应是不同的。“d”认为“（尖叫的）声音不可能通过真空管，也就是这里和那里的距离”（133）从而放弃前进，《无需说话》的叙述者说道，“我们往前走吧。”（290）而且，叙述者

的爱人徐秀京¹⁵说了一句更犀利的话：“没有逃跑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制造摩擦。”

对于那些无处可逃的飞行员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回到他们的世界去杀死他们的父亲 / 老师 / 默认的价值。如果无法选择逃跑，我们必须继续在这里飞行并制造摩擦。”(292)

当他们被警车路障困住了，无法向南边或向北边移动的时候，徐秀京突然想起了函南优一（Yuichi Kannami）在《空中杀手》（Sky Crawlers）中的袭击。¹⁶在这部影片的世界里，罗斯托克（Rostok）和劳特恩（Lautern）这两家公司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模拟战争，通过满足民众对战争的渴望来维持和平。每当一方占上风导致他们之间失去平衡时，TEACHER 就会出现来恢复它。TEACHER 在本质上作为系统本身是不可战胜的。然而，函南优一在他前生中因为对自己无法克服的绝望感的沮丧而选择自杀，回到现在企图杀死 TEACHER，即使他知道 TEACHER 是不可战胜的（291）。《空中杀手》的情节为《DD 的雨伞》提供了一个颠覆性的契机。当“d”因为被巨大的堡垒吓倒而停下前进的脚步时，这让人想起了优一的前生人物——栗田（Jinroh），他被困于令人窒息的系统平衡中无法自拔。相反，徐秀京和叙述者与此不同，当他们面对同样的壁垒时毅然决定向前迈进，就像挑衅权威的飞行者——函南优一。《空中杀手》的情节突出了这样一个醒悟：从系统中逃逸本来是不可能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系统内部制造摩擦。

当她们进入光化门广场时，烛光革命的抗议正在进行，眼前的情景让徐秀京和叙述者感到不适——“和平抗议示威好公民”的自豪感使她们感到不舒服，因为这个框架排除了那些绝望的“开着拖拉机来到首尔”与警

15 《无需说话》中暗示的叙事者与徐秀京是同性恋者。

16 《空中杀手》（“Sky Crawler”）是日本动漫电影，导演押井守，2008 年上映。这部电影改编自森博嗣的同名小说（2001 年），同时还有同名游戏（2008 年）。故事情节和主要角色在三部作品中相互交织。详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r82n7mmYas>; <https://francismurillo.github.io/2017-03-23-The-Sky-Crawlers-Analysis/>。

■ 特稿

察发生争执的农民，以及在南一堂楼顶上静坐抗议，直到五人死于大火的龙山拆迁户。¹⁷她们不禁要质疑，对“和平抗议”和“成熟民主”的自豪感是否意味着可以无视那些“不正常抗议”的“坏公民”的伤口。徐秀京和叙述者看到一名男性抗议者写着的“恶女 OUT”的标语，都感到哑口无言。她们不知道如何应对革命中这种公然厌女的语言。很明显，“我们是一个整体的巨大错觉”在整个革命中流传(294-307)。她们愤怒地质疑，在总统朴槿惠被弹劾的那一天，革命是否会真正取得成功。就在几分钟前，广场上的人群还在欢呼雀跃，此时，徐秀京和叙述者站在离他们只有几步之遥的地方说，“是时候把他们都唤醒了”(314-315)。

黄似乎认为，革命最可怕的时刻是人们相信革命已经完成的时候。曾经在炽热旋风中飞扬的尘埃最终会沉淀并固化成另一个系统，抹去思考的能力，用常识取而代之。在这方面，徐秀京在革命最高潮时想到优一的回归是有意义的。在设置这一场景时，黄密切关注一个潜伏在革命的热情欢呼中而试图把创造性的混乱带入平衡状态的反动力量。如果不攻击这个力量，革命运动最终将进入一个新的平衡点，其能量将转化为另一个僵化的体系。实际上，这仅仅是对一个悖论的重复：由死亡引发的运动最终将自己锁在了死亡的状态中，就像父辈那一代人在1987年所做的那样；在他们用鲜血和眼泪换来那一刻的一腔热血和激情之后，又立即把它交给了另一个权威世界。

为了避免这种矛盾，黄断言：“我们必须制造摩擦”。摩擦是一种力量，它可以通过抵抗物体的相对运动来促进物体的运动。根据定义，没有摩擦就只剩下惯性。对黄来说，摩擦是刺激真空管运动的唯一方法，也是刺激停滞的时间再次流动的唯一方法。摩擦会阻碍能量在广场上的循环，使之

17 龙山惨案在2009年发生。韩国警方在首尔龙山开发区驱赶拆迁户的过程中，双方发生了冲突，6人死亡。后来，25个拆迁民被起诉，其中8个人坐牢。2019年，检察过去事委员会通过一些调查，得出当时的检方起诉有误的结论，并劝告检察机关向受害者及其家属道歉。然而，直到2019年6月，检察总长在一个刑满出狱的拆迁民因精神伤害而自杀之后，才向受害者公开道歉。

无法找到平衡点，无法转化为一种由常识和权威驱动的力量。它将阻止革命的活力被僵化的体系所吸收，并最终通过仅仅依靠其内部能量而帮助它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出口。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在《DD 的雨伞》中，两篇小说之间嵌入了惊人的重复手法，仿佛体现了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话：“它发生过，因此，它也可以再次发生。”重复的部分包含了预兆和颠覆的可能性。例如，《d》中出现了李雄平的米格-19 战斗机，而函南优一的战斗机出现在《无需说话》中。李的米格战机在空中抵抗“停滞的现在”，创造了一个切入到另一个世界的瞬间。当在《无需说话》中优一的战斗机返回现实并摧毁了系统的时候，优一既是李雄平的复活又是颠覆。此外，金素里在《无需说话》中新生的孩子似乎是“d”已故爱人“dd”的复活。并且，虽然“dd”的死亡在《d》中意味着“世越号”渡轮的沉没，但4月16日（事件发生的同一天）再次出现在《无需说话》中，即徐秀京的生日那天。黄如此精致得把死亡和新生以预兆与颠覆的方式互相交织。这些重复几乎像是施了一种魔咒——一种期待，即一场曾经爆发过的革命将会再次爆发，并持续不断地存在下去，而不是一结束就停止。从这个角度来看，《d》的结尾是最重要的预兆：“d”将手指伸入音频真空管，被“可怕的高温”灼伤(145)。

“d”吃了大惊盯着真空管。虽然他已经把手指拿掉了，但他觉得那层透明的玻璃薄膜还粘在手指上。持续的疼痛就像刺入皮肤一样。不要小看它，余所馥说。你应该小心，因为它可能会很烫。(145)

在位于钟路区的世运购物中心的余所馥商店，“d”盯着“充满光和信号”的音频真空管。玻璃管的墙看起来很薄，很不安全。这让他想起了世宗大路十字路口“空虚、阴郁、死亡”的空间，就在几天前(144)，他还在那里徘徊。这里对场景描绘的不仅仅是为了对比。它为下一部小说施了魔法，

希望能带来深远的变化；希望思考的运动能够永远地搅动现实，并将“缺乏流动的空间”再一次转变成一种“充满光和信号”的状态；希望解放广场的精神无法达到平衡；希望这个世界在永不疲倦的永恒状态中蓬勃发展，对平庸的世界进行不懈的抵抗。

4. 他山之音

一旦革命停止滚动，在广场上泛滥的能量就会变成一个不可战胜的、难以驾驭的体系。当常识的世界取代了不断推进的混乱并成为权威能扎根的土壤时，我们就不再对在这个系统中看不到的东西提出质疑——也就是说，“无需说话”。这就是平庸之恶的含义。黄坚持考察潜伏在革命中的邪恶。如果认识不到革命中存在邪恶，我们将无法解释韩国社会是如何在烛光革命取得巨大胜利的同时，滋生出荒谬的仇恨情绪。

1960和1987革命告诉我们，革命注定会反复，并受到由此带来的打击。不可思议的仇恨和厌女症现象的出现只能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革命创造了一个众声喧哗的空间，这其中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然而，一旦革命以胜利告终，相互竞争的声音融合成一种新的常识，残余势力的不速之客就会以反动的形式卷土重来。如果革命想要防止被它自己的退步所吞噬，它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滚动——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永远不停止思考，不停止说话，不停止努力与那些与我们不同的人沟通。一旦我们停止思考，失去与他者沟通的能力，我们最终会陷入平庸的深渊。这就是黄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那一段来警告我们的：当被问及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入侵时，讲解员的回答是“我们不能评判他们”，在此，黄再次感受到了平庸之恶的幽灵(282)。

那么，怎样才能使革命继续下去呢？我们如何通过不同的声音相联

系，持续投身于对他者世界的追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黄是从“墨字”¹⁸的角度来解释的。“墨字”指的是与布莱叶盲文即“点字”相对的印刷字母。虽然人们都知道“点字”是为视觉受损的人设计的一种字母系统，但很少有人听说过这个为非盲人设计的字母系统的名称。这是因为“墨字”本身是一种常识，因此没有必要专门提及它(274)。在“墨字”的世界里，它的存在是无形的。只有生活在盲文的世界里的人们才会认识到“墨字”的存在。黄似乎要通过“墨字”来主张，我们需要他者的视角才能看到我们自己。为了让他者的眼睛嵌入我们的身体，我们必须通过不断地制造摩擦来干扰自己的身体。只有竭尽全力，不断地质疑自己，与他人沟通，我们的世界才会保持运动，而不是屈从于平庸。从这个脉络看，“世越号”渡轮悲剧中幸存下来的一个男孩的话很犀利：

如果每个人生来都有一个目的，那么我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我生来不就是给人带来希望的吗？虽然我还不确定，但我希望我能帮助别人……我希望成为一个能倾听、解决或至少能分担他人痛苦的人。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追求，但这正是我所梦寐以求的。我感到我被给予了太多。……我该如何回报我所得到的？当我长大，开始我的职业生涯，我会倾听别人的话，尽可能地向他们学习。这样做的话，我想，我有能力让希望重返社会。”（世越号悲剧写作记录小组 2016, 89）

这个男孩在思考“世越号”渡轮事件中所使用的语言听起来有些陌生。我们从他那里听到的是一种异质的声音，一种与来自广场上的一致的、压倒一切的呼声相反的声音。当他叙述 304 名乘客（其中大部分是他高中的同学和老师）因为被遗弃而死亡的痛苦经历时，他的话语的动力是诸如感激、幸福和希望之类的词语，而不是仇恨、愤怒和诅咒。看到这个男孩在

18 在韩文汉字词典中，“墨字”的定义是如此：用墨水写的字，尤其指的是相对于“点字”的文字。 <https://hanja.dict.naver.com/search?query=%E5%A2%A8%E5%AD%97>。

经历了“世越号”的幻灭之后，踏上了致力于成为社会中有意义的一员的艰难道路，我深受感动。他的声音对革命中形成的同质性的语言产生了轻微的摩擦，奇迹般地抓住了希望的迹象。也许正是这种微小的摩擦激励我们不断地质疑这场革命已经取得和尚未取得的成就，并激励我们不懈地追寻那些他者性的时刻。

参考文献

- 千关律【音】 천관율 .2018. 《천관율의 줌 아웃》 [千关律的缩小屏幕]，首尔：未知图书。
- 张康明 장강명 .2015. 《한국이 싫어서》 [因为我讨厌韩国]，首尔：民音社。
- 崔成龙【音】 최성용 .2019. “‘20대 남성’ 담론을 질문한다” [质问‘20多岁男人话语’] 《황해문화》 [黄海文化]，第 103 号，93-113.
- 崔泰燮【音】 최태섭 .2019. “2000년대 이후 여성 혐오의 양상과 ‘억울한 남자’들의 도래” [2000年代以后厌女症及冤枉的男人]，2019年6月21日细桥论坛发言稿。
- 严奇镐 엄기호 .2017. 《노오력의 배신》 [努力的背叛]，创批。
- 韩炳哲 한병철 .2015. 《에로스의 종말》 [爱欲之死]，首尔：文学与知性社。
- 黄贞殷 황정은 .2019. 《디디의 우산》 [DD的雨伞]，坡州：创批。
- 全孝宽【音】 전효관 .2019. “청년, 사회 전환에서 해결의 실마리를 찾자” [青年，通过社会转变寻找解法]，《황해문화》 [黄海文化]，第 103 号，114-129.
- 陈泰元【音】 진태원 .2019. “우리 사회의 증상으로서의 청년” [作为我们社会症状的青年]，《황해문화》 [黄海文化]，第 103 号，2-16.
- 金昌仁【音】 外 . 김창인 외 .2019. 《청년현재사》 [青年现在史]，首尔：时代之窗。
- 金宏重【音】 김홍중 .2018, 《마음의 사회학》 [心眼的社会学]，坡州：文学村。
- 李忠汉【音】 이충한 .2019. “위기에 빠진 것은 ‘청년’이 아니라 ‘사회’다” [陷入危机的是‘社会’不是‘青年’]，《황해문화》 [黄海文化]，第 103 号，44-61.
- 朴权一【音】 박권일 .2016. “‘헬조선,’ 체제를 유지하는 과국론” [‘地狱朝鲜，’支撑体制的危机论述]，《황해문화》 [黄海文虎]，第 90 号，73-95.

- 柳在衡【音】류재형 . 2018. “내셔널 시네마로서의 <변호인>, <택시운전사>, <1987>” [作为国民电影的《辩护人》、《出租车司机》、《1987》], 《만화애니메이션연구》 [漫画动画片研究], 第 53 号, 275-318.
- 苏荣炫 소영현 . 2016. ““ 헬조선 ’에서 ‘ 탈조선 ’을 꿈꾼다는 것” [在“地狱朝鲜”梦想“脱离朝鲜”], 《창작과비평》 [创作与批评], 第 44 集 第 2 号, 292-308.
- 世越号悲剧写作记录小组 4.16 세월호 참사 작가 기록단 . 2016. 《다시 봄이 올 거예요》 [春天会再来], 坡州：创批 .
- 尹高恩 윤고은 . 2019. 《부루마블에 평양이 있다면》 [如果蓝色大理石里有平壤], 坡州：文学村 .
- “은둔형 외톨이 만든 취업 빙하기, 우리 20 년 후는?” [产生隐遁性蛰居族的就业冰河期, 20 年后我们会如何], KBS NEWS (2019 年 6 月 5 日).
- “홍콩 시위에서 ‘임을 위한 행진곡’이 울려 퍼졌다 [香港街上合唱者‘光州之歌’]” 《한겨레신문》 [韩民族日报], 2019 年 6 月 15 日 .
- “20 대 남자, 그들은 누구인가” [20 多岁的男人, 他们是谁?], 《시사인》 [时事 IN] 2019 年 4 月 15 日 .
- Agamben, Giorgio, 1998.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on, Jae-In, 2019. “The Greatness of the Ordinary,”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May 7, 2019). <https://english1.president.go.kr/Media/Interviews/537> .
- Epstein, J. Stephen, 2018. “Because I Hate Korea,” *The Asia Pacific Journal/Japan Focus*, Vol. 16, Issue. 11. pp. 1-12.
- LanKov, Andrei. 2008. “The Fiasco of the 386 Generation,” *The Korea Times*, (May 2, 2008).
- “The Glass-ceiling Index,” *The Economist*, March 8, 2019.
- “IMF 20 Years On,” *Korea Exposé*, December 29, 2017.
- “Online Community Shocks Korea with Attacks on Minorities, Women,” *The Korea Herald*, December 17, 2014
- 民主化实践家族运动协议会 민주화실천가족운동협의회, 1996. “5,715 Students Arrested After 9 Day Protest And Police Brutality” September 26, 1996. <http://www.hartford-hwp.com/archives/55a/204.html>
- 世宗研究所 세종연구소 . 2017.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for the ‘New Economic Map’ Initiative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Minute of ‘2017 Sejong Policy Forum Special Session IV’.



危难见人心

王晓明*

100

危难见人心

危难见人心，在疫情中暴露出来的各色状况中，这一种是最荒诞的吧：举国上下，一片“湖北加油”的喧腾，在湖北以外，湖北人却成了不问情由、一律冷眼相向的对象。

平常大家嘻嘻哈哈，岁月静好，一旦你陷入可能妨碍或拖累别人的境地，众人就立刻公然地嫌弃你：这还是人世间吗？哪怕你此刻并非嫌弃的对象，但看到旁人一个个同仇敌忾、指着那倒霉蛋：“你走开！……”，你以后还能继续跟他们嘻嘻哈哈么？

也许还是能，网上有人说：中国人的记性跟鱼差不多。

并非只是身份证以“42”开头的人，才公然被嫌弃，只要你来自某个发生疫情的地方，要进入另一个据说还没有发生疫情、或者据说疫情比你所来之处轻的地方，你所来的那个地方，就变成了“湖北”，你也就有极大的可能，被冷眼相看，被呼来喝去，甚至被拒之门外，成为一个“湖北人”。

不仅如此。就像湖北人莫名其妙地被疫情砸中——我们至今不明白疫情为什么在武汉爆发——一样，此刻的非湖北人，完全可能在下一场疫情中、或者因为别一种什么原因，也被砸中，成为万人嫌的。这些年，“河南人”啊、“东北人”啊，就已经被这么嫌弃过了——虽然程度比这次轻。风水轮流转，只要大情况不改，谁敢说一定不会轮到我？

可是，看那么多“非湖北人”气势汹汹嫌弃“湖北人”的样子，似乎他们就是想不到“明天也可能轮到我”。看来，很多时候，我们在联想、

* 王晓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推理、换位思考这些方面的能力，也都跟鱼差不多。

不只是大陆中国人表现这么差。2月20日从武汉撤回本国的50多位乌克兰人，也遭遇一些当地人的公然嫌弃，所乘的飞机无处降落，所坐的巴士遭遇路障：成了乌克兰的“湖北人”。

至于其他地方，近如香港台湾，远至西欧北美，因为疫情而惊慌失态，对其所认定——经常认错——的嫌疑者满脸憎色、甚至恶言相向的情况，也都时有发生。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针对大陆中国人的。这不全是因为疫情，许多另有深广的原因，在这里无法一一排列，只说一点：很多确实是我们咎由自取。但尽管如此，借着疫情而公然这么嫌弃，还是暴露出了嫌弃者自身的孱弱和小器，他们与中国大陆那些嫌弃“湖北人”的“非湖北人”，其实差不多。

再放宽一点看，这些年，全世界，在别的事情上表现出同样的孱弱与小器的情况，好像都越来越多。全球化的时代，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胸襟却日渐稀少，彼此猜疑、厌憎、党同伐异、以邻为壑、“你多了我就一定少”……这样的紧张和惊慌意识的弥漫之势，远比这一次的疫情大。

这当然是因为，许多过去遗留下来、分裂人类的高墙：阶层的、种族的、宗教的、性别的、政治的、生态的、地域的……，非但没有削低，还添上了新砖。法国经济学家皮可提就在其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中说，在财富总量上，与占全球人口1%的富人相当的全球人口，已经从20年前令人惊骇的90%，进一步恶化到今天的93%。各种全球危机——包括新冠肺炎这样的公共卫生危机——的深刻难解，更是大家都知道，不用多说了。

处境恶化，就容易惊慌，压制不住小器之心，这是人之常情，那些“非湖北人”之所以露出那样的嘴脸，一大原因，就是他们真的惊慌。

可是，这样对付不了危机。如果大家只是互相疏远，以邻为壑，结果

一定是洪水呼啸，把所有人一齐卷走。越是困难的时候，越需要大家携手，一起来改造社会，拆掉高墙——只有这么做，人类也好，一个社会一座城市也好，才可能有长远的未来。

这正是“危难见人心”这句老话的本义所在。满桌子肉菜，你舀几勺给乞讨者，这不算什么，手中只有一个红薯，肚子饿得咕咕叫，却能掰一块给旁人，这才是为人之心。

武汉封城的当天，四千多私家车主组织起来，义务接送医护人员；两三百家小旅馆的老板——说来好笑，我这是第一次以褒义用这个称呼——也组织起来，免费向医护人员提供住宿，一周内总数就达4万余间/晚。这样的义举还有许多，它们共同证明了，本义的“危难见人心”不是空话。

再举一个台湾的例子：

2月27日，台湾的14位中青年学人，以王智明（中央研究院）和黄文倩（淡江大学）两位教授领衔，联名发表了一份题为“救无别类，应物无伤”的呼吁书，大意如下：¹

新冠病毒爆发以来，（台湾的）部分媒体和当局至今仍不改变“武汉肺炎”的误称，疾管署针对陆生与大陆籍旅客采取关门措施，搁置接回武汉台胞的包机，……再再显示政府与台湾社会的言语暴力与反中情绪已达新高。……严重挫伤了台湾社会向来引以自豪的民主价值与公道精神。结果两岸民心渐行渐远，敌意仇恨日深。不只在台湾求学和生活的“陆生”和“陆配”产生心理创伤，在大陆经商、工作、求学与生活的台湾公民亦无奈成为流亡彼岸的“难民”，以致有台商、台生宁可返陆面对病毒，也不愿在台湾被视为病毒。对于宣称以人权立国的

1 摘引时有省略，均以“……”标示；括号内文字系我所加。

民进党政府而言，这无疑是最大的讽刺。但更为关键的是作为国家主权的公民你我，究竟是要放任心中的恶意无限扩大，还是愿意回到生而为人的基本情怀，务实而诚恳地对待我们身边的彼此，以及来往海峡之间的人民。

台湾不是一座海上孤岛，……我们无法杜绝外人而自保，更不该以恶意为防御。实事求是，以直报怨，良善有礼才是台湾的本真与立国之道。……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我们更应放下无谓的分别心，“救无别类，应物无伤”，为台湾赢得更多的尊敬与善意。

基于以上信念，我们提出五大要求，呼吁国人响应，政府响应：

一，拒绝以防疫包装歧视。不论个人的政治认同为何，公共意见的表述与国家政策的施行，都应该考虑四海一家的手足情怀。人权，一如病毒，不分国籍，种族，性别与性倾向。我们强力主张政府，立即取消歧视性政策，积极保障陆生、陆配与所有在台居留者合法入境与医疗的权利。尤其我们不该忽视误称背后的歧视，放任误导性的用辞伤害来往两岸的国人，复制西方社会对华人及亚洲人的歧视。

二，抗疫无国界，救援要实时。……尤其在疫情困难，造成伤亡的当下，予以中国大陆民间实质的支持，避免不必要的情感伤害，是必要的举措。我们建议两岸政府有效合作，建立与优化两岸医疗通报与资源共享系统，鼓励民间互助，支持台湾加入国际卫生组织，贡献经验与资源，确保自身安全，更积极协助中国大陆抗疫。

三，……台湾的民主政体有赖于彼此尊重与公民道德的维系。尽管投票结果有多数和少数之别，但媒体声量的大小不该被视为社会中的

实质多数和少数。……（“逢中必反”）不是爱台的必要表现，更不该成为台湾在国际社会与两岸关系中的唯一声音。……

四，正视台湾对两岸四地的责任。就算两岸四地未如一家之亲，仍要正视文化相近，地理相邻的事实。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台湾无法回避的课题。不论政治信仰为何，台湾社会与执政当局都必须考虑，理性讨论两岸关系何去何从，并将中国大陆和港澳人民的想法与感受考虑在内，化解保台必须反中的仇恨情绪。尤其我们应该从支持与深化两岸四地民主化，以及确保东亚区域和平与稳定发展的角度出发，关心与考虑两岸事务，而不是自扫门前雪，或在民生困局中谋求政治利益。

五，反对民粹情绪勒索。台湾的反中情绪有高度民粹化与恶质化的倾向，我们对此提出严正的批评，期许台湾社会恢复“良善有礼”的社会风气，去除暴戾言语相向的恶习。

我们知道自己力量有限，仅是一份声明起不了太大作用，但是我们相信，台湾不该任由封闭的民族主义所绑架，更不该放纵歧视的言论与政策。我们呼吁社会的中道力量，对抗歧视，敢于善良。

在今日台湾一派讨厌和敌视大陆的气氛中，发表这样的呼吁书，是一定会招来不少责难，引起当局的不满的。明知如此而依然登报上网，公开呼吁，是因为这些发起人依然对社会抱有信心，知道被危难激发起来的，并不只有狭隘盲目的小器之心，一定还有四海一家、救无别类的大同之情。

在一周的时间里，即有七百多人在这份呼吁书上签名，其中大多数来自台湾的各类文教和经济机构，也有数十人自述为“工人”、“家庭主妇”或类似的身份。不用说，联署人每天都在增加。

■ 殊音 _

因为社会灾难和小器之心的恶性循环而亡国灭种的事情，历史上是很多的，由此反推，我们的社会能走到今天，就说明还没有被那个恶性循环完全罩住，危难时刻，总是有平常看不大见的大器之心奋然而起，即从“文革”末期到今天，我就已经多次见过这样的情况。

尽管如前所述，世界各地的小器之心，和它背后的那个恶性循环的暗影，这些年一直都在增大，我却依然相信，人类不会被它们吞没。台湾学人发起的这一份呼吁书，就是我这信心的一个新的例据。

3月8日 上海



编者按

梁成林 *

进入 2020，迎接我们的是一场名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疾病。当它在中国大地上迅速蔓延开来时，随之出现的瞒报风波、封锁政策等一系列争议事件，也牵连出了我们社会的久病陈疴。人们不禁质问，疫情的状况是否应当及早公开？行政手段的强制是否存在隐患？而在“封城”之后，医疗物资的调配、普通市民的生活保障要如何处理？一时间，以疫情为触机，中国网络上爆发出了少见的，对于公共事件的热切讨论。大家或记录、或追问、或提议、或批评，试图搞清楚我们的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又该往何方驶去。

一个多月来，当代文化研究网的公众号以“疫情中的中国”为题参与在这一记录、追问和讨论的社会进程之中。考虑到公众号的文章不宜保存，容易流散，本次“现场”专栏特将在此期间刊发的公众号文章整理归档，留此存照。

其中，《炖锅日记》与《疫时记》记录的是我们大家对于疫情最初、也最切身的记忆和感觉：严格限制的交通出行以及突然脱销的口罩，至今仍是大家的共同困扰。从这两个问题出发，炖锅与明乐都谈到，越是在紧急的情况下，政府包办的巨手就越是左支右绌，随处可见的“排拒”事件正是这“独臂擎天”的后遗症。此时，平日里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积累起的民主经验，就显露其必要性，不仅有望解决社会上只有一只手在动的踉跄局面，也能转变官民上下面对大事得过且过的逃避心态。

如果说炖锅与明乐是从内部行使民众的“建议权”，敦促社会的改良，

* 梁成林，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那么周銳澐则是以种族主义为题，提供了她作为韩国人看待疫情的另一种视角。排拒不仅发生在小区内外、地方之间，在全球右转的情势下，疫情也带来了种族主义的歧视。在此危难关头，她提出真正应当建立的是一种国际主义式的共同体。此时正值韩国疫情爆发的时期，不知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不以嘲讽和排斥，而以温情和鼓励面对正处在艰难时期的他人？

朱天成的两篇文章，着重讨论的是“灾难中的人”这一主题。疫情期间，因为祖父重病缠身，作者一家被迫在交通封锁和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辗转求医。在这“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困境中，他方才深刻地体认到，是人，而非数字承担着灾难所带来的真切后果。正因如此，他反倒对体制内外的人多了一分信心：毕竟，有血有肉的人，是终究不能被程序化的。

非白、岚山蓝与 Sid 这三位年轻朋友的文章是对“李文亮医生之死”不同角度的反思，与炖锅先生的笃定不同，青年们的声音带着些试探的意味。岚山蓝问道，在体制的规训下，我们能否具有不沉默的勇气。非白则认为，尽管真实难求，但社会对真实依然存在着锲而不舍的追寻。这与 Sid 对谣言的思考不谋而合——官民之间的互相信任是借助开诚布公地探讨谣言，而非由其中一方宣布真理而开始的。

周雷和燕赤霞的文字是对“建议权”的延续。周雷以疫难为切入点，展开了对安全观念的新思考。我们在此节选了他对“跨物种安全”与“累卵社会”的陈述，一并附上他列在文中的“疫事书单”，希望能够帮助读者从不同的视角理解当下的疫情。而燕赤霞则在两篇文章中，展开对人们认为的“讲科学的政府”的祛魅。种种严苛的封锁政策和监测系统看起来“科学”无比，但当这科学的权柄使得歧视与排拒成了正当行为，让行政手段的过度干预显得无可厚非时，科学实则早已成为了政治权力的下属机构。在此情况下，我们是要假装一切如常，照本宣科地“停课不停学”，还是该抓紧时机借由危机理解我们社会的运转逻辑，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也正是因为有了非典型性的“停课不停学”，才有了之后“线上吐槽会”

式的讨论：一群学生在特殊时期围坐“微信”圆桌，就疫情时期高校行政系统对学生的各种要求，表达了自己的困惑。

最后，面对当前严苛的舆论管制，还有一些思考独到、言辞恳切的文章，因为审查之故，已经从网络世界当中消失不见。专栏最后的这篇“不完全阅读史”，记录的便是在疫情中国的舆论史中业已失踪的一小部分。在这个时代，记录的消失似乎是不可避免之事。希望通过这份保留下来的“不完全阅读史”，让我们时刻不忘这一类的消失，警惕此种消失对集体记忆的作用 / 影响，并为此后可能的历史书写优先附上这一页的空白。



炖锅日记

没想到，才过了十七年，我们就要再次经历一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很多人感慨中国人的健忘，但差不多一百年前，当时的人就已经如此感慨过了；现在这样的互联网式的信息传播，更会以蜻蜓点水+迅疾换屏的方式，加速度地打散人对现实的感受，令我们的记忆更难持久；再加上还有筛查制度……

于是决定写日记。记下我自以为重要的见闻，也记下我的即时的感想。炖锅也是锅，慢一点，温吞一点，还是能把事情煮明白的。

口罩虽小，关系却大

2020年2月1日

武汉封城的第二天上午，上海西区我的住处旁边的药店门上，已经贴出了告示：“口罩售完”。但这只是贴给我这样的普通居民看的，一位大妈蹬蹬地走进来，径直问：“口罩有伐？我是居委会的！”售货员答道：“你找我们老板，给居委会的口罩都在他那里……”

我就在柜台边，一点不生气。中国人都懂的，任何东西，只要稀缺了，一定是优先供应官家。你看这药店老板，一知道口罩成了紧俏物资，就立刻分出一部分——以我小人之心忖度，应该是大部分——存着，以备官家来要：那都是他平日里需要殷勤招呼的，现在有了可以孝敬的机会，当然要抓住了。听电视里说，春节过后，上海的医用品工厂全部开工，每天可以生产15万个口罩。“没关系，等他们都有了，就会轮到我们的”，我对自己说。

但我算错了。张文宏医生估计，半个月到一个月以后，疫情会形成拐点，这就是说，至少半个月里，疫情还将继续扩大。中国有近 14 亿人，而口罩应该每天换，哪怕 100 个中国人每天只消耗 1 个口罩，每天也需要生产 1400 万个口罩，相当于 100 个上海的生产量！

中国是世界工厂，很多方面都是产能过剩，但像口罩这种一般情况下需求和利润都有限的商品，不会拥有每天 1400 万个的产能吧？¹当然可以从国外进口，但这个疫情正在蔓延到全世界，各国的口罩首先得供应本地人；就算还能有一部分运来中国，以目前这种到处封路、物流受阻、恐慌性囤积成风的情形，多半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那“就会轮到我们的”的预想，是要落空的：十天过去了，上海的各处医药商店里，口罩依然缺货。甚至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和周边城市的医生们，也都缺少合用的口罩！

昨天在网易视屏看到一段录影：上海某医药商店里，三位制服人士，两男一女，其中一人捧着一纸箱口罩离开柜台，站在边上的视屏拍摄者（女性）批评说：“我来了三趟，都没有买到口罩，原来被你们一箱一箱买走了！”一位制服男回答：“我们是有文件的……”女声却不买账：“你们有文件，我们老百姓怎么办？我要把你们拍下来！”视频镜头一路跟着那纸箱，直至它被放进店门外的一辆车子里，车身上印着：“市容监督管理”。

今天又看到一则视屏：武汉红十字会仓库的后门口，一位中年男士往一辆轿车（车牌为鄂 A0260W）的后盖箱里放一个印着“3M 口罩”的大纸箱，视频拍摄者（记者）问：“你这是给谁的？”男士一脸不悦，反问：“你想干什么？”倒是坐在驾驶座上的憨厚的司机面有愧色，说：“是配给领导的……”²

1 后来得到了官方的数据：全国的口罩日产能力最大可达 2000 万个，在疫情爆发前，实际日产量不到一半。

2 武汉市政府办公厅于 2 月 2 日在网上回应这个视屏：“为了保障和解决机关一线工作人员防护问题，……我厅工作人员……2020 年 2 月 1 日下午 2:30……找市应急物资储存仓库管理人员领取了口罩等相关防护用品。”

我也该有愧色：这两位市民和记者都比我正常，他们很生气，因为他们没有我那种糊涂的预想，大概也不觉得口罩就该优先供应官家人。还有人在网上援引国家的有关法律，明确指出：挪用应急物资——在疫区，包括口罩在内的医疗用品就是应急物资——就是犯罪：这样的不含糊的立场，更令我佩服。哪怕连着好几天看到太阳打西边出来，也应该守住是非的底线：太阳理当从东边升起。

回到口罩：既然它势将继续供不应求，各级政府就有责任做到两点：一，管住自己的人，禁止他们利用特权侵占民众急需的口罩；二，优先满足一线医护人员及其他特殊人士（如交通警察），对其余人——包括坐办公室的官家人——实行计划和凭证供应。

什么叫“执政为民”？能做到这两点，就是！

民众的“建议权”

2020 年 2 月 4 日

在中国大陆，公共事务是由政府包办的，即便在疫情汹涌的武汉，政府仍然坚持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警方要查办那 8 位在微信群里讨论疫情的医生，也是为什么应急物资都必须由官方渠道——武汉红十字会——来接受和分配。

如果民众看不下去，自己要做一点公共的事呢？也是可以的，譬如捐赠钱款和物资。但此外的空间不大，武汉封城那一天，四千名私家车主组织起来运送上下班的医务人员，这一令国人刮目相看的义举，就因为政府在市区禁行非特许的机动车，持续不到 3 天就结束了。

那就乖乖把自己种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当然不是。虽然现在只有政府的巨手可以自由做事，但看这几天的情况，百姓似乎也挣得了做一件事的新的空间：给政府提建议。如果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让政府的巨手动作快一点，做得聪明点，那也行啊。疫情紧急，像“凭什么只有政府这一只手”这样根本性的问题，不妨稍后再论。

提建议的方式有很多种。揭露和批评政府的不当做法，甚至激烈地斥责官员的渎职，就都是在提建议，是以形成舆论压力的方式，提醒决策者：这么做不对，你赶紧改！从这个角度看，压制批评是很蠢的，等于坐失让自己聪明一点、减少失误的机会。

当然，官员们更容易接受的，是正面的建议。这不单是基于人之常情，更是因为现实困难：武汉肺炎、中美关系、经济转型、科技进步……今日中国碰到的，都是用老脑筋理解不了的问题，而智库和专家们贡献的，又太多像是政府文件的回声，听了等于没听。即如这一次飞来武汉查看疫情的第一个专家组，就明显没起什么好作用，反而帮着误事。³

好在这一次，许多非专家的普通人，也纷纷提建议了。譬如1月23日晚上，中央电视台白岩松主持的节目中，就播出了来自武汉一线医生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全国性的指挥机构和派遣军队救治病患：事后来看，这两条都是应该早一点实行的。

2月1日，更有湖北经济学院夏明教授领衔的多位人士，联名公布一位武汉医生给中央的建议，⁴ 要求尽快利用武汉市内各种现成的资源——

3 据多个在网上发布的有关武汉政府应对疫情的过程的综述：武汉市卫健委在2019年12月31日即发布内部通报，明言出现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要求医院等各方面重视；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派遣的第一个专家组抵达武汉；卫健委在2020年1月5日发布公开通告，在通报已经发现59个病例之后，强调“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已排除……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等呼吸道病原”：在专家组抵达武汉至少5天以后，武汉市卫健委还会发布此种强调某一方面状况、明显意在安稳人心的通告，就说明这个专家组至少是没有尽到专业责任。武汉市政府在整个1月上旬之所以如此颠预迟钝，显然与这个专家组对疫情的失判有相当的关系（当然，还有别的更大的原因）。

4 这位医生不愿署名，原因之一，是其建议中有这一段话：“偷偷告诉您（指夏明），我们医院收了很多疑似的关系户，这些人根本不需要住院，但是他们的关系不是我们医院得罪的（原文如此）起的。”

例如空置的酒店和囤积了大量食材却不能营业的餐馆，集中收治已经有明显的疑似症状、却尚未被医院接纳的市民。在微信公号“圆道智库”的留言板上，市民们更具体建议，将武汉的党校、军运村、会展中心等空置的场所，用来做隔离区。

有一条署名“张宏安”的留言感叹：“这本是政府应该做的事，反到（原文如此）让医生提出来还不积极去做，真是想不明白啊！”我当然深有同感，但考虑到现实状况，恐怕还应该降低要求：不问政府是否做了“应该做的事”，只要求它听了民众的可行的建议，能“积极去做”。

就这一点而言，到今天为止，政府堪称是“积极去做”的。1月25日，中共中央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同日，第一批军医启程前往武汉；⁵ 2月2日，武汉市政府要求各城区集中收治和隔离“四类人员”，⁶ 为此征用的场所中，正有党校和若干酒店；2月4日，也就是今天，那位利用特权直接从红十字会仓库抱走一箱口罩的官员，也被市政府免职……类似这样正面回应和迅速落实民众建议的情况，应该不止这几个。

当然，单是“积极去做”，是不够的，还得知道怎么做。举个例子，民众普遍抱怨买不到口罩，要求政府公平分配，杭州和上海政府也是“积极去做”了，但做法却欠考虑：杭州政府是要市民先在网上登记，然后去药店领取口罩；上海某地区的做法更官僚：居民得先去一个足球场领取登记表，再用这张表换取领罩凭证，最后“按通知”（通告原文）去指定的药店领取口罩！发几个口罩，要赶得居民如此奔波，岂不是把好事也做坏了吗？

还算好，网上的批评再次沸腾之后，杭州政府迅速调整，改“到指定药店领取”为“统一配送上门”。⁷ 上海也开通了网上登记的通道，虽然

5 我更希望相信，即便没有23日央视播放的武汉医生的多项建议，1月25日也会出台这两个重要的举措。

6 “四类人员”是指确诊患者、疑似患者、发热而无法排除武汉肺炎感染者和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

7 杭州市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挥部：《关于预约发放口罩的补充说明》（2月1日）。

还是需要上传户口本和身份证的照片，身边没有年轻人的老者，有可能登记不了。

在民众只能远远望着公共事务的情况下，我是看重这几天所显现的这一份民众的“建议权”的，不只是因为这权利不再专属于智库和专家，更因为政府至少愿意部分地听取和采纳来自民众的建议了：如果政府不听，民众其实是不在乎是否有建议权的。

当然，这一切都是因为疫情紧迫。民众的这个建议权还能持续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绝不能让“李文亮”们再次白死！

2020 年 2 月 7 日

昨晚，李文亮医生，武汉第一个被有关方面“训诫”的“造谣”者，去世了。

也是在昨晚，一位在微信公号上为李医生和其他 7 位造谣者“立传”的年轻人，被有关方面找去，要求他多说“正能量”的话，少说“负能量”的话。

耳熟得很。12 年前，汶川地震，有人揭露说，“天灾”之中有“人祸”，立刻引来了批评：现在不是追究人祸的时候，要多看积极的方面，团结一心，共赴时艰……

当时，我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这批评的，它虽然糊涂，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但此刻，我要说：这完全不对！

正因为以前的各种人祸没有得到及时的揭露，或者虽然被揭露了，灾难过后却不见有力的追究，下一次大灾再来的时候，无数百姓又遭同样的、规模和程度往往更大的殃！而这也就意味着，上一次的受难者是白死了。

人祸是跟病毒一样的东西，你不去遏制它，它就会日长夜大。从这个角度看，一味喊“加油”，才是真正的负能量。这一次新冠肺炎所以会酿成全国的危机，人祸该负的责任，就明显比12年前大得多了。

所以，身在武汉的作家方方说：要记住，不能让李文亮白死！

我能在这里写这些话，是因为还没有发烧，家里也没有病人。千千万万疫情的直接和间接的受难者，是没有心情和条件来说这些的。但正是他们，在承担灾难的后果。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是李文亮。

说得再粗暴一点，如果这一次，我们还是一味喊“加油”，那今天和以后，就可能有更多的人，包括你我在内，再次成为李文亮。

所以，我要重复方方的话：绝不能让“李文亮们”再次白死、白受难了！

如果面对这么一位先生

2020年2月8日

如果面对这么一位先生：在封城后逃离武汉，好像发烧了，却要进你住的城市，你会不会义正辞严地拦住他：“不能进！”或者嘴上不说，脸色却很嫌弃，下意识地避开几步，愤愤地想：“这么自私，不讲公德！……”

说实话，我要是碰到这种情况，多半会如此。

可是，我真有这么义正辞严的资格么？

我在前一篇日记里面说，在中国大陆，公共事务是政府包办的，民众往往只有处置私事的空间。如果这个说法大致不错，我要求那位武汉来的先生讲公德，就可能是过分了。

小时候听过一句揶揄人的话：“皇帝不急太监急”，意思是在哪个位置上，就操哪一份心，越俎代庖，便可笑了。当然也有这样的名诗：“位卑未敢忘忧国”，但这却是可以自励而不能强人的。何况这诗人屡为京官，在朝廷上话很多的，绝非无缘议政的草民。更何况皇帝和大臣们，自己常常并不着急。

不但社会一直在强化“皇帝”和“太监”的分工，这些年的主流文化，更持续地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私事：收入、房子、车子、养娃、健身、打游戏、男欢女爱、出国旅游……你们操心这些就可以了，别的，什么精神啊、理想啊、社会和未来啊：与你何干！

如果一个人，从小被框在这样的分工制度之下，又一直受着主流文化的教育，他大概很自然会这样：喜欢物理却报考外贸专业、为了房贷而忍受老板处长的轻蔑，路见不平，赶紧扯住同行者的胳膊：“别去管，危险……”，两杯酒下肚，对朋友推心置腹：“人性就是自私的嘛，攒钱最重要，身体要紧……”

他这么一路走下来，遇到疫情和封城这样的事，他的第一反应就自然是：“赶紧逃！”这并不是做了什么特别的选择，他不过是顺着生活在他身上养成的习惯，依照本分行动而已。

岂止他是如此呢，扪心自问，我那要求他“讲公德”的理直气壮，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类似这样的私心吧：可不能让他把病毒传进本地，威胁我和我家人的生活！一个外人，凭什么占用我们的公共资源！……

如果跟他对换位置，我能明明有机会逃离却不逃吗？就算我自己无所谓，也得为家人考虑吧？不用说，如果我像那位先生一样逃出武汉，多半

会在拦路人中间看见他，义正辞严地指着我：“你站住！”

逃离者和拦路人，其实是一样的，一直都走着类似的人生之路，也分享同样的习惯和本分。那并非只是一位武汉来的先生，他也是你我他，是上海人北京人深圳人，是分工制度和主流文化的人形体。

中国人这么多，当然不只有这样的逃离者和拦路人。武汉就有四千名自告奋勇的私家车主，常德乡下更有一位小伙子，捐出了一万八千个口罩——那原本是工厂发给他抵扣工钱的……但是，恕我粗暴地问一句，在靠近各种权势、为主流文化全面覆盖的地方，你能看到很多常德小伙子这样憨厚的人吗？恐怕相反，是会如此逃离和拦路的人，越来越多吧。

我前天说，不能让“李文亮”们再次白死，这不仅是指，要记住各种人祸，追究肇事者的罪责，也同样是指，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状态，看清楚现在的人生。

过去，我们和那位来自武汉的先生相伴而行，也那么选专业、那么坐办公室、那么自我中心、那么对他人无感……我们不觉得有问题，挺好啊，就这么过啊，但这一次，当他这么自私地逃跑，或者这么无情地拦路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了：不对，这样下去太危险了，我们不能继续跟他一样，必须走另外的路。

这就是希望所在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省，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拒绝当“太监”，那下一次瘟疫再来——一定会来的——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无须封城，更无须逃离。

同是一个“封”，意思大不同

2020 年 2 月 11 日

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一个月中国人对付疫情的方法，“封”应该是首选吧。

不过，同是一个“封”，意思大不同。

有一种是，为了保护城外村外小区外乃至家门外的更多的人，牺牲里面的较少的人。另一种是反过来，为了保护城里村里家里的人，不让外面的人进来。还有第三种，不分里面外面，就是隔绝两面的交通，不让往来。

第一种封是惨烈的，里面的人如果自发这么做，那他们是真英雄；如果是代表“外面”和“整体”的力量强制这么封，里面的那些可以逃离而不走、可以出门而禁足、接受命运安排的人，也可以说有公德，很难得。

第二种封是自保的，只要没有强力禁止，里面的大多数人，都会愿意这么做，倘若还号召这么做，那更会一拥而上。倒是那些不赞成把所有“从外面来的”一概拒之门外的人，比较难得。

在一个社会中，一个体制下，第一种封的自发性越强，这个社会 and 体制就越优异；如果反过来，第一种封的自发性很弱，反是第二种封的自发性巨强，一夜之间，遍地开花，这个社会 and 体制，是没有什么优异可言的：逃生自保，老鼠都会。

今天看到一个极端的例子（帖子署名“王有理”）：某县的四位志愿者，驱车十几个小时，去武汉参加火神山医院的建设，完工之后，拿着武汉出具的健康通行证明，却被挡在家门口不远的高速公路上，四个人在车里蜷缩一夜，几经周折，才得到一个在宾馆隔离的机会——当地政府本来是要送他们去一个住着疑似病人的隔离点的！给他带路的保安，一见他走近了，就大声呵斥：“走慢点，不要离我那么近！”他老家的村民中，也有人听

说他去支援武汉了，就说：“别让他回来”。

中国人多，什么样的都有，即便遭遇一堆这样的官员、保安和邻居，也不必对社会太过悲观。但是，这个例子足以让我们明白，因为那一夜之间的遍地封村断路，就欢欣鼓舞，“举国体制”，是太过糊涂了。

至于第三种封，下次再说。

不要做看上去很像谣言的事

2020 年 2 月 12 日

为什么政治谣言满天飞？不是因为编造的人多，而是因为听信的人多。

政府有办法减少这听信吗？有。

第一个办法，大家都知道的：不隐瞒真相，不撒谎，及时公布所掌握的实情。

还有第二个办法：不做看上去很像谣言的事。这一点多说几句。

先举两个例子：

三天前，网上出来一份署名“段战江”的《痛中思痛的十个战“疫”思考和建议书》，很长，一万四千多字。

前半部分是对疫情的四条看法：持续的时间至少还有 4 个月；造成的伤害会很大；这次不只是地方政府失职，国家公共卫生应急处理的“顶层设计”也太落后；未来还会有疫情风险，要高度重视。

后半部分是六条“政策建议”：“宣布国家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人性尺度关爱医护人员”、“重新引导国家精神风气”、“全力改进领导工作作风”、“加速升级社会治理体系”和“全面改造宣传引导机制”。

每一条都是先举例子，再列措施，完全站在政府立场，标题都是用的领导讲话和中央文件的语词，如此献计献策，苦口婆心，到哪里去找？

但它却被网络审查部门屏蔽了！第二天其他人再把它贴出来，又被删了！

第二个例子，是早一天的：

有署名“吴秀才”的帖子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宣布解聘教师周佩仪，因为她前一晚（2月6日）“在微信朋友圈中发表不当言论”，这言论主要就是五六行字，大意是：心理疏导课程不能化解民众的不满，她讨厌“正能量”的言论，不愿意再跟“爱国小粉红”同在一个朋友圈（这个帖子已经被删，凭记忆概括）。

在今天的网络世界里，这些话实在没什么特别，比这个更激烈、更“负能量”的话，多了去了。堂堂大学，就为在微信朋友圈——不是课堂——里发几句情绪性的牢骚，解聘一位教师？

这两件事，是不是很像编出来恶心政府的？我最初就不相信：哪有人会干这种自曝眼瞎、自泼污水的事？

没想到，还都是真事。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听信政治谣言了。如果经常看到类似上面这样的怪事，以及如某中央大员家里钞票堆积如小山、点钞机都吃不消之类的奇闻，谣言再惊耸，你也会觉得“有可能”吧。

强烈建议有关方面：不要做看上去很像谣言的事！

为什么憋气的时间这么短？

2020 年 2 月 18 日

区分了前两种“封”，一是不让里面的人出去，二是不让外面的人进来，就可以讲第三种“封”——阻断交通，不让聚集——了。

它常常是和第二种“封”混着一起蔓延的：最初的挖路阻道，大多就是为了挡住外人，警察封闭高速公路，也可以说就是保安封闭小区入口的放大版。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这第三种“封”和第二种差不多，推动它的，和它所强化的，都主要是对病毒的恐惧。

我们本来已经有很多消极的生活经验：你为了什么事求政府，官员多半是打官腔；有热心公益的团体，这些年却被整得七零八落，只可遇而不可求；隔壁虽然有邻居，你却不知道她姓什么……这些经验很容易强化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如果我被感染了，没人会来救我的！”于是，我们更恐惧了。

这是官民共有的恐惧。正因为平常高高在上，好像乾坤尽握，一旦因为什么原因——譬如这一次的病毒——落入与平民相似的境遇，官员往往比平民更害怕。他们那么急急忙忙去捐赠品仓库抢口罩，而且都是抢那种 N95 的，不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害怕么！

正因为这个恐惧是官民共有，30 天前的“一声令下”才那么有效，一夜之间，第三种“封”遍地开花。

可是，现在来了新的“一声令下”，说不能断路，要有序复工，却好像没什么用。第三种“封”所竖立的那些物质的和政策的墙，大多还梗在原处，拆得非常之慢。

为什么？

还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因为心情改变了。

随着新患者日渐减少，湖北以外的不少地方，对病毒的恐惧开始减弱了；但同时，新的恐惧，或者换个淡一点的词：担心，却开始滋长。更重要的是，新的恐惧或担心是分化的，不但官民之间，就是官和民的内部，恐惧或担心的内容也不一样。

就拿对经济的担心来说，三千万货车司机最盼望的，是大小道路统统解封，许多城市政府却可能觉得，资金运作更为紧迫：官民之间看经济的焦点，完全可能大不同。

中央政府最在意的，不一定地方政府也最在意，政府的——我就不说社会的了——整体的经济利益，也跟不同官位上的个人的利益得失，明显不是一回事。⁸ 在很多用 GDP 考核不到他的官员的心目中，“我这个地方不能出事”，是远比复工复产重要得多的。

更不用说“民”的内部了：老板和员工，大公司和小个体，有铁饭碗的和没有这个碗的，乃至这个行业的和那个行业的，对经济的关注点和忧虑心都不一样。同为草民，“事业单位”的白领盘算着灾后怎么报复性消费，困在村里的工人却更多是发愁下个月的饭钱。为什么快递小哥成为全国最快返回工作地的群体？就因为他们对肺炎病毒的恐惧，最先被受穷挨饿的担忧压倒。

当然，新的恐惧或担心，绝非只是关乎经济。那些到处发生的犯法式的野蛮“执法”，就引起了大家对于基本人权被侵犯的深切的担忧。

8 “官”的内部的这些内部差别，在各类政府行为中的程度是不同的：在防控新冠肺炎这件事情（类似的还有防治空气污染）上，这些差别，在防控没有完全失控的前提下，就因为对于病毒的官民共有的恐惧而不同程度地减弱了；而一旦事关经济，这些差别就会在实际上表现得非常顽固和明显，哪怕在所谓“计划经济”的时代（1950年代中期到1980年代中期），也是如此。

南方某地，十几个年龄不等的男人，因为在家中打牌而被抓来，站成两排，在警察的领读下，齐声诵读：“我们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不起……”场面很滑稽，也不见流血和手铐，但看着这样的视屏，我却深感恐惧。不过是一场类似流感的传染病，就这么理直气壮地把人不当人，真要来了别的更大的灾难，弱势者还不知道要被践踏到怎样……

倘说第三种“封”遍地开花，是凸显了某种非常时期才会形成的群体意志，它虽然小器，却能让习惯于从众的人暂时心安，现在这“封”的迟迟难解，却说明这个意志正在解散，早已存在的各种内外矛盾，带着它们因为疫情而暴露、而增大、而变异的新能量，一齐回到了我们眼前。许多困居家中时似乎感觉很真切的“共同感”，我们一迈出家门，就迅速破灭了。

在这些矛盾的重压下，无论怎么骗自己，我们也知道，社会啊，个人啊，都回不到“之前”了。

矛盾很多，只讲一个现在可以讲的：面对这次这样的疫情，“封”的做法到底对不对？这么问不只是因为，有可能这类病毒根本就是隔离不了的，更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很难承受稍多几天的减速，就像人没在水里，最多憋气一分钟，再久了就要晕过去。之所以现在搞成这样：疫情还没有被完全封住，就要解封以恢复生产，就是因为经济憋不住气了。

为什么憋气的时间这么短？除了全球化之类的原因，社会自身的结构性失衡，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如果不是有那么多劳动者停工两个月就要饿肚子，如果各种强制性的收费——从过路费、增值税到土地出让金——不是那么吓人，⁹如果能比较均衡地藏富于民、不是只有官家才腰包鼓鼓，如果除了“收入”、别的一概不在意的人不像现在这么多……我们的经济是不是就可以憋一口长气，能承受较长时间的减速？

⁹ 国务院之所以继续免除过路费，税务部门之所以延长若干税费的缴纳期，就因为各种强制性收费已经构成了经济和民生的重大包袱。

2020 年以全民恐惧开头，自然很糟糕。但如果官民上下深切反省，从根本上检讨，那或许就能将坏事变成好事，开辟社会和国家的新方向。当然，硬不反省，就是健忘，也是完全可能的。春节刚过，就不说晦气话了。



疫时记：“非人”租户的“口罩权”

明乐

最近关于疫情的消息里，各级政府似乎都在比拼严防死守的所谓“硬核”能力。你的城市小区封闭，我的城市不仅封闭，还要发放通行证件，甚至有的城市发放的通行证件，还要分出五种颜色，颇为眼花缭乱。不过无论如何严格管理，人们总还是要出行。

制造业大国的产能跟不上病毒传播的速度，但日常生活仍在继续，假期已经逐渐结束，各行各业的人都需要出门，乘坐交通工具，在公共空间面对陌生人群。面对疾病，人们需要口罩来保护自己和他人的健康，然而现实却是口罩的供应一时难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能够有效应对此次病毒防护的各类口罩几乎均为售罄状态。

民众在市场上艰难地求购口罩，政府也开始行动。陆陆续续地，全国各地的口罩供应开始有了相关政策。1月31日下午，上海市政府在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中公布，上海市民的口罩供应方式，由原来的居民排队去定点药店购买，变成了“居村委会预约登记+指定药店购买”。以我所在的小区为例，2月2日下午，我在小区的公告栏里看到了张贴的通知。通知里写明，“从2020年2月2日8:30起，凡是需要购买口罩的，请凭XX社区管辖范围内房屋的房产证和身份证到居委会指定地点登记预约……第一轮预约每次一人持一本房产证可预约5只口罩，一本房产证仅限预约一次。”这份布告通篇没有提到租户，也就是说，上海市政府给市民提供的服务里，并不包括租户。在此，市民等同于有房产证的人。租户由于没有房产证，便没有资格通过政府保障服务这一途径来获得防疫物资，只能自己另想办法。

2月4日下午，小区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把张贴的消息又播报了三遍，这一次倒是提到了租户。广播内容中称，租户若想获得口罩，需要提供四份资质证明，分别是身份证，房屋合同，居住证，以及“房东承诺书”。至于什么是房东承诺书，广播里并没有任何说明。当我在网络上搜寻这一规定时，发现其他城市和地区也有类似规定。在宁波市海曙区的布告里写明：“落实出租房管理主体责任，出租房内发生疫情，一律依法追究房东责任。”在北京市，有人拍摄了小视频，返回大城市的年轻人被挡在小区门外，等待他们的房东来接他们进入小区。据工作人员所言，在他们被隔离期间，房东需要负责租户在隔离期间的需求，主要是帮助运送物资——如果房东不愿意，或许居委工作人员也可以代劳。同时，房东需要签署一份“房东承诺书”，在视频拍摄者想要拍摄这份承诺书时，工作人员隐晦地拒绝了，“你放下手机，我来给你说”。在此过程中，有的年轻人顺利等来了自己的房东，得以回到所租房屋，而有的年轻人则没那么幸运，直接被房东拉黑了。这些租户们尽管一个个都早已成年，此刻却如同幼儿一般，聚在小区门口，等待着能够“负责”的房东将自己“遣送”回房屋。¹

通过这些政策和规定，不难看出，在政策制定者的眼中，租户们不是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主体，他们需要另外一个人来为自己的行为背书，即拥有房屋产权证的房东。在平时，租户们是租房合同中的甲方，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应合法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公民，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他们则不再是独立个体，而是成为了房东的附属品，是人，却又“非人”。

与此同时，关于口罩的购买规定还在快速变化当中。2月5日，我拨通了居委会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已经不需要去居委会预约

1 https://www.iesdouyin.com/share/video/6789033330424761613/?region=CN&mid=6788894710482062087&u_code=11708g37a&titleType=title&utm_source=copy_link&utm_campaign=client_share&utm_medium=android&app=aweme.

此视频为央视新闻的采访，原发布地址已经删除，但仍有部分视频网站可以观看。——作者注。

了，可以通过某区域 APP 线上预约。线上预约不再需要提供“房东承诺书”，而是需要填写户口本或房产证的编号方可预约购买。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对我解释道，“这个是你和房东之间的事情，你们自己协商解决。”“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确认对应的房屋居住者。”于是，目前上海的现实情况，便是通过户口及房产资格来确认口罩购买资格。没有房产和户口的租户，只能自己去和房东协调，口罩购买的资格需要房东“让”出来。上海市两千四百多万的常住人口中，² 有一千四百万左右的户籍人口，这些居民可以通过户籍编号获得购买资格，此外还有约一千万的非户籍人口，即便这些人中有部分人群已经拥有房屋产权，但余下的非上海户籍且没有住房的人，依旧数量巨大，然而他们的需求在疫情期间却始终是排在第二位的。

无论是“房东承诺书”，还是以户口或房产证为口罩购买资格的判断标准，显然都是在现实层面将租户排除在防疫工作的范围之外。这一做法着实令人费解。真正有患病及传播风险的，始终是住在某一社区里的人。如果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那么应该做的是调查清楚社区内部的人员动向和身体状况，同时以合适的途径让在地居民能够购得政府保障的防疫物资。换言之，防疫工作具体展开的对象理应是实际居住者。在疫情传播面前，区分房屋所有者和租户，并放大租户购得防疫物资的困难，这样的政策及其执行的后果，首先便是加剧了疫情的风险。由于大大提高了租户获取防疫物资的门槛，那么也就难以保证这部分人最终能够购得口罩，实际上加大了人群患病及传播的风险。其次，这种做法也凭空增加了房东和租户之间的矛盾。本应是政府负责的防疫工作责任，被部分地强行转移到房东身上，就宁波和北京的情况而言，房东如果不想承担这样的责任与风险，最快捷的方式就是驱赶租户，或对此置之不理。就上海的情况而言，房东如果自己也急需口罩，便很有可能拒绝提供相关编号，实际上政府确实也没规定他们有“让”出口罩的义务。于是，原本政府应该提供给每个居住在

2 数据来源于《2018 年上海统计年鉴》。

上海的市民的服务和保障，变成了房东和租户的利益博弈。如此一来，政府便把本应确定提供的公共服务保障转移到了不确定的私人关系当中，这种政策显然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在疫情当中，租户被当作“非人”对待，连自己的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都需要房东负责，遑论购买口罩的资格和权力，这的确足够“魔幻”。不过这也仅仅是诸多“魔幻”事件中的一例罢了，既算不上最悲惨，也算不得最紧迫，甚至都算不上最新鲜。自疫情发生以来，朝令夕改的事情几乎每天都有。疫情，春运，春节，返程高峰，混杂在一起，人来人往间，无数好的、坏的、令人感动的，以及令人出离愤怒的消息不停地轰炸着每一个人。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所有中国人都借由周围真实的遭遇非常直观地目睹了当下中国的政治生态。全国各大城市和地区均紧急出台了各类应对措施，这些措施让人们看到了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政府对各类综合资源的调度、管控与分配，以及信息发布的公开透明程度。不同城市间财政资源和执政能力的差别，也不断引发舆论探讨。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春节假期这一特殊的时间段，让更多的人有时间和精力在各类传播途径中即时跟踪热点并给出大量反馈。这些反馈无疑是珍贵的，其中有对疫情严重地区的物资捐助转发，也有各地志愿者针对医护群体和困难人群的自发组织，更有无数人在不停地提问和追责——眼前的种种所见所闻，令人意识到庞大的国家机器不过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构成，它也会运转失灵，又或者说，这种失灵直到今天，才真正地为人们所看见。



疫时记：小区进出的简单与复杂

明乐

随着疫情的发展，城市里的小区几乎都被封闭起来，居民进出小区的自由被各种规定一步步地限制。

然而规定面前并非人人平等，以进出小区这件简单的事情来说，在表面的规定之下，就有不少复杂的“潜规则”将小区居民一一划分。

首先是按照危险程度。据报道，南阳市某定点医院的护士深夜回家，却无法进入小区大门，业主们担心她回来会增加小区其他居民的患病风险。类似地，火神山的建筑工人回到家乡后，迎接他的全然不是掌声，而是嫌弃和恐惧。确诊病人，疑似病人，密切接触后的隔离者，重点疫区的人，工作在疫情一线的人，他们依照和病毒接触的密切程度被人们默默在心理上“隔离”着。与此同时，某些小区将正在隔离中的家庭直接用封条贴住，用链条锁上。隔离等于坐牢，甚或威胁到生命安全，但在“防疫大于天”的“共识”下，这些被锁住的家庭屡屡投诉无门。进不来的，出不去的，这些既是新闻里的报道，网络上的图片，闲聊中的“别人”，同时也可能就是你我自己的邻居，乃至你我自己。

其次是按照有无房产权。这次疫情让中国人深刻地明白了，买房绝不是虚假需求，房产不仅决定了你生活的位置，更决定了你生活的品质。社会保障未必能提供给每一个中国人，但肯定会优先提供给每一个拥有房产证的人。没有房产证，你不但买不到城市供应给市民的口罩，更可能进不了缴纳过房租的家门。各地针对租户的规定五花八门，有直接劝返的，有需要提供各种证件且签署房东承诺书的，有压根不让进小区大门的，也有房东和租户都要缴纳50万保证金才能回家的。依照这些规定推测，此次

病毒很可能自带靶向，专攻无房人士——这很荒诞吗？比不上这些规定荒诞。

这些“潜规则”或以防疫之名，行自保之实；或以管理为名，行歧视之实。看似是对人对己负责，其实不过是不假思索地以本能行事——或是为了一己私利不惜伤害他人，或是为了管理方便而制定各种粗暴政策。这样的事情虽然可怕，然而更可怕的，是根本没有有效的机制去制约这类行为。于是被挡在外面的人，竟只能依靠舆论来为自己挣得一点权利，若有幸被眷顾便可幸免于难，走入小区大门，然而进了门后，自有另一层的规定在等着他。

进了门里，自然要遵守小区规定，这些规定经常朝令夕改，且多于防疫无益，仅令居住者麻烦。以快递不得进小区的规定来说，长时期磨合而来的物流机制和配送规则被一刀切地禁止，新的替代方案简单、粗暴、无效。原本可以不出门的，现在必须出门，出门必须戴口罩，为数不多的口罩，卒；原本快递暂存在快递柜，现在必须马上下楼取，万一快递丢失，没人负责，人与人密切接触的机会成倍增加，隔离成果，卒。

有人说，现在快递员、外卖员中已有确诊病例，他们接触的人多，风险大。可是早在疫情初期，几乎所有物流配送的服务人员，就已经口罩、消毒装备齐全，且各平台早早便推出了无接触送达服务，物品放在门口或快递柜即可，根本无需接触。

快递小哥乐得轻松，同时轻松的，还有管理者。自上而下地随意发布命令，看到效果不好或有人反对，时而改之——比如昨天出门还要用笔登记，今天则不用了，改用印刷好的出入门票；时而强硬——不仅快递外卖都不能进小区，就连小区居民的日常出入时间也必须严格限制，晚上十一点后非紧要事情不能出入；时而多变——快递不能进，但是邮政公司的快递可以进。当我追问门卫大爷，其他快递公司能不能也把东西放在快递柜里时，大爷犹豫一下说，量过体温后也可以。可见不但管

理的规则是不确定的，连规则的衡量标准也是模糊的，这种情况下，执行命令的人和被命令执行的人，都一样地困惑。至于监督和反馈，约等于没有。

自上而下的政策一旦制定，立刻便要“落实到人”。说起来，事事都仿佛有人负责，然而一则“负责”往往被简化为表格里的政务，当人被简化成数据，做事的人当然容易简单粗暴；二则这种“负责”的体制里，追责只能追到做事的人，追不到下决定的人，多做多错，时间长了，真正认真做事的“背锅侠”自然少了；最后，这样的“负责”从来都是自上而下，若是有人想自己为现在的状况负一点责任，做出点行动，结果往往是缺乏途径，只能为远方的人们献爱心，喊口号，至于近处的邻居和居家的自己，则只能服从管理，甚或走到邪门歪路上，为求自保而盲目排斥他人。

最担心小区风险的人，无疑是小区居民。也恰恰是小区居民，在这一类的进出规则制定上，没有发言机会和话语权。哪怕有个小小的临时会议，居委，物业，居民代表协商一次，也不至于把规则搞得既如此死板，又如此多变。不过这话说来简单，实际操作却也困难，最大的困难不是开会，而是缺乏公共协商的经验积累。

居委会作为政府基层组织，名义上是自治组织，实际上则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能够处理明白各方领导布置的任务已经不易，而这些任务里，断然不会有“锻炼一下小区居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平时习惯被管理的居民，没有参与小区管理的经验，业主委员会倒的确有，但只能代表业主利益，无法兼顾租户；至于租户，连业主委员会是怎么选举的都一无所知，只在门上贴着的通知里见过印章而已。更进一步说，业主尚可能有个委员会，租户却只有一纸合同，疫情来临之际，这张合同便形同虚设，分分钟被踢出门外。

各种复杂又麻烦的民主议程平时没有积累，到了紧要关头，便只能简单制定，简单服从，复杂出行，复杂抗疫。制定规则的程序简单了，进出的事反而更复杂了；政府办事效率看似提高了，表格里的数据也更加丰富了，实际受委屈的人却更多了。



我们之间的种族主义

——武汉人与新型冠状病毒¹

周銳澁*

陈品存**译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扩散，世界对中国及中国人的厌恶和歧视也正日益增加。人们怪罪中国人爱乱吃蝙蝠或穿山甲等野味，才导致新型传染病传到人类身上，同时将中国描绘成以极权主义压迫人民的邪恶帝国。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问题被揉杂在一起，人们将中国人视为“未开化的人种”“传染病的媒介”，对于中国社会“专制”与“落后”的批判声浪开始排山倒海而来。

武汉人该如何熬过这波疫情呢？因为好奇武汉友人的情况，我打开已经一段时间没有使用的微信，重新和中国朋友取得联系。有着千万人口的武汉，是位于长江中游的历史古都，也是辛亥革命的起点——武昌起义的爆发地。所幸我的武汉朋友和他们的家人目前仍平安健康地生活着，并且能向我传达武汉的各种消息。据朋友说，在武汉拉起封锁线之后，当地有四千名司机集结起来，为医生们送来三餐，或为那些无法自主进食的人们展开志愿服务，也有人喂食已经离开这座城市的人们所留下的宠物，劳动者在十天内建起了一座可以容纳上千人的医院。还有，即便是在韩国的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各地的医护团队都在第一时间前往武汉，全力治疗病患，即使知道自己将成为被感染的高危险群，他们依然为了救人站在最前线。

* 周銳澁，주윤정，首尔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现任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 陈品存，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硕士生。

1 本文韩文版原载于《创作与批评》，繁体版载于新国际 NEW INTERNATIONALISM，感谢作者周銳澁、《创作与批评》与新国际授权转载。

另一个朋友谈到了李文亮医生之死。李文亮医生是最早对该疾病提出警告的医生之一。这位在南方生活的朋友说，李文亮并不是想出头当英雄，他只是想告诉同事，事情有点不对劲，他与同事之间的讯息交流不过是平凡无奇的日常行为，最后却让他不得不成为了英雄，他的死实在令人遗憾。来自香港的朋友则分析，李文亮事件和中国政府在疫情爆发初期的对策失败，肇因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由于地方政府习惯于以先得到中央政府肯认的方式面对公共事务，此次疫情的通报过程才会出现情报不流通、决策延宕的问题。从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首次在社群媒体上发布消息，到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间就这样无情地过去了，而且武汉的高铁是连接中国全境的枢纽，这使得事态更加严重。朋友不忘叮嘱我，中国人不是有意要传播病毒，请不要为此埋怨他们。

这种把中国、中国人视为传染病发源地的种族歧视来由已久，种族主义的历史源远流长。从最具代表性的“黄祸论”来看，帝国主义列强们正是透过把中国人标示为霍乱的传播者和未开化的人种，来正当化他们对东方的侵略。牛津大学中国学教授 Rana Mitter 说，中国为了对抗东方主义和种族歧视，从新中国建设之初就特别强调公共卫生问题。他也表示，目前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透过信息透明，能在国际的公民社会中获得多少信任？

西方舆论对威权主义式的疫情控制颇有微词，一面强调民主体制的优越性，另一方面批评强力封锁造成人权侵害。另外，对于中国式的强力封锁是否有效，或者是否需要逐步实施隔离和控制，公卫学者们则还在争论当中。中国的强制封锁甚至做到连跨国分工的生产线都停止的程度，中国式的疫情控制是否发挥效果，或者造成了什么样的问题，必须留待日后检验。但在冷战结束之后，世人不再相信社会主义体系，随着病毒的扩散，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不信任、以及对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便再次爆炸性地结合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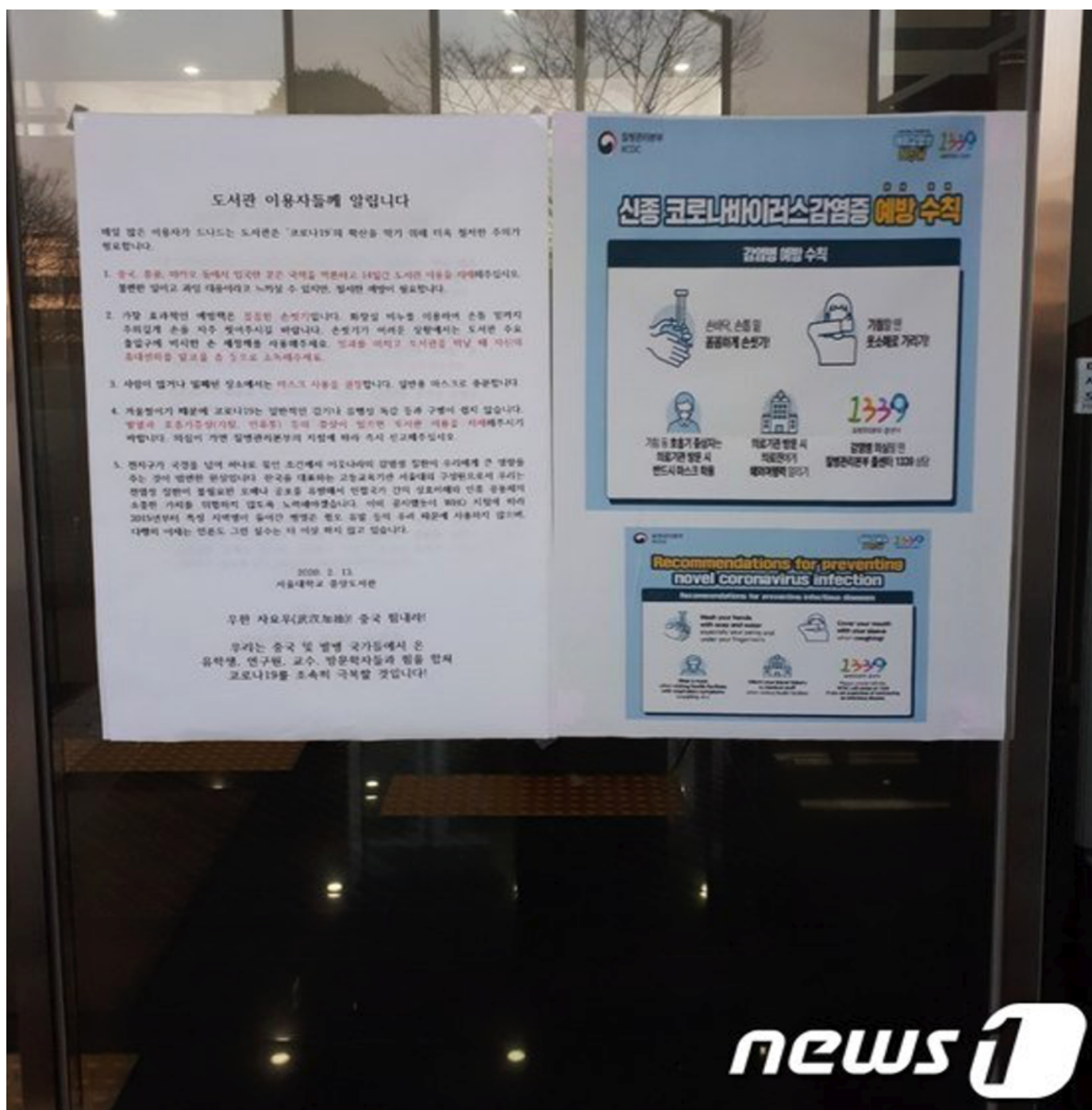
我们不知道中国接下来如何应对当前的危机，是像媒体所预测的那样，

中国体制内部将会走向崩溃？又或者它能适应危机，树立新的政策及决策管理模式？这都还有待我们观察下去。而病毒的扩散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也不得而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李文亮的判决书中写道：“与过去 SARS 时期相比，媒体环境已经变得不同。”因为社群媒体的出现，由官方媒体垄断信息传播渠道的体制已经结束了，虽说如今已经很难在信息的大海中隐瞒任何真相，但言论审查却依然存在。

开学将至，中国留学生也将回南韩就学迎接新学期。韩国是中国在贸易、交通、教育、旅游等各方面的人员交流上最为密切的国家之一。随着两国的连结程度越高，必须共享危机的时刻来到，那些在中韩之间长久堆积的敌对和嫌恶之情将会增长得更快。当危机发生时，社会中以鲜明的界线划分你我的机制即将启动，唤起敌对意识，割裂的力量将会起到强大的作用。与全球化时代的超连结强度成正比，斩断连结的反作用力也必然增强。厌恶、歧视和排斥变得理所当然，种族主义的歧视将使得界线变得可视化和正当化。

但是，我们有可能完全断绝连结的关系吗？还有，如果我们是重视人权的国家，在面临危机时，也不应该毫无思考地埋首在恐惧之中，而是应该想起邻居遭逢的苦难，进一步思考建立连结的可能性。截至 2 月 11 日，新型冠状病毒死亡病例在中国已破千例。首先，我要对受灾最严重的湖北省地区，以及承受着苦难和死亡折磨的人们致上深切的哀悼。与此同时，我也呼吁——我们不该只考虑自己的安全和安宁，不该嘲弄、厌恶和排斥身处痛苦中的他人，应该以维护作为共同体的生命为目标，科学地提出解决对策。并进而思考我们如何建立世界公民的连带。让我们一边疾呼武汉加油！一边思考如何迎接新学期即将回来南韩的中国留学生吧！

现场_疫情中的中国



(首尔大学忧心，大众对疾病的忧虑以及对中国人的反感增加，特别在张贴于图书馆门口的疾病预防须知中指出，“作为韩国具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机构成员之一，不该让传染性疾病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及恐惧，进而影响邻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人类共同体的宝贵价值”。预防须知中也写道，“不论国籍，只要是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入境的人，请勿在 14 天内使用图书馆”，隔离的对象是曾经造访疫情严重地区的全体人员。在疫情扩散初期，馆方也曾公告呼吁不要使用“武汉肺炎”指称疾病，并说明包含特定地区名称的病名可能引发对该地区民众的厌恶感，现在随着 WHO 将病毒正名为“COVID19”而重新制作了预防指南。来源：首尔大学，引自 NEWS1.KR。)



疫时求医记

朱天成

临近年关前的半个月，我和父亲送祖父去上海几家医院多次就诊，终定于年后手术。家里原计划新年去海南度假，机票已经早早地定好了，现在因为需要尽快安排祖父年后的手术，计划自然也就取消了。我对旅游度假并不是特别有热情，想来计划取消恐怕还能免了不少舟车劳顿吧。大概是一月二十几号开始，我的手机上的各类 APP 平台就轮番开始向我轰炸湖北各类疫情的消息，对于我们这种书斋学者来说，这类时事新闻向来是不怎么关注的，直到疫情的消息已经汇成滔天洪水。后来有一朋友打来电话，据她在武汉的女婿说，武汉的医院已经没有能力收治病人了，被征用的酒店里住满了隔离的人……从这位朋友的口吻中，我们感受到了从电视上无法获得的紧张气氛，对此，我们也由衷地表达了对武汉同胞的同情，然而，所谓对他人痛苦的深表同情，也仅仅是无能为力的另一种表达罢了，作为大国小民的我们，被时刻裹挟着的，始终是当下自家的“小烦恼”。

再后来，各地开始控制外来人口的出入，高速公路也封了，父亲才开始紧张起来，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再去外地就诊。不得已，我们只能试着托关系把祖父送去县里的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经某位在医院工作的亲戚从中疏通，父亲在与一位主治医生交代了相关情况后，有幸这位医生愿意为我们尽快安排手术。然而，当准备办理入院手续时，竟被某护士阻拦，她与主治医生当场通电话，说现在政策有变，已经停止一切手术了，并让父亲把挂的号退了。我父亲对此很不理解，差点与护士起了口角，明明医生都已经同意了，怎么又会出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医院小题大作了！据院方解释，由于疫情的原因，医院正缺人手，手术的医疗器械也严重不足，另外，在当下的非常时期，医院已经成为高危区域，如果病人在手术后感

染新冠肺炎的话，死亡率将远远大于常人，因而医院所有原计划的手术都已经叫停。父亲不死心，表示能否先帮祖父办理预住院，等情况许可后再恳请院方尽快安排手术。现在回想起来，比起医护人员，当时我们这些从电视媒体获知信息的普通人对事态严峻性的认知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因为正像护士回复我们的那样，离恢复正常的时候还“遥遥无期”呢。无奈，只能重新陷入焦灼的等待。

祖父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十多年了，一开始是经常走丢，然后全家出动去找他；总是说要回家，即使他本来就在家里，洗澡、吃法、穿衣服都需要人服侍，又都不配合；近一年来，功能退化到已不能走路，大小便失禁，每两到三个小时需要更换成人纸尿裤；长时间卧床，为了避免褥疮，需要适时侧卧，但是由于祖父不配合，只能想办法在他身后垫枕头。这些年来，祖父一直都是由祖母照顾，其中的艰辛不可想象。有时候，她会向我诉苦，她告诉我，在最苦恼时，她曾产生过自杀的念头。面对这些，我的反应常常是一种思想的暂停——一种生活的真相超越了生命承受能力的虚无感。

对于祖父这样的失智老人来说，看病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对于家属来说，更是如此。医院所出具的每一项检查，对于我们父子来说，都是需要闯的一道道关卡。简单的，如抽血，需要我们一边按住他的手臂以免甩掉针头，一边轻轻拍打他的手背使手臂放松，如果能同时对他大声说几句话以分散他的注意力的话则更好。更难的，比如手术前麻药的用量需要根据病人的体重核算，称重也许对于常人来说是极容易的，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需要父亲背着祖父上称，通过量得的总重量减去量得的父亲的重量换算出祖父的重量。

半年前，祖父的左眼帘开始有些浮肿，一开始以为是发炎，于是每天给他点些眼药水。后来，浮肿越来越大，只能去医院就医了。我们县里主要有两家医院，一所是县人民医院，另一所是私立医院。由于县人民医院常常人满为患，一方面图便捷，另一方面因为祖父是特殊病人，就首选送

祖父去私立医院就诊。私立医院的医生要求给祖父做眼部CT，这可愁坏了我们，为了能够让他在CT检查时保持一到两分钟的安静，我们只能让医院开适量的安眠药服用，前两次由于药的用量太小而未能奏效，第三次总算成功了。然而，当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道道的关卡后，医生建议我们转院。于是，我们只能去县人民医院挂号，会诊时，由于祖父不配和，医生仅仅用棉签将眼皮分开看了一眼后，就面露难色，推诿自身能力有限，让我们预约下周科室主任的号，我们只能如法照办。当这位主任医生会诊时，在经历了大概同样的套路后，他告诉我们祖父的眼睛长得应该是恶性肿瘤，他们医院没办法收治，让我们想办法去其他医院吧。按理说，即使祖父得了绝症，医院至少也应该做出相关的检查来确诊，这样我们子女才好理性的考虑是选择手术还是保守治疗。无奈，我们只能去上海碰碰运气。当祖父去上海就医时，眼球不仅鼓起，而且常常流出淡黄色的液体，并带有少许血液，上海某医院判定为眼球破裂，立刻帮我们转成急诊安排了当日的眼球摘除手术。后来，医院经对切除的眼球中的病理组织化验后证实确为恶性肿瘤，但更为紧急的是，肿瘤顶破眼球结膜而造成的感染才是当时最致命的因素。另外，据上海医生说，眼球摘除这类破坏性的手术并不具有风险以及太高的难度。现在回想起来，这仍然令人气愤，毕竟，在去上海就诊的大半个月时间，我们就那样在县里各家医院与各位医生之间被互相推诿。现实的情况逼着我不得不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当像祖父这样的失智老人不再被看成一个具有完整人格的主体的时候，我们的社会系统是否会比疾病更早地宣判他们的死刑？

祖父的身体就像一艘风雨飘摇的破船，不知道将沉没在何处。大概也就是在他的眼睛开始发病的同时，他的外生殖器，也许是由于长时间地沉浸在纸尿裤的尿液中，开始红肿溃烂。开始还不是很严重时，当地医生说没事，涂点药水就行了，现在看来必是敷衍我们的话。这次，父亲径直带祖父去上海求医，只是没想到的是，年后的手术竟因这据说是百年难遇的

瘟疫而耽搁，对此，我父亲又深为自责，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一个月带祖父就医，去外地就医是不是又成了一个错误？

新年就这样焦灼地等待着。

阳历2月8号，正是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也是官方一开始预测的疫情拐点，更是院方曾告知我们的医院可能恢复正常的日子。然而，拐点并没有到来。晚上，医院工作的亲戚打来电话，称今天县人民医院确诊了全县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明天也许就会公布，希望我们不要声张。希望再次落空了。次日，养老院的护工打来电话，说祖父腹泻并带有血迹，吓坏了的祖母已在一旁泣不成声。父亲接电话时，我就在旁边听着，等父亲挂完电话，我也开始换衣服准备出门了，只是这时父亲又打了一个电话，听声音是打给大伯的。后来，我被留在了家里。母亲面有愠色。

上一代人的思维是我们无法理解的，祖母不管自己如何痛苦，也舍不得子女花钱住到养老院去。但是自从祖父做完那次眼球摘除手术后，我们便不管祖母如何阻挠，坚持安排他们搬到有人照顾的养老院生活。新年以来，由于受疫情影响，养老院已经禁止外人探望，年前有些选择回家过年的老人暂时也不被允许返回。父亲新年送去的饭食也只能通过门卫转送进去。由于不再忍心祖母受苦，也不希望祖母因此而无法重返养老院，祖母也一样被留在了养老院。祖父在医院挂了几天水，初步诊断为阿司匹林长期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并无大碍。搁平常，一般只要办住院，不让病人住个一周以上医院是不会放人的，这次情况特殊，匆匆的就赶我们走了。由于回不了养老院，只能接祖父回村里老宅暂住，此时农村已封路，只留了一条大路并设了岗哨，知我们是本村人后便匆匆放行了。

祖父就这样在老宅安置下了，白天父亲与大伯就呆在老家照顾祖父，在医院时请的一位日夜照顾祖父的护工，此时也被接到老宅住下了。这段时间，父亲还不时地向医院询问相关情况，有次，某个医生的回答是这样

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想着来医院？我们医院第二批支援武汉的人才刚走，而且那个后来确诊的发热病人前几天就在医院里一趟趟地到处走……。”父亲苦笑，当下的非常时期，医院虽已不再像平常那样门庭若市，但往来看病的人仍然络绎不绝，试问，这些不识趣的人如果不是和我家一样有着性命攸关的事，他们会来吗！

17号晚上，祖父开始咳嗽，喉咙里的痰怎么也吐不出，第二天还是如此，不得已，只能送祖父去医院吸痰。像祖父这种常年卧床的人来说，肺部感染属于常见的并发症，上次发生这种情况时，在医院挂了几天水后就好转了。这次想着应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图方便仍然首先去了县里的私立医院。院方建议送重症监护室，随行的姑父询问ICU与普通病房的费用差距多少，院方表示如果不是情况紧急到要插肺管的话，费用上差不了多少，并一再向我们表示ICU二十四小时有人照顾，服务非常周到，向我祖父这样的特殊病人入住是再妥当不过的了。我父亲想着既然如此，多花一点费用也应该是的，就让姑父不要多问了，治病要紧。

几天后院方突然通知我们说祖父的病情非常凶险，也就只有两三天的时间。当时送祖父进医院时，祖父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的，怎么才几天就这样了！晚上，父亲踌躇着，是否要按农村人的习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祖父接回家中，还是将祖父转到县医院，也许还有一丝希望。我当时还宽慰父亲，如果祖父可以死于这次并发症，其实比最后死于癌症要痛快得多。另外，如果祖父真的在这几天走了的话，当下的特殊时期，葬礼又该怎么筹划呢？农村是不习惯城里追悼会的庄严肃穆以及家属即使哭泣也掩面克制的作态的，能够得到十里八乡人的吊唁并让人吃好喝好，“闹”出点动静，仍然是农村人朴素需求的表达。最后，父亲还是希望转院看看。私立医院的ICU平常不让人探望，那天为祖父转院时，父亲发现祖父手腕上留下了红色的勒痕。虽然平常祖父打点滴时，为了防止他拔掉针头，也经常需要用特制的手套或带子将他的手绑在病床的护栏上，但我们仍然会

每隔两个小时便将带子松开一段时间。祖父的脚也沾上了许多污垢，显然几天来没有受到过任何打理。结账时，四天总费用是两万九，扣去祖父的社保是一万五，平均每天大概三四千，押金退一千。这些日子照顾我祖父的护工是一位大约六十多岁的阿姨，苏北人，体格健壮，干活麻利，在底层磨炼得来的生活阅历使她拥有超于常人的机敏，在与我们的讨价还价中，更能感受到她的精明与狡黠。在和她的交往中，保不准不时就会被她占点小便宜，然而，对一个每天赚着 150 元辛苦钱的六十多岁的老人，我是生不起气来的。

转院时，私立医院的救护车需要先付钱才肯走，父亲厉声道：“一万多的住院费我刚刚都付了，还会差你几百块钱吗！”

据父亲后来坦白，9 号那天祖父所住病房的楼层中，就有一位湖北病人，许多隔壁病床的人得知后多少有些骚动。搁平常，亲戚们总是能在最恰当的时候来探望，既不失礼又能免了苦差事，当下的特殊时刻倒是可以不拘虚礼了。同样由于疫情，我至今只去见过祖父一次，我见到已经被沉重的呼吸折腾的筋疲力尽的祖父，虽然手仍然被绑着，但已经没有拔掉针头的力气了，只有当为他换纸尿裤时，他才因惊吓而奋力睁开那只仅剩的独眼，半张开嘴发出呜呜声。也正是从那次探望开始，我明白了，一只眼睛透出的惊恐与不安是不亚于两只眼的。

如今，随着疫情的回转，医院手术已经正常化，但祖父已经失去了做手术的身体条件。战争中，人权归零，在当下的重大公共安全危机下，人权的退缩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吧！远离湖北的我家，对于疫情的体会，也许不是充斥于媒体的“正能量”可以表达的。想来世界就是这样荒诞，但愿比我们创伤百倍的湖北人民的心灵真正得到抚慰。



灾难中的艺术与人

朱天成

由于疫情的原因，据说全世界都按下了暂停键。“禁足”家中，对于一个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的文科大学生而言，也许只是少了些琐事而能更安心地“干活”，但在资讯发达的当代，面对扑面而来的消息，我还是有些不安分，手头那点小事已不能继续。我发现，原来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早就不再局限于我们这些艺术批评领域的人所关心的那几个艺术家的事上，相对于当代艺术的哲学化倾向的，是生活的全面美学化。上个月，当父亲去ICU病房探望求死不得的祖父时，看到病房墙上有一句标语——绝不放弃一丝希望。父亲告诉我，他当时感受到了一种无以言表的荒诞感。

不曾想，疫情竟然还带来了艺术创作的繁荣，各地艺术家纷纷“以艺抗疫”，我所在的美术学院也曾发动学生积极创作作品，另外，也有许多人批评这种现象，并常常援引阿多诺的那句名言——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甚至还有几位朋友在朋友圈转发了赵勇老师的那篇论文《艺术的二律背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阿多诺“奥斯威辛之后”命题的一种解读》，我乘机重读了这篇论文，据我的理解，阿多诺的命题的意思，大概是要讨论，面对灾难，我们不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反命题）？需要什么样的艺术（正命题）？面对这些在“以艺抗疫”口号下被生产出来的艺术作品，我的感受和每天看电视上关于疫情报道时的感受是一样的。在疫情的起初阶段，我始终觉得这不过是每天都发生着的众多灾害之一罢了，只是不幸发生在中国，在这类对真实苦难进行美学化处理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廉价的温暖，任何面对苦难时真实的、自发的悲悯也被最终切断。正是于此，有人得出了阿多诺的反命题——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然而，病毒的快速蔓延使我这个不在疫区一线的人，也最终感受到

了事态的紧张，而这必将使我在若干年后回忆此次疫情时，必然不会像回忆 2008 年的汶川地震那样，仅仅在脑海中呈现为一种众志成城的美学意象而已。

还有一类作品，令我印象深刻，大概在武汉封城后的几日曾在艺术界的朋友圈中广为流传。第一件作品是一段剪辑视频，前部分主要将年前各大电视台主持人对 8 人传谣的事进行辟谣的视频片段整合在一起，后面则全是各类关于疫区现状的视频报道，同时还配上了诡异的音乐。另一件是国外艺术家的视频作品，视频里是一位老师在上数学课，教的是一加一等于三，有同学质疑，表示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吗？老师立马训斥了这位学生，但是这位学生始终不肯屈服，最终，气疯了的老师喊来两个高年级的学生让他们用枪指着他的头，让他拿起粉笔在等式（ $1+1=$ ）后填上最终的答案，学生迟疑的一会，最终写了个“二”字，然后，在“嘭”的一声中视频结束了。¹ 这类作品，表面上好像是在反讽某些荒谬的现实，然而，让我更为踌躇的是，这类作品对现实问题的简化难道不会使自身同样成为一种偏执的制度批判而走上绝路吗？与那些附和主流话语的作品相比，它们仅仅体现为另一种意识形态罢了。据说 12 月 26 号就已经有专家发现了不明原因的病毒，然而由于层层上报的制度拖沓，等到官方 1 月 20 号正式公布病毒具有传染性，已经延误了 25 天，距离封城则是 28 天。当时我还纳闷，不是有许多学者说，中国大一统政体的产生是由于国家治理水患等自然灾害的需要，因而马克思所谓的国家起源于战争的观念不适用于中国吗？然而，我的这一疑惑很快就被打消了，就在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在考虑采取部分中国的防疫措施，同时对中国的疫情防控效果予以积极的评价。记得当武汉封城那天，推特上还有某西方媒体称中国政府此举属侵犯人权的行为。如果要反思制度，它的优势与劣势难道不是同样可以在当下经验中找到依据吗？这又让我想起李小江曾在《对话汪晖》

1 这两件作品我现在没能再找到当时传播的网页。

中谈到过她由于不满于意识形态化的历史书写而选择跑田野与做口述史的例子²，我作为一名艺术史专业的学生，常常觉得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现实关怀与表达，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高地，常常就像李小江所说的国外的中国研究那样，离现实中的中国太远！

面对灾难与艺术，据说已经过时的阿多诺又重回人们的视野，但是真正让我想到阿多诺的倒不是疫情之下艺术的繁荣，而是李文亮医生之死。面对在牺牲中成为英雄的李医生，常让我想到在搭救遇险船只时牺牲的年仅28岁的林默娘，她还有另一个名字——妈祖，在这种对牺牲者的神圣化中，阿多诺看到了文明中蕴含着的狡诈（cunning）从万物有灵的远古一直延续到已经被启蒙了的科学昌明的当代，启蒙与神话的纠缠就是这样被发现的。³ 然而，在阿多诺泛称的那个被全盘宰制的社会（administered world）中，为什么还会出现并不伟大但仍然做了自己该做的一点小事的、也就是说还没有被系统完全操控的李医生呢？为什么对李医生的感怀与悼念首先来自于普通民众呢？可见，同样在最近常常成为众多人文学者忧虑的对象的那个阿伦特探讨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并不就是所有人的常态。我开始也觉得，李医生似乎确实不够伟大，毕竟，他只是向很有限的身边人“吹哨”，因而在没有英雄的时代，小人物成了英雄。可是我又转念一想，不觉惊出一身冷汗，那些历史上真正的英雄，不正都是意识形态的神化吗？正是于此，体现出文明的狡诈来！李医生不该被神化！也许，阿多诺与阿伦特这两位反思人类危机的思想家的微言大义并不过时，但面对中国问题似乎也显得捉襟见肘，放眼疫情下的政府与民众，如果停留在某种极权主义与被操纵的单向度的人的假想上，那就仅仅是一种罔顾事实的思想的懒惰罢了。

2 李小江：《对话汪晖——管窥中国大陆学术风向与镜像1990~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9页。

3 在《启蒙辩证法》的附录一中，作者谈到在远古巫术时代的活人献祭中，包含着祭祀阶层对部落成员的欺骗，虽然巫术在文明的前进中被扬起，但这种欺骗因素却被保存于统治关系中一直在文明中延续下来。[德]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52页。

最近还有一件小事令我颇有感触。几天前，学校倡议每人上交一篇疫情之下的居家成长日记，这一消息就由系里指导员发布在同届学生的微信群里，而当我那天看到这一消息时，是在学校规定时间——晚上6点——前的两个钟头不到（当时我正带着口罩在小区花园里运动，母亲正在做饭，准备再运动一会儿就回去吃饭了），面对这一突然降临的“差事”，我心里是有些许烦躁的（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学校要求学生每日汇报个人身体状况以及近期出行动向等，一开始在微信群里收集信息，后来则改为在某校园app上，作为学生，对此大都能抱以理解，但也着实不胜其烦），无奈，只能提前结束我为数不多的“户外时光”，重新回到家里匆忙打开电脑，思忖如何“交差”。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随便复制粘贴几篇网上的日记，拼凑修改以后重新生成文本，这不正是我们高校大学生都能掌握的必备技能吗，不管你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毕竟坏学生凭此混文聘，好学生必要时期也得靠它应付差事不是？）。只是，上网检索后，映入眼帘的除了是在近日经历了血与泪的辛酸以后写成的武汉同胞的日记外，主要就是各地的中小学生在学校与老师的要求下纷纷“位卑未敢忘忧国”，记录自己与国家共同面对灾难以后生活的点点滴滴以及表达愿与祖国共刻时艰的拳拳之心的作品。对于前者，我纵是可以容忍自己抄袭他人的文字，难道我还能忍心自己剽窃他人的痛苦吗？对于后者，我虽然可以判断出它们极为符合这类“差事”的要求，但是，将小学生的文字改成研究生水平，似乎在技术上仍有难度，特别是此时瞄一眼手表，离最后交差时间已经不足一个小时了。无奈，只能自力更生，于是，键盘疾走，不到半个小时，已经超过“法定”字数的一篇日记便完成了。我重重舒了一口气，母亲的饭也做好了，生活继续蝇营狗苟。

翌日，班长发来老师已经审阅后的日记，一些字词上的错误已经得到校正，文末并附有一段总评语：

以您现在的心情，怕是也懒得理会一篇小文完成的好坏。虽然我不希望我们非得在经历伤心、失望乃至痛苦的感受时，才会更重视真实情感的表达——这本应该是所有人都希望的，但在看了太多的套话之后，还是认为您这篇文字可以写得更感人些。好的文字可以使情感更深沉，比如方方近期的日记。对您这篇文字来说，继续推敲文字和情感可能会更好。

这位审阅我文章的老师与我并不熟稔，我的作业分配给他也纯属巧合，我们之间关系的发生，由于完全身处同一套学院体系中，就如一台机器中两个零件的碰撞那样。我本来以为这些文字是不会有人真的去看的，至少说，不会有人以一种读者的心态去看，正因如此，我才觉得我的“应付”理所当然。可是，在读完这段评语后，我才发现，当我为“交差”烦恼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对于同样身处学院体系中的老师们来说，审阅这些日记可能更是一件“苦差事”，一来，难为各位老师为我们逐字校文，二来，从评语中的“套话”一词可以猜测，恐怕我们几乎每位学生都已经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让老师被动的上了一节爱国主义思政课了吧，真是苦了他们了。想来昨日的应付之作，虽属流水仗文体，但因确属近日真实生活点滴之记录，不至于是套话；但是若说有“真情实感”的话，则也仅是一时情急之流露罢了！真是惭愧！

对于这场猝不及防的天灾（？）抑或是人祸，结合近来的经历与所思所想，想来并非无话可说，只是，作为大国小民，面对现实社会的复杂，常常感到一种无力感，特别是在谣言与辟谣言四起的情状下，似乎更是“沉默是金”，少说为妙，或者按主流话语所要求的那样去说话，更为妥当。只是受到那篇情急之作以及这段评语的启发，我发现，纵是大家都已经习惯于以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主流话语的形式去说话，作为有血有肉的人，也难免会出现一些“意外”的。人是终究不能被程序化的。



“真实本身比真实的作用更重要”

非白

148

“真实本身比真实的作用更重要”

在一个缺乏“求真”精神传统，近来又因“瞒与骗”被人所诟病的国度里，在一个拟像为王的后现代历史时刻里，真实/虚拟的界限从未如此虚弱：当谣传约等于真理，谎言异变为事实，技术、权力和人性纠缠在一起，所有人都无法面对如此真真假假掺杂的信息潮涌，基于最基本的真实做出判断，包括肉食者。

肉食者利用技术和权力一次次抹消真实与虚拟的界限后自鸣得意以为死无对证，然而此刻它却受到“真实”的反噬：民众对“真实”渴望的爆发、判断“真实”情况的需要，都指向那个已经被掏空了的政治话语内核——进而指向公信力濒临坍塌的“无物之阵”。自以为可以压制真实的人，一定会被自制的冒牌“真实”所反噬。

肉食者可鄙毋用多言。然而即使还之以部分“真实”，鲁迅那个“铁屋子”的预言依旧会如鬼魅一般潜回：同样是一死，叫醒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便真的有用么？鲁迅将“铁屋”比之国家或社会，然而“铁屋”何不若现代性的“铁笼”？技术全面渗透之下，权力即使不愿意，真实和虚拟界限的内爆也在所难免。因此，某种意义上，这既是天灾，也是人祸，更是后现代的末世荒芜。

肉食者中，还有一部分是平庸者，是“我只能这么做”的人。但不知为什么，这话总让人想起艾希曼受审时说的那句“是他们让我这么做的，我照做了”。恶的平庸性的狰狞面目也总是在这种不知不觉的时候揭开面

纱。进而，我们每一次转发、评论，在被这个转速近乎疯狂的信息流裹挟进去的时候，难道不是也在推动这个信息流更加疯狂地转动？这种信息流洪峰过境、裹挟一切，进一步冲决真实和虚拟的堤坝，让真实再也不可辨认。

真实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其能够发挥的作用。如果仅仅关注其作用，那么在虚假的作用更有效率、更能维护稳定、更能安抚人心、更能鼓舞士气的时候，为何不选择虚假？真实的重要在其本身：一方面，在伦理的层面上，“真”和“正”虽然内有龃龉，但依旧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在功利的角度，“真”也是个体或群体做出正确而有效的判断所依赖的最基本的条件。

因而，对真实的追问和尊崇，不仅仅是哲学上的一个古典课题，而更应该是在真实和虚拟（假）已经淆乱甚至后者为王的时代应该承担的时代重责。某种意义上，这或许是后现代这个特殊时刻，权力、技术和人性共同作为出题者，给所有人出的一道难题。

当然，在内爆的时刻，谁想回避答题，谁就是去撞枪口，谁就遭受真实的“天谴”，谁就是下一个崩溃的象征秩序。任你握有多少权力，怎么运用技术，如何解释人性，都没用。



他们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

岚山 蓝

期末考试前那段时间经常焦虑，随便刷豆瓣，看到《朱令的四十五年》在台湾出版的消息（朱令是清华大学的女生，一九九四年因为被室友使用无色无味的剧毒金属铊投毒，从一个明眸皓齿、成绩优异而美丽的姑娘变成了至今智力丧失、瘫痪，靠父母照料的残疾人），作者李佳佳是记者，她在序言中说，为什么要为朱令写传？因为帮助朱令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她的不易就是我们的不易，她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

李文亮医生的逝世是一次异质性的事件，汹涌而来的 NCP 也是一场激进左翼意义上的事件。如果说过去人们还能沉湎于娱乐、消费或是沉浸在琐碎日常的生活轨道中，因为近来的经济红利，对宏大民族叙事的偏爱，对家国朴素的情怀，对安逸私人生活的满足，能够对让渡和失去某些东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么当基本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当赖以生活的空间被封锁，当至爱受伤，当与自己无异的个体因为如此波折而惨然地逝去，积蓄的不满、疑问，努力地在房间里摸大象却不知道大象是什么的愤怒，便一起爆发——

为什么平常刷榜追剧从不关心时事的追星女孩、平常木讷沉默的中年人也开始愤怒和哀悼李医生？因为他的不易就是我们的不易，他的不幸就是我们的不幸。人们在勇敢的媒体对李医生的个人叙事中发现，原来他也追剧，他也是国旗手，他也曾是加班狗，他也怕惹事生非，他是 nobody，也是 everybody。

莫说他是英雄，如果坚持本分和医生的职责，甚至只是有朴素的道德良知而无出轨的举动（他也强调和害怕，说别把信息外传）都要被视为英雄，

那么普通人的底线，该有多低？使他成为英雄的，恰恰是使他被视作了造谣者的那个机制，“使普通人李文亮成为英雄的，正是此后他和其他造谣者所受的打压”。

此外，也有人认为被授予一等功的张医生才配称为英雄，因为是她首先发现病毒、发出通告——而非李医生，他只是一个声音的传播者，就连传播都小心翼翼——因此将舆论中激进的浪花迁怒于李医生本人。不过，李医生、张医生，他们真的有区别可言吗？一位屏幕前愤怒的你，甚至是麻木的你，一位带着口罩出去买菜做饭给孩子吃的你，一位想要自保抢口罩的你，既是普通、平常、老实又怕事的中国人中的一个，也是社会大机器中运转中的一枚零件。

最近我时常想起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平庸之恶的意思是，在意识形态的规训中，人们不再通过个人的思考判断善恶，乃至放弃了最朴素的价值观念，而成为一颗零件，就像耶路撒冷审判中的艾希曼至死不承认自己有罪。他从小接受纳粹的教育，工作也是将一批犹太人从此处运到彼处。还有一个例子则更加典型，柏林墙的守卫，一位二十几岁的士兵射杀了翻越柏林墙的青年，柏林墙倒塌后对这位军官的审判认为，他开枪乃是上级命令，但他为什么不把枪口提高一厘米？还有一个来自中国的例子，文革期间，一名十六岁的广西少年执行村里的任务，将“反动分子”——近百位村民推到深近千米的天坑之中，天黑让其他执行者忽略了几个婴孩妇人，然而不管他们怎么求情，少年仍然以执行任务为名将他们推了下去。而学者吴冠军在一篇谈到未来教育的论文中反思，今日教育系统培养的佼佼者，恰恰是最像机器，最能够执行命令，最理性和知晓自己利益所在的，或许日后也最容易被机器取代。

然而，在缜密的社会机器运转中，把枪口抬高一厘米是困难的。如果士兵背后抵着一杆枪，他不射准，自己就会死去？艾希曼除了执行工作，他有什么替代方案？如果AI监控严密监督，人们又该如何抬高那1厘米呢？我不敢再去想。

在其位，谋其事，生活不易，讨口饭吃，所以有人发帖有人删帖，有人带流量有人撤热搜，有人按手印有人负责督察。正如端传媒的报道，不管是拿着锦旗被立功的张医生，还是被训导最后死了两遍的李医生，二人都是现代国家机器中运转的零件一枚。不过他们今日之所以被提出来讨论，被纪念被当作公民——这个本是现代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在 2020 年也成为奢望的词语——因为他们还保持了一份善良的人心，或是由于反思而来的独立判断，他们的良知也好自由意志也好职业习惯也罢，小小地拉开秩序的一个口，小小地破坏了决定论上的一环，就像那些烂俗的比喻，出于习惯，蝴蝶小小地震动翅膀，某一天却掀起了风暴。

互联网上的风暴是不足道的，因为天然权力的不对等，大手一挥屏蔽一设，灰飞烟灭。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更加剧了人们共识分散的可能，人们自发的联合、奋战，似乎越加困难。居家隔离更是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原子化事态。我只希望日后某一刻人们回过头来，会发现 2 月 6 号晚上和 2 月 7 号早晨的重要，足以载入历史，如果我以后能够讲述和书写，我想要告诉我的孩子，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以网络流传的一首诗歌作结——

把病毒亮在阳光下
把太阳摀在训诫书上
一个眼科医生
死于黑夜

—— 牧驴山人



我歌且谣：小议人人诛之的“谣言”和言论自由

Sid

153

我歌且谣：小议人人诛之的“谣言”和言论自由

武汉疫情的爆发与“谣言”一词始终形影不离，从一开始训诫8名“造谣者”，到广大媒体全力宣传的“疫情可控，不信谣，不传谣”，再到现在永无止境的“造谣一辟谣”死循环，甚至连官方也出现专家口误“造谣”，专家辟谣专家，官方辟谣官方的罗生门。

一时间“谣言”成为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是人人得而诛之，危害公众秩序的祸根，但随着吹哨人李文亮医师的逝世，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阵民众自发或半自发的“谣言质疑”：究竟什么是“谣言”，谁来行使惩戒造谣的权力，未经权威证实的“谣言”真的错了吗？无论如何，李文亮等8名曾因涉嫌造谣而被公安处以训诫的吹哨人已由事实洗脱污名，但网友和民众对吹哨人需以正名，对相关管理部门撤回处罚并道歉的声讨从未停歇。舆论的核心正逐渐从被动等待官方辟谣，转而向主动挖掘真相，呼吁建立平等透明的对话机制，再度探讨公权力是否跨过边界来定性“谣言”等言论的方向生根发芽。从中，“谣言”作为个人言论表达的契机和需要被及时证明的对象，无论是广大的受众，还是官方本身，都有一笔难以言表的糊涂账和不愿言明的潜规则。混乱之下，我们不如溯本逐源，从字本上小考“谣”从上古以来，究竟有什么含义，历来的贤君明主又是如何对待“谣言”的，由此启发我们对当下的舆论环境、媒介生态以及如何再度看待言论自由等问题的思考。

许慎的《说文解字》记载：“𠮟(yáo)，徒歌。从言、肉。”——何为“徒歌”呢？《毛传》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所谓“徒歌”，

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无伴奏清唱。创字之初，“谣”就被先人寄予了美好的生活期望。（注：“谣”、“謠”古代为同字——《说文解字注》）



（謠）

随着字义的发展演化，“谣”字经口相传的含义逐渐加强，例如民谣、童谣，乃至对灾难异象的流言揣测都可称为“谣”，口耳相传的特点也带来难以佐证，易遭他人凭空捏造的弊端，“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说的便是这个道理。此外，“謠”在《广韵》中的定义是“从”，这极利于我们明晰“谣言”的特征——传播，且是不断连续的传播，这种信息交换的方式很大程度地满足了广大受众对未知、真相甚至是阴谋的猎奇心理，也快速适应了当下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媒介环境。在我们将“谣言”“相传”“小道消息”传递给下一个人的同时，其本身就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生命力，有一些内容凝练完整，并受集体意识认可的（哪怕是虚构的），就可能化身为世代相传的歌谣、寓言、成语和神话，有一些则经事实证伪从而停止传播，即“流言止于智者”。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就不能一味否定“谣言”存在和生长的合理性，因为“谣言”的本质即是思想的表达，思想的交流需要接受意识相互碰撞的考验——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助力传播还是止步于此，只有让思想通过言论充分表达和相互碰撞和证伪之后，才能体现它的原价值；相反，如果将“谣言”打造成筛查言论是否符合某种规范的标准，那时说话者人人自危，生怕

被扣上造谣的高帽子，又或是振聋发聩的话语却遭到错误的批判。

溯洄从之，“谣言”无疑是中性的，它是未经证实的消息，不是洪水猛兽，通过思考来分析消息的渠道，背后的受众和意图，传播的结果和影响才是我们每个接收者面对“谣言”时更该去做的，“谣言”和谎言只有一步之遥，和真理同样也只有一步之遥。

因此对于“谣言”，古代的贤君明主并不急着去澄清和禁止，而是看到其中的策政效用。《国语·晋语》有云：“古之王者……风听胪言于市，辨袄祥于谣，考百事于朝，问谤誉于路，有邪而正之，尽戒之术也。”这里君王所用的“采谣”机制正是体现德政的必要手段，面对“谣言”，古人尚有听取、辨别和容许其流传的勇气，那为何今人却见谣色变，堵之而不愿疏之呢？武汉疫情的爆发，从地区性发展到全国性，再蔓延至整个世界，当地政府在管理、调度、治疗、控制等方面的一举一动都像被摊在一张巨大的白纸之上，受全人类的监督凝视，没有丝毫的遮羞和狡辩的余地可言。

在这样极为敏感的背景下，“谣言”——尤其是和疫情工作、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非官方信息就十分自然地被看作是对相关部门和组织处事不当的介入和指摘，这一种话语所转化的压力，是原来政府所没有预期到的。然而要警惕的是，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擅自定义“谣言”，切断传播的途径致使广大群众无法接触到与生命健康攸关的重要信息，究竟是什么态度会选择独断地对个人的自由表达展开控制甚至是扼杀。在这一角度上，武汉政府确实做了一个不好的榜样，处理舆情用的是控制言论、能堵则堵的老路子，与“采谣”的精神背道而驰，最终酿成大祸，弗智。

这种见谣则堵而不疏的恶习，至少要追究到不愿意认错的顽疾之上。政府在包揽一切公共事务的背景下，被赋予了终结各类“谣言”的职责，

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官方辟谣”。然而在卷入无数次前后言论自相矛盾的罗生门之后，政府却习惯性地采用减少负面评论，或是用另一套模棱两可的话术进行二次解释的方法来避重就轻。可这一次，政府换来的不是问题的平息，而是损害公信力的恶果：在全国各地的医疗团队携配套物资驰援武汉之际，社交媒体中出现了大量类似“湖北哄抢江苏医疗支援队的行李物资”“华山医院第四批支援湖北医疗队落地后物资被盗、连生活用品都被偷”的传言。截止到2月11日，各大官媒已对同类的事件开展辟谣，但是更多的网友依然坚信援鄂医疗队的物资紧缺，甚至是工作的状况的堪虞。这种对官方发布的不信任，是由老百姓心中所郁结的愤怒转化的。

1月19日，专家称病毒持续人传人风险较低；1月23日，湖北省省长接受采访称武汉物资储备充足，各大医院、住宅必需品短缺呼救的证实消息却不绝于耳；同一天，国疾控中心专家称病毒对儿童和年轻人不易感；1月底，山东寿光向武汉捐赠的350吨蔬菜遭售卖；2月1日，央视探访武汉红十字会仓库，受到保安阻拦被迫终止直播，不明人士却径直取走整箱口罩；2月2日，各类微信自媒体公众号自发声讨武汉红十字会，揭露红会在捐款、捐赠物品明细中的混乱和不透明；2月6日，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上海药物研究所称双黄连可抑制病毒，遭到丁香园等专业医疗团体的辟谣……

在各个时间节点上，越来越多“官方声明”没能起到消除疑问的作用，反倒成为了具有强误导性的“谣言”。与此同时，疫情的通报是否受到了领导的管制，红会以及社会公益团体的运营究竟如何做到透明化和公开化等核心问题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讨论和改变，关键涉事部门的自我惩戒也毫无痛痒可言，本应是最透彻的窗口成为“谣言”的温床，被蒙蔽的民众的耐心和信心被一点点耗去，愤怒和失望会令更多人选择不再轻易地相信“官方”——这样基础下的“辟谣”毫无力度可言，也永无休

止的一天。真理不应该只从一张口中说出，社会也不应该只存在一种声音。动用不容挑衅的权力来辟谣的确格外轻松，但证伪自己，承认错误的过程却异常艰难和漫长。承认错误从来都不是丢人的事情，知错就改是聪明人的先招，不懂装懂是愚蠢者的绝技。

从疫情的萌发到现在，我们不难发现，微博、微信两大网络社交媒体成为了中国群众讨论公共事件，介入政府工作，表达个人思想，传播各类信息最为重要的渠道。“谣言”纷飞下，我们有幸能看尽人间百态，把人群中的善良、邪恶、质朴和丑陋直截地抛露在众人面前，打破一个单一式的机械状向荣发展的社会景象。质疑言论的真实性加速了全社会对真相的渴求，对争取言论自由的理性思考和价值判断促使更多个体有意识地鞭策政府采取更为人道和确切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困难，倒逼政府放弃与群众意识背道而驰的官僚做法，对未来提出独到的设想。大变动之下，“谣言”和“言论”不该是潘多拉的魔盒，而是悬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2月11日，微博网友就武汉政府在10日提出的“全市病患排查比达99%”的数据发出呼吁，恳请各大渠道保持求救通道的开放，不要配合漂亮的数字，关闭救人的最后希望。不难想象，还有着更多的人会通过个体的声音，把解决公共问题的责任落实在自己的肩上，并对政府的行为能够作出独立的见解和反馈。这些发声也许没有官方和权威身份的加持，也许对一些口号唱了反调，但无一例外，都怀揣着纯粹的希望社会良序向善进步的热心。在中国大陆，微博、微信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政务信息窗口的功能，这里恰恰是政府了解民情，处理舆情的前线，当代媒介环境仰仗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已经能将信息沟通交换的时间缩到最短，并大大提升了潜在读者和听者的数量，这时，我们又要回到政府在面对言论时，究竟应该“堵”、“删”、“禁”还是要“疏”、“留”、“听”，面对批评时，究竟应该诚恳认错，还是装聋扮哑的老问题之上。

2月5日，Springer Nature 旗下期刊 *Political Behavior* 发表文章 *Fake Claims of Fake News: Political Misinformation, Warnings, and the Tainted Truth Effect*，试图阐释“辟谣行为”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文章认为：错误地辟谣或认定谣言会污化真相，导致个体将虚假信息识别为原始的事件，从而无法识别正确的事实，最终造成合法新闻的可信度降低。让我们再一次把目光放回疫情爆发伊始的媒体话术之上——首先明确了绝对负面的“造谣”行为，“依法”惩处了扰乱秩序的“造谣人”，最后强化了官方辟谣的“正统”，接下来事态的发展便人尽皆知了：官方信息和官方辟谣一次又一次地被证伪，诸如李文亮医生的离世时间成为了难以言断的罗生门，官方始终处于被质疑的被动地位，这样窘迫的局面，不正是源自政府对“定谣”“辟谣”拥有唯一解释权的盲目自信吗——我们从不排斥任何拆破谎言的启智之举，但如果任何善意的言论都有着随时被噤声的可能，那我们是不是该思考，这一种管理和审查的机制其实存在着十分严重的问题，甚至严重到会损害到它自身，而这显然已经发生。这也证明了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信任缺失，最终徒得两败俱伤的局面，前者难以重建公信力，招致骂名，不得民心，后者则极易受到恶意的信息左右，缺少凝聚，惶惶不可终日。疫情过后，摆在我们每个角色面前的，都是如何重构信任的过程：政府一定要信任民众，百姓也应该尽己所能帮助政府建立公信力。毕竟，如果政府能有敢于自证、敢于认错的胸襟，那个人言论就不必被轻易视作对公权力的挑衅和侵害，如果政府能够做到自省，那何尝不能将自由的边界，向公众一边作出合理的让步呢？

最后，不妨说“谣言”只是众多思考中的一小部分，是言论彼此传播的媒介，当我们有能力独立思考的时候，它就丝毫不值得惧怕。在当前的语境下，“谣言”更像是对言论在某种立场上的界定，至于界定它的人是否拥有绝对的权威和力量，并不是左右其究竟是真是假的唯一指

标。“谣言”可以是真，也可以是假，最具价值的做法是开诚布公地探讨它，证实或证伪它，只要出发点是善良、积极的，是为公众权利考量的，就不应该被扼杀或惩戒，言论亦是如此，这是一个体制在循循善诱中所应该具备的容量和责任，而不是将话语的利刃全权授予少数的口舌，让它们来代替我们每一个个体的大脑作下不容质疑的善恶论断。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我会一直吟唱下去。

2020 年 2 月 10 日 上海



新冠病毒隔离期：10个家庭教育和环境革命时机(节选)¹

周雷*

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给中国社会带来血的教训，许多家庭遭遇丧亲之痛，而且规模如此之大，并没有短期结束的征兆。我们作为家长、教育者和设计者，应该利用这次因病毒禁锢在家的时机，对自己和孩子进行必要的自我教育和同侪教育。任何时候，坏的事情有时候可以变成“好的事情”。或许，这次瘟疫会带来许多范式革命。

武汉疫难带来安全话题，如果“安全”的主体逐渐从传统的政治主体，转移为不断分化的个体和社会化集体，那么“安全观”首先应该是一种对社会新兴主体、个体、群体的深刻觉察。如果国家治理的工具逐渐和科技结合，当国家在使用科技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科技还可以不断消解原有的权力主体，并产生新的治理对象和权力中介形态，如此视角之下，国家安全不再是基于地理主权疆域，而是没有明显内外界域的新安全观念。

灾害频仍的人类纪（anthropocene）世代，人类正在目睹一次生物大灭绝和人工智能的崛起，它预示着一种全景化的危机型社会的来临，世界政治权力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全球政治的新游戏规则正在重新生成；同时由于人类不断干预自然（nature）和人文（culture）的界限，尤其是不断通过科技创造新的能动性赋予方式（non-human 和 human form of agency），国家总体安全于是直接体现为对不同真实程度的安全护卫：现实安全（reality）、超现实安全（hyper-reality）、模拟现实和增强现实安全（augmented reality）。

* 周雷，自然力研究院联创人，人类学博士。

¹ 原文针对10个问题展开了叙述，这里我们节选了第7条与第9条建议，以及一份载于文中的“疫事书单”。全文见当代文化研究网或自然力研究院公众号的同名推文。

7. 重新理解安全：跨物种安全

微信、阿里巴巴、人工智能、百度无人驾驶、区块链技术、猴克隆技术，这些发生在国内的部分技术词汇罗列预示了一个基本的治理新场景：由于技术的渗透和干预，技术使得传统的亲属关系社会解体了，技术使得人类对于不同的物体和技术集合产生了情感，并通过它来传递情感，情感的亲密性和应用的舒适便捷性逐渐在衍生出新的“类人”亲属关系，也就是本文作者所称的 kinship humanoid。同时因为技术重新组织了社会，创造了新的层级，在原有的差序格局社会上重新排列了新的顺序，这种技术导致下的人类关系束（enclaves of relations）整合，使得所有传统型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都发生了根本性革命变化。

安全仍然是基于“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提出的，而时下的技术革新和超人类技术形态生产已经在催生“新人类”和“介质化半人”（mediated humanoid），因此我们讨论的国家总体安全观落实首先需要进行本体论导航设计（ontological navigation）。

考虑到国际社会的技术形式发展、社会形态变化、权力斗争形态变化、权力主体变化，国家新的总体安全观，如果没有本体论意义上重新认识和再评估，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可能再也无法修筑物理的藩篱、堡垒来保护安全，无法找到保护的主体和入侵主体，无法理解侵入和占据的方式，无法预示风险的远期性。在“谁通过什么试图如何影响何种对象并产生何种安全/风险效果？”这个有关安全的基本问句中，几乎所有主体都在发生重构。

要让安全总体化并可知化，最好先界定安全。而如果要回答什么是安全，最好的答案是重新定义风险和危险，现代社会有时候把所有不确定性都当成风险和危险，这个过度防御机制本身就是危险的来源。把所有社会现象和安全分析场景看成佛教式的“诸行无常”坐以待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试图穷尽所有手段来改造所有无常，或者让一切“照常”进行，也是不科学的。

现代社会对于风险（risk）和危险（danger）的讨论很多，有一个偏社会学层面的风险或不确定性概念讨论较少，那就是 precarity (precariousness)，我把这个概念翻译成“累卵性”——正如中文“倒悬之危，累卵之急”所达之意。累卵性有时候是表显的，有时候则存在隐蔽性，但是无论如何，社会的累卵性往往蕴含着巨大的破坏势能，同时还对应存在着结构化的倒悬，一旦该机制被激活，它多半不可逆，并产生重大的灾难影响——所谓覆巢之下无完卵。

安全在造词表意上是“护生”的，它守护的核心是生命和可能性，因此笔者认为对安全观的首要检讨在于分析现代社会中“生命”本身的变化，也就是 life itself 被高度技术化、干预化、工程化了，现代科技的进步将所有要素都利用起来，用于将生死转化成一种永续的再生产，以此来换取财富、能动性、价值、资源，这种“泛生命化”的工程社会学和生物经济学（global biological economy）；在这种广谱的泛生命化工程和全球经济动员过程中，技术将生命转化成一整套信息束，并把这个信息生产机制和最前沿的 DNA 分子干预和分子模拟结合起来。应该说，这才是我们讨论国家总体安全观的基础场景——当然前提是，我们仍然希望通过守望新风险来长时间守护传统型、固定疆域、固定治理对象、固定权力主体、攻守安全模式型的传统国家。

作为源头型的生产力和繁殖力，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女性经常被视为一种“二度自然”，母亲也因此和大地、自然、坤德联系起来，在讨论国

家总体安全观时突然引述女性，原因在于接续上面的讨论：当生命本身发生变化，女性和母亲是否还是一个社会繁衍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源头？在讨论安全问题时，有必要提问国家的女性、母亲们、孕育生命的物理源头是否安全？正如前面已经简要描述，技术创造生命主体，而非简单成为工具；技术创造自然力，而不甘心被物化；技术改变社会组织方式和亲属关系，技术因此整体革新了作为现实的身体（reality body）和作为社会的安全治理情境（social governance scenario）。

只有厘清上述问题才不会形成前后矛盾和自我否定的安全守备观念和现实操演模式，我们能吸取的最直接的简单教训是：如果要维护传统国家形制和传统安全观，那就要对传统安全的主体和本体进行守护，尤其是对技术进行干预，对技术克制使用；如果想创设新的国家安全观和总体型超现代安全观，或者我们觉察到“敌人”不再是传统的某个具体国家和组织，而是某种现象和状态，我们需要寻找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安全获得模式。毕竟，保护生命、保护生命体、保护身体、保护类群是四种完全不同的安全保护模式，尽管某些层级存在交叉。

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中，他人或异国的错误经常被理解为本国和本族的机会，如果不能消灭风险和危险本身，让它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分布，甚至将这种风险分布和导入变成一种全球化风险分层设计（globalizing stratification of risks），这成为国际博弈的常见玩法。

中国遭遇疫难，国际上已经开始有一堆媒体讲中国的全球治理抱负失败了，或者说中国是最大的风险，美国某媒体甚至再提“亚洲病夫”这个侮辱性词汇，这种落井下石的中国威胁论是比较下作的。

但是，在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中，如果存在敌对国和友好国，以及不同国家的朋友圈分层，那么这些不同的国家确实不会成为共同体，也就是说他们往往不会提醒你即将到来的风险。这种游戏的核心规则是“让对方

自以为是”，让对方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在知识意义上，让对方“不知其所不知”更重要（unknow unknown）。把人类的生物学特质变成政治策略和战略决策的主体性工具，并通过具体的反应机制来实现，这就是生物政治（biopolitics）的核心内涵。

这种生物政治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为了获得一种事先规划的发展预见和成果实现，要对所有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力的要素进行排除，也就是事实创造一种“无菌环境”——或者说避险机制。

为了绝对安全，管理者希望获得孙悟空“火眼”判险、预险、除险的能力，生物政治必然导致人工智能的过度应用和超边界应用，最终将“物”主体化，物“能动性”增强，所以在没有完全获得“无菌式”安全之前，存在被认知主体代偿和主体弱化的风险。

在武汉疫难中，我们一方面有全亚洲最先进的病毒实验室，但是也有全亚洲最具风险的华南海鲜市场，当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各种病毒变异的时候，我们生活周边的病毒正在不断发酵。这就是传统安全观的靶向思维，没有靶子的时候，他们几乎是个瞎子：我猜想，中科院病毒研究所的专家有没有路过华南海鲜市场，甚至进去过，然后看见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一个病毒培养皿，于是开展跟踪。

当我们寄希望于机器愈发理性，物体产生能动性，灵敏信息不断触发我们的安全警报系统时，我们同时开启了一个新的总体安全观黑洞，在这个依赖中介化、虚拟化、智能化、效能化存在的“生物政治”区域里，蕴藏着更大的安全风险，并同时触发了新的超现实、增强现实安全观。

生物政治和生物治理（bio-governance）如果不克制，将可能出现“基因难民”——越呈现人类认知模式、人类情感模式、人类伦理模式、人类美学模式的基因将被淘汰。我们获得的是另一种“转基因式创造性”——或者说“创造性绝育”：由于长期的认知代偿、能动性让渡和物化再生产，

某些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基因、人类类群、人类个体被整体驱逐成为基因难民。

与此同时，由于排斥所有的不确定性，或者将所有不确定性视为风险，它使得一个社会的创造力整体削弱，创造的原始本意在于突破边界和开放性，甚至可以说创造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次意外，而在这种生物政治概念下，只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创造效果满足初始任务目标时，创造才能出现——创造因此变成是一种条件满足下的知识再生产。

与传统攻城略地、占据资源、灭绝文化、创造文明范式的安全观念 1.0 不同，现代治理语境和生物政治思维泛滥的社会实际的治理情境是安全观念 4.0，甚至是“抗原式”安全场景（anti-prototype），也就是不断攻击文化母体、文化原式、自然本体，它的危险之处在于让人类自愿深处危险和坐稳奴隶的时代，并甘之如饴。

在这种情形下的最大外来风险以及瓦解敌人的手段是让对方自动将有益物质甚至遗传物质识别为异类和杂质，并自动产生排异清除反应。因此，描述安全图景，理解安全，理解安全的知识本体，理解安全的生活本体，远比描述和建构靶向的敌人更重要。

9. 新冠疫难是累卵社会的缩影：什么是累卵社会？

累卵性社会是对国际学术界有关 Precarity 概念研究的深化，国际学界有人已经把“无产阶级”proletariat 改为“累卵阶级”precariat，以勾勒出它作为一种现象和集体的重要性。

它的核心是社会脆弱性和个体危机感受，它表现为若干社会规程在剧烈社会变化中的消失，这些社会公序良俗和行为约束规程与本文讨论的多重困境密切相关。由于个体不再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理性、身体性、社

会性个体存在，而是需要多重条件满足才能成为个体，它使得社会的风险性和累卵性大大增加。

国家的总体安全观，如果脱离个体和集体来讨论，它虚泛而无意义，这里所说的安全有积极安全和消极安全，所谓的积极安全就是不断重新理解安全的理论原意、社会意义和实现路径，而消极安全是固守在完全确定性、固定理式、程序化范式影响下的矛盾式安全观——无论对方是否用矛，都以盾牌来抵挡，无论危险是否来自外部，都持盾向外的机械安全思维观。

如果累卵性社会是通过瓦解个体、瓦解边界、混淆伦理、混淆群我的方式来进行的，它就不在局限于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些具体门类化、条块化的安全。我们更重要是保护主体安全和文化本体安全。

累卵性社会的分析进路是基于权力结构、社会变迁、经济互动、组织嬗变等方面的剧烈变动而作出的，它核心是判断和守望那些未知型风险，所谓未知险为何物，安知安在何处？

权力总是为给不同个体和群体以保护的权重，如果当权力将更多的权重给予不同的物和技术，甚至把这些物化的中介当作核心安全时，我们就变成了一种条件化生存的社会（conditional society），那就带来严重的社会累卵性。

传统的靶向安全观首先在于界定安全区、危险区、安全线、危险线、安全点、危险点这些与空间和时间有关的要素，让身体对空间和时间有深刻觉察是判断风险、预警的重要前提，如果将这种综合分析、判断、预警和应对的能力交给一个代偿的中介——哪怕是我们以为控制在手里的技术、物质、材料手中，那它都创造一种依赖性和条件性，这就是累卵性的根源。

由于对任何不确定性的不信任和排斥，消极安全观思维下，人们容易通过控制“预犯罪”、“前犯罪”、“潜犯罪”的方式，把各种不确定性扼杀在萌芽当中，这就造成了社会的“无菌化”——无菌化是实验室社会的根本特征，它的代价是社会活力的丧失，而活力、动态性，构成了生命的前提，它在这个意义上是违背安全理念的。我们需要安全是积极安全、动态安全和活力安全，而不是“涅槃寂静”。

另一方面，对于能源、物质的过度需求，并把对能源和物质的操作当作社会的正常态、活力、强大来看，它造成了我们社会对某些技术、物质、中介的高度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会不断叠加，进而形成严重的条件型社会，它是累卵性社会的重要表征。一箪食一瓢饮，人不改其乐，才是具有人类创造力和主体属性的特征，通过激发内在的稳定感和平衡感来获得安全是积极安全的不二法门。

消极安全观存在对自由意志和未知个体的莫名恐惧和担心，于是它激发一种内控而非外防的安全保护机制，这和基因操控的思维是一致的：内在基因控制，比控制显性的表征要重要的多。因此，自我控制、一级控制成为最重要的消极安全获得手段。

以上的累卵性因素将造就低创造力、低繁殖性社会（infertile society），权力高度依赖具体的物理介质和中介技术团体来运行，如果国家不能完全控制这个中介技术团体，就有可能成为代理型和过渡型主体，安全从内向外突破，而非从外向内攻入，此时的总体安全就无从谈起。

“疫事书单”

基本读本

- 1.The Anthropology of Epidemics
- 2.Anthropology of Infectious Disease

考古学视角的疾病演化

3. Emerging Pathogens: The Archaeology, Ecology and Evolu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

4. The Archaeology of Disease

5. 瘟疫的历史

6. Plagues and Peoples

瘟疫背后的全球化不平等结构

7. Unprepared: Global Health in a Time of Emergency

8. 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 The Modern Plagues,

来自其他国家的瘟疫研究样本

9. Zika: From the Brazilian Backlands to Global Threat

10. Ebola: How a People's Science Helped End an Epidemic

11. The Viral Network: A Pathography of the H1N1 Influenza Pandemic

动物与健康伦理

12. Zoobiquity: The Astonishing Connection Between Human and Animal Health

13. Framing Animals as Epidemic Villains: Histories of Non-Human Disease Vectors

疾病与恐慌

14. Stories in the Time of Cholera: Racial Profiling During a Medical Nightmare

15. When Germs Travel: Six Major Epidemics That Have Invaded America and the Fears They Have Unleashed

当地人如何参与防疫

16. The Collectors of Lost Souls: Turning Kuru Scientists into Whitem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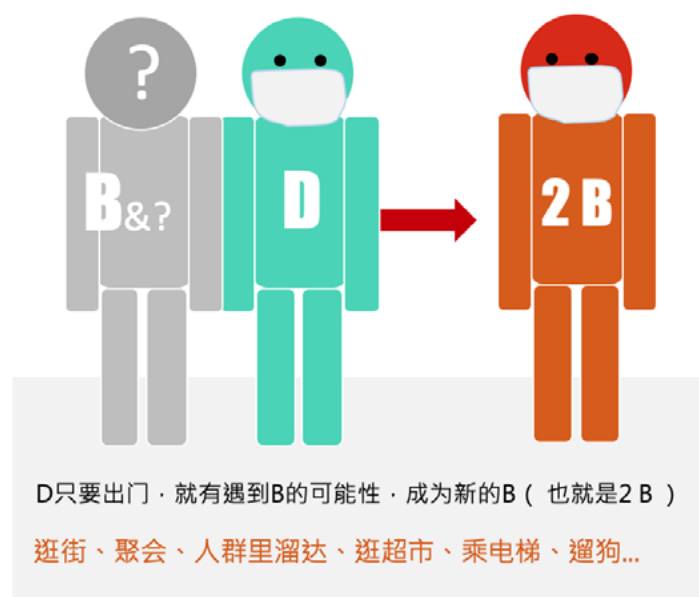
有关禽流感的最新研究

17. Avian Reservoirs: Virus Hunters and Birdwatchers in Chinese Sentinel Posts



“科学”的中国（一）从懒政到勤政的一步之遥

燕赤霞



自武汉封城以来，人类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不断加深，中国人对于“中国社会究竟如何运行”的体会，也在时时加深。于是，在1月28日《联合早报》刊发的疫情评论中，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郑永年教授还在批评我们，说中国虽已是一个科学技术的大国，科学却并没有反映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¹ 但不到一周，行动起来的中国各级政府、大小官员，便证明他的批评过时了。人们分明感到，这是一个最讲科学的政府。

这是因为，当科学告诉我们，在新型冠状病毒的人际传播中有一种叫做“B”类人群的时候；当科学告诉我们，即使什么症状也没有，你也可能是2B的时候；当科学告诉我们，电梯按钮也是病毒集散地的时候，当科学告诉我们下水道可能也是病毒的传染途径的时候——第一时间起来响应“科学”的，不光是喜欢抢购双黄连的老百姓，更是各级政府单位以及掌握着各种大小权力的同志们。

¹ 这篇评论文字在网络上已消失不见，不知道有多少政府官员读过或想过其中的批评。不过，以各级政府和各个小区实际的行动来看，他们或许都默默地读了、删了、行动了。

如果说，在疫情开始时，尚有人批评上海人不愿与武汉人同机的歧视行为，试图反对各地人歧视湖北人、世界其他地区歧视中国人（亚洲人）的暴行的话，那么现在，在“科学”的指导下，这些歧视性的行为在中国大地上已经纷纷转正，成为公然可行之事。各地政府、各个街道，乃至社区，展示出对科学的高度重视和强有力的学习能力，积极出台严格管理 / 优质服务的各类举措。

一时间，有社区党委下达“温馨提示”，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对社区内湖北籍的居民朋友们暂停供水的（深圳），有无110开头的身份证件不能进入小区的（北京），有要求不准将房屋出租给疫情严重地区人员的（宁波），有用无人机监控喊话要求居民立马戴口罩的（杭州），更有要求每户5天只能1人外出一次的（河南驻马店）。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5日的报道，2月3日到4日之间，杭州、南京、宁波、哈尔滨、福州等多地都已经连夜发布小区封闭管理的通告。在一向以文明执法著称的上海，外卖和快递一律不准进小区、居民不戴口罩不准出门、进门必须量体温等规定，也在各个小区默默推行开来。而网友们上传的各地物业提供的追加管理 / 服务，更是五花八门，各显神通。拉自制铁马的有之，搭建从养猪场借鉴而来的消毒通道有之，提供牙签按电梯的也有之。一夜之间，我们的政府和管理者，就这样科学起来了。就连高校这样的单位也不甘人后，虽然是在假期，但每天线上点名，填报体温，将一切数据化，显得井井有条，分外科学。

所有这些，自然是因为大疫当前，各级的执政者，以“懒政”因而酿成大祸的武汉同僚为戒，积极行动起来的结果。² 然而这样的被立即执行的科学，细究起来，却仍让人困惑不解。就各自规定的隔离期而言，有48小时的，有14天的，也有5天出1人的。就身份认证而言，一张上海或

2 在武汉政府不讲科学，明知有疫情还大摆万家宴之后，2月4日，“万家宴社区百步亭内多例确诊一小区55栋楼中33栋有发热病人”的消息传来。

北京或当地的身份证到底可以证明什么？就暂停供水而言，这样的举措到底是否是合理合法，有所依据？就每天上线更新的个人数据而言，既然高校们已经打算放假到2月底，那么每天必须掌握的最新动态数据，究竟有什么样的科学或管理上的用途呢？还是说，种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严厉措施，其实只是在科学地暗示我们，每天公布的数据并不可信，更大的危机正潜伏在我们之中？

一直以为，医学是用来防范病毒、疗愈身体，或者说，是帮助人类和自然界和平共处，商量着办事的。却不曾想，有朝一日它也会成为各部门、各单位、各小区，各自发挥，展开不遗余力的自保、隔离和无端歧视的正当理由。然而，既然有科学/病毒撑腰，谁敢说不？毕竟，不光是病毒可以害死人，防疫期间的法律，也可以判你死刑（黑龙江高院）。

就此而言，说中国过于讲政治而不讲科学，这样的批评自然很不到位。这实在是因为郑永年这样的“外国”专家始终没有理解，以政治的方式摆布科学，才是一切事务的关键。

好在这是中国，一个谣言可以摇身一变而为科学，科学也可以瞬间沦为谣言的神奇国度。在疫情过去之后，这样的科学，大概便不会继续狐假虎威下去。但也不一定，谁知道呢？

就让我们大敌当前，姑且信赖和仰仗这个正科学着的中国吧，并时刻不忘深深地怀疑自己和他人，正是那个潜在的2B。

2020年2月5日



“科学”的中国（二）停课不停学：到底要学啥？

燕赤霞

疫情当前，行动起来的，不光是医疗机构、各级政府，还有我们的教育部门。

几乎在第一时间，上海政府喊停了一切线下教育机构，赢得一片赞誉之声。没过几天，学校寒假延长的消息传来。而现在，教育部喊话的最新版本是2月底前不开学，但我们要“停课不停学”。于是，一大堆的文件、指示、表格开始下达，要求大中小学展开线上教学，教师们开设网络课程，统计上传ppt和讲课视频的数量，选择是直播还是录播，而学生们则要展开在线学习。

果然是迈向5G的速度！

当然，也有持不同意见者。比如，便有人提出，并非所有的学生都待在可以随时上网的地区，特别是在目前各地封村封路关闭一切公共场所的情况之下，这样的学习要求未勉强人所难。也有人说，每个家庭在这场疫情中的处境不同，特别是对于那些疫情严重的地区，家里的口粮状况、家人的健康问题，可能都需要学生和家人一起承受巨大的心理和生活的压力，此时要求大家一起上课，并由此评定其学业成绩，是否造成不公平？有人批评，在如此仓促的时间里，要求所有老师不仅要迅速掌握拍摄和上传视频的技术，并不现实，而上传的课程内容到底如何保证学习，也并不清楚，大张旗鼓地行事，到头来未免沦为形式主义走过场。更有人指出，雨课堂也好，超星APP也好，都是商业化的课程平台。一夜之间，全国上下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要在这些商业平台注册、登陆，展开学习，这里面巨大的利益驱动，不可谓不明显。各地的学校究竟选择哪家平台合作，这一过程是否公开透明？彼此是否签署过CC共享协议，以保证知识分享的非商业

用途？在这些都没有明确说明之前便匆匆上马，这将是一块多么巨大的蛋糕。

所有这些批评，都各有道理，但未免以偏概全。毕竟，一个国家的教育部是为大多数国民服务的，在中国城市化率将突破 60% 的 2020 年，还不能流畅上网的肯定只是少数，可以忽略不计。教育部要负责的是祖国“下一代”的学习，须为切实的学习进度着想，至于一个社会的知识应该被如何生产、共享和传递，这不属于它的业务范围。至于教师，不过是教育部的雇员，听话是应该的。

这些批评既然未曾真正为教育部分忧，自然很难有说服力。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一个国家的教育部，在这场疫情中应该承担起的忧虑呢？我想，真正的问题恐怕是，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停摆之中，手持全国教育的指挥棒，到底该驱赶着祖国的下一代去学习什么？是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把原本在教室里展开的一切，原封不动地搬上网络？还是看清现实，老实地承认这是一个在重大疫情之下的不得不停摆的中国¹，正是这样的中国，构成了下一代展开停摆时期学习的崭新条件？

这个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史为鉴。

2003 年，非典爆发。时隔 17 年，当新型冠状病毒出现时，所有非典时期的社会恐慌，以及缺乏常识和社会道德的举动，依然如故。2008 年，汶川地震。据说那是政府和 NGO 组织和谐共处，多难兴邦的开始。时隔 12 年，网络推动和发起的民间组织对于疫区的支援，由年轻人自发展开的救助行动，却依旧需要和各级政府机构、和红十字会反复协商磨合，磕磕绊绊，举步维艰。有人说，中国人不如日本人。人家没事就搞地震演习，危机发生时井然有序。在我看来，不如的地方，并不在于我们的危机不如人家频发，而是在于，每一次危机发生之后，社会也好，各级职能部门也罢，

¹ 元宵过后，更多的消息传来。不仅越来越多的省份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措施，劝退返回人员、积极实施举报和行政处罚的严厉措施，就连国际航空也几乎停摆。

乃至每一个家庭与个人，都只想到尽快动用一切力量，应付眼前的危机，却不知道从危机中认真学习。就每一次的危机而言，广大大中小学生并不需要奋战在第一线，他们正好有时间展开对于危机的学习，让之后社会经由危机变得理性和科学起来。但这样的学习机会，却每每落空。而此时此刻，仍不吸取前车之鉴，固执地驱赶着广大的大中小学生，从这场停摆中凭空抽离出来，假装在线上展开“一切如常”的学习，恐怕是最不应该做的事。

同样的，对于一个有良知的教育者来说，无论是哪一门课程上线，如果只是一味照本宣科，按大纲录音直播，等待上级领导的检查，变成表格中的数字，恐怕也并不能减少内心的一丝愧疚与忧虑。从历史、从文学、从社会学、从新闻传播，从城市规划、从技术设计、从物流管理，从政治体制，从科学知识，从人工智能……，无论何种学科，哪门课程，或多或少，都可以在这个突然出现的空白期，发出这个学科这个专业应该发出的声音，提供各块拼图²，以帮助下一代更整体性地理解这场危机。

而对于那些总是倾注举家心血投资教育的中国家长们来说，形势恐怕也看得格外分明。那就是，只要是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恐怕需要首先教会自己孩子的，既不是英语，也不是奥数，而是在这种突如其来的灾难中，如何保命，如何不成为社会公害。倘若对孩子再有更多一些的期待，那么就是在合理的自我保存的基础上，对社会有益。

想来这才是这次危机中应有的举国的教育事业，也是教育部应该筹谋和推进之事。这也就意味着，当所有的部门都为了应对这场重大危机积极行动起来的时候，教育要做的，不是跟在大家的屁股后面，表现得很积极，

2 自疫情爆发以来，不仅医学界的专业人士纷纷发布了各种防疫视频，宣传防疫知识，其他“术业有专攻”的人士也在加入这一行列。比如，在豆瓣社区，有人晒出了一个幼儿园美术老师给孩子们布置的作业（https://www.douban.com/people/158938047/status/2797314738/?dt_dapp=1&dt_platform=wechat_friends），指出“这个老师是真的在教孩子，不单单是美术。”在一些城市规划和空间设计的公众号上，也已经开始通过疫情状况和相关数据，反思病毒传播和城市空间规划之间的关系。而一个程序员用数据模型演示的“计算机仿真程序告诉你为什么现在不能出门”，更是广为流传。就此而言，恐怕没有哪一门学科或课程，是和这个停摆期毫无关联，彻底无话可说的。在这一教育过程中，视频也好，直播也罢，都只是具体的可以应用的手段而非必须一刀切的硬性规定。特别是，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大多数人在疫情期间已经被各种视频、网络信息密集轰炸，如何帮助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建立起相对独立的思考的空间，恐怕才是第一要务。

而是真正在教育领域内，做出自己的贡献。

就此而言，我们的教育部，倘若在应该给大家留出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展开素质教育，去社会危机这所学校里瞪大眼睛、开足脑力的时候，非要急不可待地把人装回应试教育的套子里，继续培养照章行事的“套中人”，那么，实在还是闲一点为好！

2020 年 2 月 6 日



线上吐槽会 | 特殊时期的“忙”与“关怀”

Null 小组

只需看看各类社交媒体上有关“停课不停学”的讨论，我们就能知道，面对这场旷日持久的疫情，忙得不可开交的不仅只有政府机关和医疗机构。全国的学校，尤其是高校，也在学生们被迫居家的日子里，高速地运转着。面对即将到来的“网上”开学，老师们要费心于线上课程的准备，而行政部门要操心的事情则要更多。就拿 × × 大学来说，自从1月30日开始，学校的“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便贯彻落实了相关的文件精神，要求每个学生按时按点地登陆网上系统，进行当天行踪以及身体状况的“每日一报”。如果有同学总是忘记填表，就不免要收到相关负责人的电话“提醒”。除了远程监测大家的情况，学校也力图在宣传工作上帮一把忙，这些天里，× 大的各类公众号都铆足了劲，既有号召同学写文写诗赞颂医护人员的，也有传播党员先进事迹来为武汉加油的，总而言之，都是在为应对疫情劳心劳力。

当然，行政系统的上上下下到底有多忙，学生们都是看在眼里的。学生群里各类通知络绎不绝，公众号推送一篇接一篇，让我们也不难想见办公室里的紧迫气氛……不过，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这种“忙”显然也带来了困惑。有人问道，“每日一报”意义何在？是走走过场就好，还是真有效用？也有人质疑，宣扬先进事迹，究竟算是帮忙还是添乱？

于是，围绕着疫情期间的学校工作，我们进行了一场小型的线上讨论，记录下了作为学生的大家，对此的态度与看法。

“作用”

A: 我很质疑 × 大这个“每日一报”的作用，我不知道做这件事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 大作为一个学校而非医院，并没有组织救治患者的能力，如果根据这个上报，查明了某学生已经感染新冠病毒，那么 × 大官方可以对此做怎样的应对？这是正在参与“每日一报”的学生所不知道的。其次，这个上报无非是报送自己今日体温、健康与否，根本就没有鉴别学生是否被感染的效果，只能用来统计发热不适的学生数目。但是 × 大官方知道了发热不适的学生，又能怎样呢？是能隔空查验吗？还是与学生所在的地方防疫机构对接交换情报，让学生就近就医呢？那么问题又回到了起点，× 大并不是防疫机构，它真的有能力、有渠道，和感觉不适的学生所处地区的防疫机构进行对接吗？为什么学生不适，不是自己上门就医，而是向学校汇报呢？这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问题。

B: 嗯，我同意这个说法，如果“每日一报”有用也就算了，问题在于，大家都知道自我汇报系统也就止于走个形式，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但偏偏学校要把它当一件很严肃、很有用的事情，强制大家准时准点走形式，还要带上惩罚措施，装作这件事儿很有意义。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自我汇报基本上就是在为难所有参与到具体执行中的老师和学生，而收回来的统计数据，还给了执行者一种“我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的幻觉。这种“只要我很忙，我做的事情就很有用”的想法一层一层传递下来，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懒得思考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什么事情才真正有用，这就是所谓的“忙也是瞎忙”。

如果要证明做这件事情有用，而不仅仅是一项分配到每个人头上的政治任务，那么是不是至少也要有相关负责人告诉我们，“每日一报”的作用在哪儿？如果你讲不出来或者不讲，那学生也不会真心诚意地

填这个表的。搞了这么一个上报系统，最后的结果是大家互相走过场，这不就是浪费资源么？

C：……很可笑的做法，甚至有一点可悲。因为面对疫情，很多人都觉得不安、愧疚、难受，但我们都没有很好的表示方式，也没有很好的应对方式。比如学校，如果希望在疫情中应该做点什么，它要怎么做？目前来看，学校有要求“每日一报”，有鼓励党员上报自己的先进事迹，有鼓励同学写文章来传递正能量。如果这是表态行为的话，那也可以理解，大家可以一起表。但如果不是为了表态，而是想真的帮上忙，却也只能想出这样的方式，就说明我们真的很匮乏了。

E：我试着从学校的角度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学校想表达对学生“负责”，对社会负责的一种方式。学校希望掌握我们的信息，做到信息完备，有话可说。从武汉市前省长“口罩生产量模糊不清”和黄冈市前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的事件看。信息的明确掌握是负责任的最基本的表现。我们从“每日一报”的具体内容上也可以看到，表格包括了个人状况居住状况和与武汉人接触等信息。在这个层面，学校想要负责，就需要信息，而所有学生就是信息的上报者。

“忙”的逻辑

F：树立先进和典型是很早就有的做法，我觉得通过这种方法引导社会舆论倒也并无不可，但关键是“先进和典型的标准是什么”？×大的这个推文，基本上是基于“党”的，那些人（先进和典型）不是党员就是积极分子，也就是它的性质是宣传工具，而不是说一个普通大学生该怎么做是好的。这不应该出现在学生会之类的公众号上。

A：这些工作在我看来，背后都有一种“丧事喜办”的心态。学校不单是

教育机构，也是个官僚组织，所以疫情也是一种资源。大家在疫情中做的事情，就属于学校的“先进事迹”。宣传这些先进事迹，对于我们的官僚系统而言，就已经算为疫情“做了很多”了。但同时，官僚系统的这套逻辑，越是讲求所谓的“效用”和“业绩”，越是没有实际作用。“硬核防疫”毁路设卡其实和这个也是同样的逻辑，结果搞出了很多麻烦。

B: 这就是经典的“我在帮忙”的幻觉。国家有难→我很担心→我要做点什么→我很忙(虽然不知道在忙什么)→所以我帮上了忙。“每日一报”也好，写诗写文也好，这些宣传工作可能在舆论层面上有一些效用，但对于疫情本身而言，其实等于啥都没做。

A: 但是这就是官僚系统的“有用”。

B: 这种思路放在基层也很可怕啊。“领导觉得有用 = 这是政治任务 = 我们做就行了。”很多事情就是这样越忙越糟糕的。

C: 也是有人真的帮上忙的，包括 × 大学生也有自己组织的捐款。

F: 对，帮忙也可以有很多种啊。做公众号，为读者提供一些观点看法等，这是不是奉献？有一些同学参与民间组织筹措物资的行动，这是不是奉献？这些都应该被纳入到考虑的范畴内。学校的先进事迹，只强调有党性的无私奉献。但这就把人性的一面去掉了，反而成了宣传工具。其实奉献可以有很多种方式的，不一定在体制的逻辑内奉献才叫奉献。

关怀？打扰？

D: 这个每日一报跟寝室每晚查寝有异曲同工之妙，既很好地表现学校对我们的关怀，又不会太打扰到我们。只要你表现得看起来“安全”，学校的关怀就是“到位”了。

C：我觉得还是打扰到了，因为这个“每日一报”是强制，有处罚的。如果不及时上报，就会被扣掉本学年的公共服务分。

E：有关关怀和打扰，我倒有个具体的例子。前几天我因为运动受凉，持续咳嗽，可是却没办法在不适一栏填空。因为我知道学校要求汇报的目的并不是关注我这个学生，而是排查患者。我们的确是在配合老师学生工作的工作，但对学校而言，我们只是一个个数据源。更多的意义，作为学生和人的状态呢？学校没有关注我。学校的“每日一报”是把学生和学校关系类比成了公司和职员，呈现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

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学校并不负责解决学习以外的麻烦，而我们也并没有与学校这个生活、学习场所达成信任关系，所以信息的自愿上报很难。“每日一报”只是将我们和学校的关系更加清晰的展示出来。其实，我也能理解，学校只能通过威胁的方式来收集信息，因为在三年的学校生活中，我们（学校和学生之间）从没有一个良性的关系存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我觉得短期内我们恐怕无法重塑学生与学校的关系。

C：所以结果就变成了，它假装质询，我们假装应答。这里面关怀是不存在的。



疫情中的不完全阅读史

许诺* 刘珊杉**

181

疫情中的不完全阅读史

人们之所以会对互联网有一种满足感，是因为它提供了令我们满足的信息，并允许我们生产这些信息。但互联网同样让人们摸索寻找到自己的“同温层”，流连于各种小圈子小团体小社群中，这些情况在我们年轻一代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然而，在推荐算法日益成熟，圈子交集越来越小的状况下，朋友圈里“刷屏”的热点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小撮人的狂欢。

疫情之下，这种状况出现了矛盾。人们习惯于在同温层中获取的信息，好像突然无法解释疫情之下爆炸般展现出来的现实了。由于路径依赖的惯性，一个个小圈子中的人们陷入对信息的渴求乃至焦虑，仍在等待着既保证真实全面又符合自己口味的信息的到来。而在小圈子之外，正在发生中的现实和对现实的记录，又正被审查机制光明正大地任意裁剪着。这种讽刺的状况，到底是如何发生的？

一、首先，毫无疑问，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段与网络世界高度同步、互为镜像的疫情史。在过去的这一个月，各种媒体上的作者，从专业媒体到普通人，都试图积极地发出多种多样的声音。在这场疫情信息传播竞赛中，民众陷入日常的信息焦虑中，试图在真假难辨的信息中心抓到救命稻草，而网络审查员们同样很忙，不仅要身披各路马甲迅速定义“谣言”，还要加筑“城防”及时抹除任何潜伏的动荡因子，更要为前所未有的紧张抹除找到一本正经的理由。很多文章在被转载、彼此分享后的几天甚至几

* 许诺，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 刘珊杉，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小时之内，就无法再查看。这样的“禁言”，前所未有。

二、除却近乎无理的审查机制，每个人平时所处的朋友圈也构成了这一传播过程的巨大局限。看起来，当人们过于依赖新闻 APP 推送、某一类社交平台（比如豆瓣）和自己的朋友圈的时候，某一种情绪、某一类事件、某一种声音总是在此过程中被反复传递和叠加。如果说，在平时，这一茧房效应虽同样存在，但常常令人毫无自觉的话，那么，这一个多月来，疫情之严重，管控之严密以及人们的恐慌情绪，多多少少在打破或洞穿这一壁垒的同时，让人更深地意识到它们的牢不可破。

三、在此种情况下，在说不清道不明的疫情面前，真正影响普通人的认识与行动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自己平时所熟悉的媒体或朋友圈中，反复流传的那些官方建议和民间揣测。我们往往就是根据这些极为有限的建议或揣测来采取防控措施，理解疫情，关注社会。

就此而言，我们仿佛共同经历着这场“天灾”，却又在不同的信息环境中，依据自己所能掌握的极为有限的资讯，去遭遇和体会此刻的“人祸”。

为了留下一个例证，我们收集了这一个月来在我们——两名“90后”——的小圈子中传播过的大大小小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被记录于此的这些文章，一方面呈现出我们在接受信息时不可避免的局限，而另一方面，它们的消失不见，同样反映出审查者的事无巨细、无论左右。这一必然残缺的阅读史，或许能够被重新书写——只要人们开始意识到并试图改变这一点：审查机制和朋友圈，携手进行着对另外一大部分信息、现实的漠视与遗忘，以及对形成一个新的集体（并承载记忆）的拒绝。

1 月 27 日

《受训诫的武汉医生：11 天后被病人传染后住进隔离病房，之前群内言论被断章取义》

发布于：北青深一度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不晚于 2 月 10 日

《武汉肺炎 50 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发布于：大家 - 腾讯新闻

此账号已自主注销，内容无法查看 —— 发布当日

1 月 28 日

《郑永年：何时能见到一个科学生活的中国》

发布于：IPP 评论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不晚于 2 月 5 日

1 月 31 日

《可能会说谎的地图 - 重新审视全国疫情的地理格局》

发布于：nCoV 疫情地图

此账号已自主注销，内容无法查看 —— 不晚于 2 月 10 日

《我们应该降低抗击“新冠病毒”这场战事的级别》

发布于：壹瓦书馆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不晚于 2 月 1 日

2月2日

《灾难报道中，媒体用“心灵鸡汤”掩盖新闻生产能力的不足》

发布于：高校人文界

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 —— 不晚于2月10日

2月4日

《即使明天重新开始，也不能原谅》

发布于：NJU 学衡研究院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不晚于2月10日

2月6日

《为李文亮医生立传后，我被约谈8小时至今凌晨》

发布于：权益墙

此账号已被屏蔽，内容无法查看 —— 不晚于2月10日

2月7日

《李文亮大夫不朽 —— 武汉十教授的呼吁》

发布于：学知文化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不晚于2月10日

2月8日

《如果有人觉得祖国不好》

发布于：假装思考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不晚于2月9日

《转载 | 如果不是这场疫情，我都不知道中国这么厉害》

发布于：贰条（引用自《人民日报》）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不晚于2月10日

《如果你觉得你爸爸不好，就去当你爷爷》

发布于：赛艇传媒

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 —— 不晚于2月10日

2月9日

《文亮才走，又到周佩仪》

发布于：秀才不止说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发布当日

《痛中思痛的十个战“疫”思考和建议》

发布于：學人 Scholar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不晚于2月10日

2月10日

《被消费的一个武汉女生》

发布于：三表龙门阵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发布当日

2月14日

《周雪光：新型冠状病毒暴露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根本性张力》

发布于：道先路者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不晚于2月15日

《张雪忠：周雪光的央地关系和信息机制分析，对新冠肺炎疫情缺乏解释力》

发布于：开卷有宜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不晚于2月19日

2月19日

《瘟疫、语言和具体的人：与历史学家罗新的聊天》

发布于：用星说（转载自“剩余价值 SurplusValue”）

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 —— 发布当日

《失落的头发自决 —— 在剃、剪与蓄中摆荡的政治肉体》

发布于：Her 小号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不晚于3月1日

2 月 20 日

《来稿 | 周銳澐：我们之间的种族主义 —— 武汉人与新型冠状病毒》

发布于：当代文化研究网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发布后一个半小时内

2 月 21 日

《疫情之下，我们需要另一种声音》

发布于：Philadelphia 哲学社（转载自“互啄的日常”）

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 —— 不晚于 3 月 1 日

2 月 23 日

《让人说真话，天塌不下来》

发布于：廉政法制观察（转载自“半月谈”）

此内容被投诉且经审核涉嫌侵权，无法查看 —— 发布当日

2 月 26 日

《谁把武汉新冠病毒“雪藏”了 13 天》

发布于：Deeper 武汉

该内容已被发布者删除 —— 不晚于 2 月 27 日

2 月 29 日

《自媒体界的怪胎是被游戏规则催生的，是时候改改它了》

发布于：新闻实验室

此账号已被屏蔽，内容无法查看 —— 发布当日



《重塑民族主义：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读本》



张颂仁 陈光兴 高士明 主编

[印] 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 著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ISBN：978-7-5520-2425-8

出版日期：2019 年 9 月

简介

《重塑民族主义：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读本》由文化研究学者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撰写的导言及四篇长论文构成。特贾斯维莉是印度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她一直积极地为思考和研究印度社会问题提供理论武器和理论工具。在这本书里，她尝试总结印度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文化经历，反思印度狭隘的大国世界观。她认为，印度与美国不同，作为第三世界中的大国，应该构建自己的民族认同方法。与此同时，女性主义也应该是构建民族认同的一个重要维度。

作者简介

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目前担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和系主任，她也是印度艾哈迈达巴德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访问学者。她是印度班加罗尔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的联合创始人，该中心在2000—2012年期间开设了创新性的跨学科博士项目。2012—2016年期间，她是孟买塔塔社会科学院印度高等教育语言中心的主任，也是维基百科的印度语言顾问。她的著作包括《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伯克利，1992）、《调动印度：在印度与特立尼达之间的女性，音乐与移民》（杜伦，2006），以及即将出版的关于孟买音乐热的专著。她最近同王晓明共同编辑出版《现在的谱系：定位亚际文化研究》（德里，2015）。

目录

- 替代性框架？为第三世界的比较研究提问 王立秋 译 陈恒 校
- 语言，斗争之所 袁伟 译 许宝强 黄德兴 校
- 为什么文化重要：重新思考女性主义政治的语言 王立秋 译
- 重新塑造民族主义：当代南印度电影和女性主义主体 周展 译
- Alternative Frames? Questions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the Third World
- Language, a Place of Struggle
- Why Culture Matters: Rethinking the Language of Feminist Politics
- Nationalism Re.gured: Contemporary South Indian Cinema and the Subject of Feminism

精彩书摘

本书中的论文来自我过去 20 年的写作，讨论了翻译、流行电影、女权主义语言的转变等问题。准备这篇前言时，我重读了它们，这让我很惊讶地发现民族的观念一直贯穿于印度思想界的辩论中，也让我好奇这是否需要向非印度的读者们作一些说明。

这本论文集首次出版后的 7 年里，我自己对这本书所切入的智识、政治和社会背景有了更多的了解。西天中土项目曾在 2010 年把我带到上海，后来一直在继续它卓越的工作，为印度和中国的画家、学者甚至音乐家们策划了一系列不同的对话。而亚际文化研究项目，不仅把西天中土介绍给我，更持续通过各种活动和出版物传播思想，对区域内的学者和实践者们有着变革性的影响。我提到西天中土和亚际文化研究这两个项目，是为了点明亚洲思想圈环境的改变，并且想说，我这本书现在重新进入的空间和 2010 年的那个空间已然不同。我不清楚，当我把论文的关怀改得更好读，这会不会让文章更容易被接受，因为有些联系在几年前可能还很新，但现在看来会更明显。

2010 年在上海和其他地方巡回讲座的时候，我曾觉得有些挫败。很常见的一点是沟通交流的无力感。这不仅仅是因为不同的语言，而是由于很难找到共同的参照点。印度的很多学术著作都带着后殖民的设定，这很明显和中国的语境大不相同。请让我指出一些可能很难介绍给中国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民族这个在印度知识界辩论中不断涉及的理念。

虽然在印度，不论在独立前后，我们的民族主义思想家都有着悠久的传统，但是当代印度的批判学术研究涉及了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批判，我把这种质问称为“民族—现代（national-modern）的政治与文化逻辑”。简单说来，印度精英们领导了这么一个项目，在女性、达利特（贱民）、

农民、部落和工人等各个人群的斗争之前，就已经对民族的构建达成了共识。1947 年从英国独立看上去好像加强了这种共识，但是政治和社会权力依然留在精英们手中，他们最终对物质或无形资源的重新分配并没有多少兴趣。

对中国读者发言的时候，我总得提醒自己要强调，印度没有像中国一样经历过大革命。发生在印度现代时期的，更准确地说是一个改革的过程。在改革过程中，很多改变确实发生，但是社会却没有根本地或者剧烈地转变。于是，社会和政治结构很大程度上都原样地保留了下来，导致了不满和持续的斗争，要求为许多被剥夺了权利的群体去争取权利和承认。所以独立后大约 70 年，坎亥亚·库马尔关于自由的言论，依然能够在 1947 年以后出生的人群中获得巨大的反响。

坎亥亚所要求的也是对民族的新想象，它不依靠单一的印度概念，不会简单地认为印度属于占大多数人口的印度教徒，而是需要利用语言、地域、宗教实际的多样性。他还要求我们重新关注种姓和性别的不平等，这两点都是当今右翼民族主义——以 2017 年当权的政府为代表——所努力淡化的问题。关于“文化”的争论标志着民族概念的诞生与扩张，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场 21 世纪发生在社会领域的骚动。

就在 JNU 事件发生的前几周，2016 年 1 月 17 日，在南印度的海德拉巴大学，一位达利特博士学生罗希特·维穆拉（Rohith Vemula）自杀了。在这起事件后，紧接着发生了学生在校园里的抗议，还有一部分师生被捕。维穆拉的同学们普遍认为他的自杀是在抗议学校冷漠而残酷的行政部门，也是在抗议这个系统——它不能为来自底层社会的学生提供新颖的机会。国家未能兑现承诺，未能履行它自己的宪法所规定的义务，这是那些致力于社会变革的人们长期关注的一项议题。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印度在内的许多民族国家都曾尝试进行法律领域的干预，然而海德拉巴学生的自杀又一次表明，这种干预不足以影响文化的转型。自杀案变成了催化剂，

刺激了全国包括 JNU 学生在内的许多年轻人，认为有需要与那些也在各自尝试批判国家的社会边缘人士结为同盟。有评论员将政府在 JNU 事件中对学生的惩罚，视为对形成更大规模批判同盟之可能性的直接回应。

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执政党的学生分支，就是那个在 JNU 学生遭到煽动叛乱的起诉中扮演了核心角色的 ABVP，于 2017 年 2 月 21 日攻击并殴打了在德里拉姆加斯学院（Ramjas College）和平抗议的师生。这所学院是德里大学的一部分，它组织了一场名为“抗议的文化”的研讨会，邀请的嘉宾中包括一位 JNU 的学生乌马尔·卡里德（Umar Khalid），他在上一年曾因为煽动叛乱的指控被捕。因为预料到了可能会发生的问题，组织者事前已请求卡里德不要参会。尽管如此，在德里警方的支持下，ABVP 仍旧打断了研讨会。而且当师生们进行示威游行时，他们遭到了 ABVP 的袭击，一部分人受伤严重，被迫住院治疗。ABVP 成员宣称，他们在拉姆加斯学院听到了支持克什米尔“azaadi”或独立的口号。一位在场的教师澄清说，那些口号所呼吁的是表达“azaadi”，即言论自由。再一次地，关于民族不同概念之间的竞争被摆上了前台——有些人争论道，一个民族的成员必须一直保持相同的信仰、相同的行为；另一些人争论道，一个民族包含了不同的言论、不同的可能性，包括了批判主流观点的可能性。从这些关于“印度文化”之定义的争论中，我们也能看到更广泛的对立势力，比如本集中收录的论文《文化为什么重要》（Why Culture Matters）里就讨论了粉红内裤运动（Pink Chaddi Campaign）所反映的论争。

为了讨论民族和文化的问题而构建一套公共语汇，这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在印度，自然科学占有学科统治地位，而且指望所有“聪明的学生”都热心向往以科学为事业，把在学校表现不那么好的学生留给其他学科。即便是那些从事社会科学的人，说话最有底气的还是经济学家。印度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科学一直都是经济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还是新古典主义及其发展的派别。独立后 70 年以来，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严重地集中

到了主要聘请经济学家的机构那里，而且在他们当中很少能发现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者文化理论学者。

不过，那些对批判地思考文化问题和民族再现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学者，他们的著作也有了一定的发行量。这里我只提几个名字。他们当中有一些包含在西天中土的系列丛书里，比如政治思想家阿希斯·南迪或帕沙·查特吉，以及其他如文化理论学者苏茜·塔鲁（Susie Tharu），历史学者罗米拉·塔帕尔（Romila Thapar）和塔尼卡·萨尔卡尔（Tanika Sarkar）。我认为我自己的论点是在与这些学者的著作的对话过程中浮现的，即便我转向了他们中有些人没有涉足的领域，例如翻译理论、南印度流行电影，或加勒比音乐和文化。我认为，我自己的工作，从不同的方向和上面提到的那些学者一起尝试了批判民族—现代的常识——认为有某种继承而来的“印度的”文明精髓。我从我的书《为翻译定位》（Siting Translation）中摘录了部分，在那里我表明，这种批判在殖民时期需要建立在作为实践和哲学的翻译之上。该批判还有一种方式，即另行建立参考框架，不把“西方”当作唯一的比较点，我在以印度学者的身份研究加勒比的论文里探讨了理念。在另一篇论文里，我讨论了1990年代早期全球化时期印度流行电影对女性主人公的再现，展示了民族在当代是如何被重新塑造的，以及女性是以何种方式被呈现为这个重塑过程的核心——虽然经常是通过很有疑问的方式。

民族的空间及其在20世纪学术著作中的核心地位是个意义重大的现象，常常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合适的研究框架。我想说，不仅对于南亚和东南亚这样的后殖民社会，而且对于战后的冷战区域，以及像中国这样有着后内战与后革命设定的国家，都是如此。这个世界见证了前所未有的人民运动，这些运动既有被迫的也有自发的，它们不仅揭示了关于排斥的新语言已经出现，也让民族的理念在当下重新获得了大众的适切性。

从20世纪进入21世纪，中国令世人震惊的转变把我们许多同在亚洲

的人们钉在了期待的观众席上，几乎像是在大银幕上观看电影。由于中国对世界开放了，不仅创造了新的市场，而且，通过探索智识世界、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领域里的联系，中国人保持开放地思考其他历史、其他空间，并对差异的意义保持警觉，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中国不只是需要理解和衔接“西方”，更需要重新塑造新的模式来联系“其他”，或者用帕沙·查特吉的话说，是“绝大多数的世界”。朝着这个方向的第一步也许可以是观察民族和文化的理念在亚洲有怎样的意义，并且去理解对这些概念的批判开辟了哪些可能性。



2020 “n 地域” 投稿指南

2020 年，“n 地域”将征集围绕以下话题的稿件：

疫情下的社会与文化

2020 年，中国和全球势必被笼罩在疫情的阴影之下。在此之前，恐怕很少有人会想到，在一只蝙蝠的威力之下，看起来坚如磐石的人类社会，竟如此不堪一击，丑态百出。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那些理所当然的词汇——“社会”、“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传媒”、“生命”、“自然”、“国家”等，变得不那么确定和令人信服了；由此泛滥而出的情感——“恐惧”、“惊慌”、“不安”、“感动”、“愤怒”、“鄙视”、“悲凉”……一再冲刷着人们的神经，让每个人都成为疫情中的一块小小的漂浮物。在此，仅因中国各地正陆续复工，而疫情在世界其他地区更为汹涌，便将视线从“新冠”上移开，从容谈论一切如常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经验，既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可能的。当然，持续观察和思考“疫情下的社会和文化”并不能对在 2020 年头三个月里消逝了的生命、丧失了家园、限制了的自由，受侮辱的尊严有所补偿。希望这样的记录和思考，可以帮助中国人摆脱鱼的属性，向有尊严有记忆的两脚直立的哺乳动物迈进。

“学以致用”

征集在学术体制之外展开文化研究，从而“学以致用”的各色经验。如果说，文化研究不应该局限在大学课堂和学术论文的话，那么，经历了文化研究的学习，投入到社会各行各业之中的那些文化研究的“种子”，正在如何发芽、生长和结果？它们如何展开和不同行业的对话和角力？如果说，文化研究不是一味的理论和情怀，而是希望和现实短兵相接的话，那么，散播在各行各业里的这些实战经验，如何被呈现、讨论和思考，并成为文化研究在学院建制之下继续前行的宝贵经验和鲜活刺激？当学院体制里的空间日益缩小，变得越来越和其他行业一样的时候，这样的积累，既是对于之前文化研究的正视和修正，也是后续进步必须澄清的现实条件。

《热风学术（网刊）》稿约

- 1 本刊为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和思想议题的文化研究类刊物。这一立足，不仅是指聚焦于中国的当代性，关注中国问题，解析这一快速变动社会中的文化现象，更是指，在“亚际”、“第三世界”、“全球”等这一系列既是历史又是虚构的框架的选择和比照之下，重新放置和结构中国当代社会的文化和思想议题。
- 2 为保持文化研究的野气和灵气，本刊对来稿有两个“不在意”。一，不在意是否一定写成论文模样，欢迎以生动、恰当的文体形式，呈现“问题意识”和清晰思考的文字。二，不在意是否一定是首发稿，提倡各个友邻刊物和网站之间的资源共享和推广。
- 3 在此共识之上，本刊欢迎各类来稿，来稿请注明是否首发。凡首发稿一经采用，即奉薄酬。其中，“专题”一栏为特约组稿栏目。如有专题的组稿建议和想法，欢迎来信，来信请注明“专题”字样。
- 4 来稿请用 word 文档发送至《热风学术（网刊）》邮箱（refengxueshu2017@163.com）。本刊会在收到稿件的一周内确认收到投稿；并于收稿后一个月内，回复作者是否用稿。
- 5 来稿一经录用，除在本刊刊登之外，也将在当代文化研究网及其微信公共号陆续发布。同时，本刊拥有授权友邻刊物和网站共享的权利。



2020 年春季刊（第 16 期）封面故事：《特殊新年》

又是一年除夕夜，小 Y 半倚在沙发上，无精打采地看着电视里的春晚直播。原本是阖家团圆的时光，今天却显得格外冷清。因为新冠病毒的影响，他所在的小区从一大早开始，就严格管控了出行。因此，和父母一起去爷爷奶奶家跨年的计划正式泡汤，原本邻里之间的串门活动也在大家的默契下宣告取消。

“要做点什么呢？”百无聊赖的小 Y 玩弄着手机，随便翻动网页，打算就这样耗掉原来用作走亲访友的时间。这时，电视里传来了令人熟悉的声音。小 Y 抬起头，原来是成龙大哥操着粤语，唱起了那首《霍元甲》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

“江山秀丽叠翠峰岭，问我家哪像染病！”朗朗上口的歌词加上成龙大哥洪厚的歌声与坚定的手势，在这个特殊的跨年夜里，似乎显得格外地温暖人心。微信朋友圈里的亲戚朋友们，有些还把后一句歌词专门拍下来作为配图，然后加上了“新年快乐！武汉加油！”的祝福。不过，就在这清一色的加油喝彩当中，小 Y 刷到了一条格格不入的票圈。一个不太熟络的朋友上传了一张模糊不清的白色图片，点开一看，原来是一幅不太寻常的武汉地图。这幅地图既没有行政区划，也没有地点标识；交叉纵横的不规则线条，就像是肺炎患者的肺部纹理。小 Y 盯着这幅地图，就好像看到了逐渐扩散着的病痛与苦难、焦虑与恐惧，正在沿着线条向四周继续延伸……

突然间，窗外传来了礼花的轰鸣，打断了小 Y 的出神。他走到阳台上，和父母一起观看迎接新年的绚丽礼花。新的一年，最终还是在这漫天华彩中拉开了序幕。不过，我们要以怎样的心情与态度，迎接 2020 的到来呢？



主 编 _ 罗小茗

学术编委 _ 包宏伟 Fran Martin (澳) 雷启立 孟登迎 潘家恩 朴姿映 (韩) 王智明 章戈浩

责任编辑 _ 梁成林 美术编辑 _ 刘睿 编辑助理 _ 许诺

《热风学术（网刊）》来稿邮箱 refengxueshu2017@163.com

本刊每年 3 月、6 月、9 月、12 月 15 日上线。

版权声明：自由转载 - 非商用 - 非衍生 - 保持署名。



请登陆“当代文化研究网（<http://www.cul-studies.com>）”下载《热风学术（网刊）》。



扫描二维码，回顾往期。

